

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

张静如 马模贞 廖 英 钱自强 编



K822/23 59901

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

张静如 马模贞 编
廖 英 钱自强



200218246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琪生
封面装帧 沈蓉男

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

张静如 马模贞 编
廖 英 钱自强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25 插页 4 字数 189,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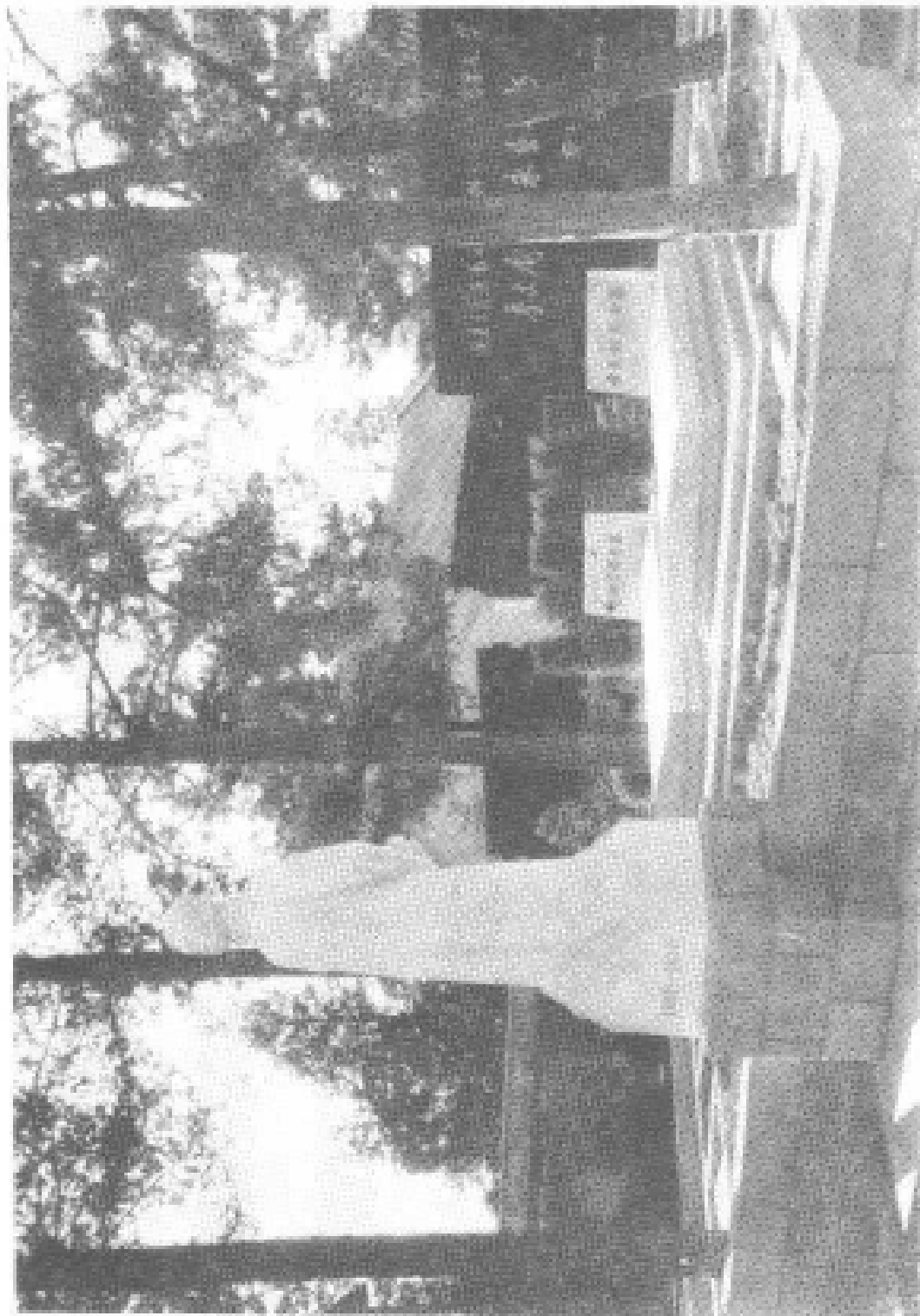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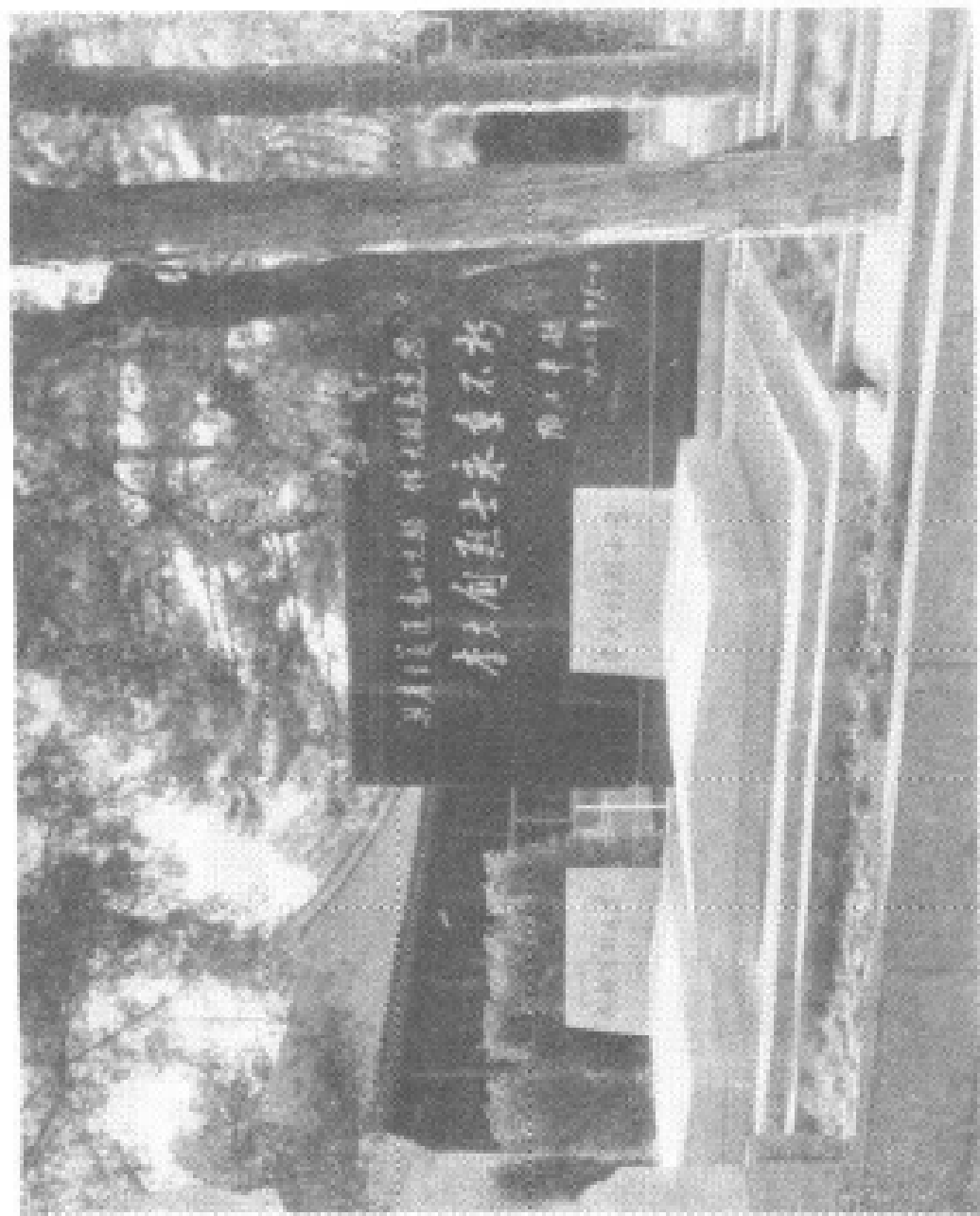
书号 11074·606 定价 1.2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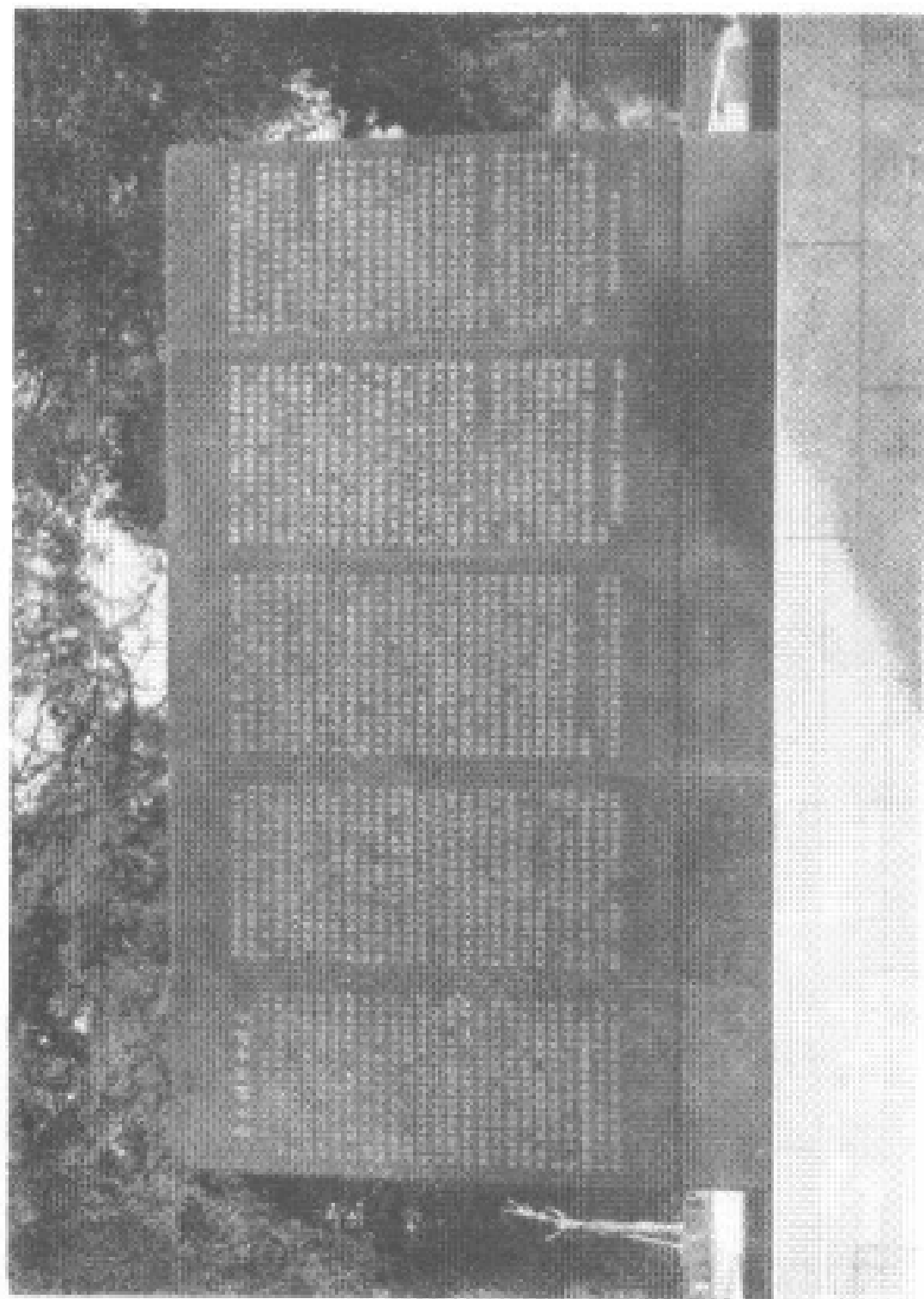
在永平府中学读书时的李大钊



1983年中共中央为李大钊同志重新修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1983年中共中央为李大钊同志新建的纪念碑



1983年中共中央为李大钊同志纪念碑撰写的碑文

说 明

这是一本史料书，目的是把我们查到的有关李大钊生平的材料汇集在一起，便于研究者使用。但限于各方面条件，材料搜集不全，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望研究者予以补充和纠正。

全书所有材料都是照录原文，未作更动，只是原材料有明显漏、错字之处，在〔 〕内补、改。此外，原材料无标点的，一律加上标点。

编 者

目 录

一八八九年——一九一五年·····	1
一九一六年·····	13
一九一七年·····	28
一九一八年·····	47
一九一九年·····	65
一九二〇年·····	95
一九二一年·····	130
一九二二年·····	164
一九二三年·····	197
一九二四年·····	219
一九二五年·····	241
一九二六年·····	265
一九二七年·····	283

一八八九年——一九一五年

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 诞生

10月29日 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

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 两岁

父李任荣与母周氏在两年内相继去世，由祖父李如珍抚养。

《我的自传》：“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她丢下一个十分需要她照顾的可怜的婴孩。我没有兄弟和姐妹，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转引自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刘楚译，《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

《狱中自述》：“在襁褓之中，即失怙恃，既无弟兄，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总第23期）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六岁

在大黑坨村从塾师单子鳌读书。塾师为之起名耆年，字

寿昌。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九岁

在大黑坨村从塾师赵辉斗读书。

《狱中自述》：“幼时，在乡村私校读过四书经史。”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十岁

与赵纫兰结婚。后在井家坨村从黄玉堂读书。

《军法会审又判决党人十名，四人十二年，六人二年，李大钊遗族之悲惨》：“李既无兄姊，又鲜伯叔，唯赖其祖父母哺之长成，以家中无人，故成婚极早。”（《晨报》，1927年4月30日）

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十六岁

应科举考试，中秀才。因科举停办，遂入河北省卢龙县永平府中学读书。

《狱中自述》：“年十六，曾应科举试，府试，中。科举停办，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

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十八岁

夏 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狱中自述》：“在永读书二年，其时，祖父年逾八旬，只赖

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老人，不久，祖父谢世。钊感于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乃与二三同学乘暑假之便，赴天津投考学校。其时，有三种学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军医学校，一系长芦银行专修所，一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是校为袁世凯所创设，收录全国人士，规模颇大。钊在该校肄业，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言。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

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十九岁

写诗两首，题为《登楼杂感》。其一：“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倚楼。”其二：“荆天棘地寄蜉蝣，青鬓无端欲白头。拊髀未提三尺剑，逃形思放五湖舟。久居燕市伤屠狗，数觅郑商学贩牛。一事无成嗟半老，沈沈梦里度春秋。”这两首诗后来发表在1913年7月1日《言治》第1年第4期上。

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 二十一岁

11月 参加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罢课活动，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

《白坚武日记》：“廿五岁，伏期来京朝考，落二等。冬月，国会请愿风潮起，法校独为大，吏怒，欲以兵围焉。余与李君

寿昌约，待之后，竟无事。回故里省祖父母，闭门十日，作小说二本。”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二十二岁

写《哭蒋卫平》诗两首：“国殇满地都堪哭，眼泪乾坤涕未收。半世英灵沈漠北，经年骸骨冷江头。辽东化鹤归来日，燕市屠牛漂泊秋。万里招魂竟何处，断肠风雨上高楼。”“龙沙旧是伤心地，凭吊经秋只劫灰。我入平山迟一步，君征绝塞未曾回。玉门魂返关山黑，华表人归猿鹤哀。千载胥灵应有恨，不教胡马渡江来。”这两首诗后来发表在《言治》第1年第4期上。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 二十三岁

6月 写《隐忧篇》，指出民国建立后，“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等情况，“足以牵滞民国建设之进行。矧在来兹，隐忧潜伏，创国伊始，不早为之所，其贻民国忧者正巨也。悬侧逆覩，厥要有三”：“党私”、“省私”、“匪氛”。“以上三端，百思恐不获免。凡百君子，其有以嘉谋嘉猷而弭于未然者乎，曷有以解我忧。”这篇文章发表于1913年6月1日出版的《言治》第1年第3期上。

12月 北洋法政学会成立后，与同人翻译是年10月出版的日本学者中岛端的《支那分割之运命》一书，并加驳议数万言，题为《〈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

《〈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爰取译之，并加驳议，命以今

名，洋装金字都为一册，去年十二月出版，以为国人当头棒喝，警梦之钟，知耻知惧，竞奋图存。尔来风靡一世，远及外国，斯诚敝会望外事而亦意中事也。”（《言治》第1年第1期，1913年4月1日）

冬 在北京结识中国社会党北京部主任陈翼龙，并由曹百善介绍入党。

曹百善回忆：“中国社会党北京总部，是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秋冬之间成立的。”“李大钊先生加入社会党北京总部，是在一九一二年冬。他从天津来找我，说是应孙洪伊之约，要和白坚武筹办言治月刊，当时经我介绍于陈先生相见，畅谈以后，意见极洽，遂入党。”“第二年春，在天津成立支部，推李大钊、郭须静主持。”（张次溪编：《陈翼龙先生事迹汇录》）

冬末 写《岁晚寄友》诗两首。其一：“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辽宫昔时燕，今向汉家飞。岁晚军书急，行人归未归？”其二：“几载不相见，沧桑又一时。廿年余壮志，千里寄新诗。慷慨思投笔，艰难未去师。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次年的《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发表了这两首诗。

一九一三年（中华民国二年） 二十四岁

3月 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部长。

《北洋法政学会第二期职员名册》：“会长：张思缓、田解、张竞存。编辑部部长：郁崑、李钊①。”（《言治》第1年第1期）

① 李钊为李大钊笔名。

4月1日 与同学郁癡等编辑的《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出版。该期发表李大钊的《大哀篇》、《“弹劾”用语之解纷》、《更名龟年小启》、《朱舜水之海天鸿爪》以及译文《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这一期上,李大钊还为北洋法政学会写了《蒙古与蒙古人》、《〈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的出版启事。

《大哀篇》指出:“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狴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在共和政体下,“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载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可见,“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郁癡《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余与君虽聚处六载,而相与为文字密交,则自今春始。盖往者日敝心力于校课,无暇及是。属毕业伊迩,而同人组织之北洋法政学会成,金议创言治杂志,用泄积年蕴蓄,且微进德。君翩然赴众人中,偕余朝暮经画,首期出版,海内日报杂志转录殆遍,尤以君文为最。同人之文,多拘挛法理糟粕之学,而君则振翰莘莘,发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阐发先哲貽德为急。览者感发兴起,颂声交至。”(《言治》第1年第4期)

5月1日 在《言治》月刊第1年第2期上发表《暗杀与群德》、《复景学铃君》、《东瀛人士关于舜水事迹之争讼》等文。

《暗杀与群德》认为,民国以来,暗杀之风盛行,其因在“群德”之衰。“桃源渔父,当代贤豪,不幸而殒于奸人之手,死之者武士英,所以死之者群德也。”“群有巨愆而容之,群有彦俊

而无以卫之，乃渔父之所以死耳。然则渔父之死，非死于群德之哀而何也，非其群杀之而何也？”

6月1日 以李钊署名在《言治》第1年第3期上发表《裁都督横议》、《论民权之旁落》。

《裁都督横议》指出：“中央命令，何以不行，地方乱机，何以不戢，民生幸福，何以不享，财政之紊，何以不清，吏治之颓，何以不振，神州郁塞，顛领斯民，萁豆相煎，操戈同室，推原探本，何莫非都督为之梗也。”“都督一日不裁，国权一日不振，民权一日不伸，养痍貽患，嗟何及哉。”

这一期《言治》月刊还登了李大钊的一首诗《题蒋卫平遗像》：“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抔土。不闻叱咤声，但听呜咽水；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

夏 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随后去北京，接交进步党人汤化龙，并办《法言报》。汤化龙愿资助李大钊赴日留学。

《狱中自述》：“此六年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李赵氏辛苦艰难典当挪借，始能勉强卒业。”

《军法会审又判决党人十名 四人十二年 六人二年 李大钊遗族之悲惨》：“李在该校毕业后，结识孙洪伊，复由孙介见汤化龙，二氏皆器重之，即共同出资送往日本留学，此为李立世之始。”（《晨报》1927年4月30日）

8月 陈翼龙于六日被枪杀之后，李大钊遂离京回乐亭家乡。

曹百善回忆：“陈翼龙先生惨死后，万国社会党中国总部和天津支部被封，我也走了，李大钊先生也避到乐亭县的祥云

岛。”(张次溪编:《陈翼龙先生事迹汇录》)

9月1日 在《言治》月刊第1年第4期上发表《原杀——暗杀与自杀》、《论官僚主义》、《一院制与二院制》、《政客之趣味》、《是非篇》等文。

同月 再登河北省昌黎县碣石山之五峰,适逢日军杀死中国路警的惨案。

李大钊《游碣石山杂记》:“曩者与二三友辈归自津门,卸装昌黎,游兴勃发,时适溽夏,虽盛炎不以泥斯志,相率竟至西五峰韩昌黎祠一憩。”“予以重来五峰,青山依旧,森树丛茂,不减当年,守祠人仍为前度刘郎,健干一如曩者,而同游者则易为子默,且仅一人。回首旧游,天涯零散,子衡则从戎南下,守恒则执法塞北,际青则侨寓云津,乱离身世,而予尚得汗漫到此,不胜今昔之感也已!”“余自山中访允之,再往始遇。盖余以京友函招,须西上,且当旋里一行,故匆匆立谈片刻,仅为子默介绍,恐其独处山中嫌寂寞也。迨自家返昌黎,复与子默、允之等入山一次,居成美学馆二日,备受杜瀛州夫妇之优遇。宗教家之诚恳与世,其爱慕宏感且不绝于余之心矣。惟此荏苒十日间,昌黎惨毙路警五人,已孤棺冷落,寄地藏寺中。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土,伤心之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不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言治》第1年第6期,1913年11月1日)

10月1日 在《言治》月刊第1年第5期上发表《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宪法颁行程序与元首》两篇文章。

11月1日 在《言治》月刊第1年第6期上发表《欧洲各

国选举制度考》、《各国议员俸给考》、《〈自然律与衡平律〉跋》、《游碣石山杂记》、《文豪》等文。

《文豪》中写道：“嗟嗟！世之衰也！怨气郁结，人怀厌世之悲观，文人于此，当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方能救人救世，使更以愁怨之声，凄怆之语，痛其心脾，断其希望，则求一瞑而自绝者，将接踵以闻也。”

这一期还刊登了李大钊写的几首诗。《咏玉泉》：“殿阁嵯峨接帝京，阿房当日苦经营。只今犹听宫墙水，耗尽民膏是此声！”《有感》：“愁尽人天唤奈何，高楼风雨黯笙歌。伤心人有伤心泪，洒向红颜薄命多。”《吊圆明园故址》：“圆明两度昆明劫，鹤化千年未忍归。一曲悲笳吹不尽，残灰犹共晚烟飞。”“玉阙琼楼委碧埃，兽蹄鸟迹走荒苔。残碑没尽宫人老，空向蒿莱拨劫灰。”《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冬 东渡日本。

李大钊《物价与货币购买力》：“残冬风雪，乃同二三朋辈，东米瀛岛。”（《甲寅》第1卷第3号，1914年6月14日）

李大钊《警告全国父老书》：“曩者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复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潮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

郁巖《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君顾自视缺然不足所储，

更欲游学日本专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归而造德蚩蚩，其志远而识阔，余于君之又何克尼也。”

一九一四年（中华民国三年） 二十五岁

春 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狱中自述》：“毕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6月10日 在《甲寅》第1卷第3号上发表《风俗》、《物价与货币购买力》。

11月1日 以李守常署名写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发表在《中华》第1卷第11号上。

11月10日 所写《国情》一文发表于《甲寅》第1卷第4号。文章指出：“自‘临时约法’为集矢之的，而世之谈国情者众。夫衡宪典于国情，宁匪可尚者，而以客卿论国情，则扞格之处恒多。纵其宅心立言，力辟国拘，而欲以诚挚自贡，虑其所谓国情者，究属皮相之见，不叶于实象，所向愈切，所去愈遥。况邦国之际，利害相反者有之，使其人而褊塞阴狠者，忠于己不必忠于人，则其标为治安之制者，安可信赖。盖国情之不可与客卿谋也久矣。”

是年 发起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活动。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我和守常认识是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期。因袁世凯背叛民国称帝，引起全国人民反对。那时东京留学生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

段：‘二十一条’签定以前，反对是秘密进行的，守常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这个学会我参加过。”（《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39页）

一九一五年（中华民国四年） 二十六岁

1月底 联络留日学生，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并任该会文牍干事，主编《民彝》，起草通电，反对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二十一条’签定后，人心愤怒，我们留日学生组织起留日学生总会，公开反对袁世凯。留日学生总会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民彝》，守常任主编。我们在上面都发表过文章。”（《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39页）

2月 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并油印散发。文中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必欲亡之，惟有与国同尽耳。”

4月 译日法学博士今井嘉幸的《中国国际法论》一书，由健行社发行，并为叙。书中还刊登了李大钊写的启事三则：《再版〈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蒙古与蒙古人〉——蒙古丛书第一种》、《世界风云与中国》。

6月 编印《国耻纪念录》，写《国民之薪胆》一文。文中列举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系列事实，指出“此次日本要索之主的，对于吾国，则断绝根本兴复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

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文章最后希望“国民勿灰心，勿短气，勿轻狂躁进，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前途正自辽远”。

8月1日 在《通俗》第1期上发表《欧洲战事谈》一文，署名冥冥。

8月10日 《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发表李大钊的《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文章对该杂志第四号所载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提出批评，反对厌世悲观，认为“他人之国，既依其奋力而造成，其间智勇，本不甚悬，舜人亦人，我何弗若？必谓他人能之，我殊未必，则此特别之民，当隶于特别之国，治以特别之政，此种论调，客卿尝以之惑吾当局，而若吾民，又何可以此自鄙也。吾民今日之责，一面宜自觉近世国家之真意义，而改进其本质，使之确足福民而不损民。民之于国，斯为甘心之爱，不为违情之爱。一面宜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谓所逢情势，绝无可为，乐利之境，陈于吾前，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

一九一六年

一九一六年(中华民国五年) 二十七岁

1月 为进行反袁活动离日本到上海，两周后又回东京。去上海途中，在轮船上作诗，题为《太平洋舟中咏感》：“浩淼水东流，客心空太息。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黯黯五彩旗，自兹少颜色。逆贼稍征讨，机势今已熟。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中宵出江户，明月临幽黑。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此诗发表在次年4月1日出版的《言治》季刊第1期。

2月2日 担任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会务纪要》：“总会成立启事：敬启者，本会于本年元旦开共和成立纪念会，承各省留学暨侨商诸君子咸表同情，各举代表莅会致欢迎辞，并公决分电国内各省长官，发布对外宣言书，以明留学生公意之所在，甚盛举也。维时同人等悚于时局之艰，均感知留日学生总会成立之必要。爰有各省同乡代表之集合，讨论询谋，僉同于一月十六日，开留学生全体大会于大日本私立卫生会馆，到会者称极盛，当即票举干事长一人，副干事长二人，各省同乡诸君，复先后开会，各推举评议员二人，组成总会评议部。于一月三十一日票举评

议长、副评议长各一人，并议定执行部职员人数。于二月二日开评议会，选举职员，计庶务、文牍、会计、交际主任各一员，干事惟交际五员，余悉倍主任之数，评议、执行二部遂正式成立，并筹设文事委员会以主编辑。”

“文事委员会： 委员长：高一涵

编辑主任：李大钊

编辑委员：张梓芳、陈溥贤、黄觉、刘明敏、
申欧龙”

（《民彝》第1号，1916年5月）

2月 致函白坚武，劝白留学。

《白坚武日记》：“十四日 接刘佐廷来信，始知前约之信遗失，即复信一件。接李寿昌来信，劝留学，意志甚坚决，欲去，频年碌碌甚无味也，当即复书以询。”

春 为中国经济财政学会责任会员。

《中国经济财政学会叙言》：“简章：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中国经济财政学会。

第二条 本会以研究经济财政学理及调查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为宗旨。

第三条 本会以两种会员组成之。如左：

甲、责任会员。以能委身研究图达本会之目的者充之。

乙、名誉会员。凡不为甲种会员，而对于本会能负调查责任，或以财力及其他方法赞助者充之”。

“附民国五年现在责任会员姓名籍贯：

张声焕，字秉文，湖南。周子贤，字伦笙，湖南。李大钊，字守常，直隶。殷汝耕，字亦农，浙江。张润之，字泽民，直隶。刘聘业，字〔原文缺〕，福建。张定，字叔丹，湖南。彭蠡，字一湖，湖南。钟恺，字之卿，湖南。刘作柱，字〔原文缺〕，湖南。陈溥贤，字博生，福建。”（《民彝》第1号）

春 为留日学生总会捐赠日金二元。

《留日学生总会收支报告表》：“邓居文、张锡候、张梓芳、卞润田、邓雄、李墨卿、程莲贞、阮明、李大钊、黄觉、曾震、唐震球。以上各捐日金二元，共二十四元整。”（《民彝》第1号）

春 为护国军捐饷日金五元。

《代筹护国军饷报告》：“张自雄 周子贤 刘奇瑶 刘洪 李淑贞 李大钊 於钱定 欧阳诚男 黄炳蔚 冯渭卿”“以上各捐日金五元。”（《民彝》第2号，1916年8月）

春 作诗送友人幼蘅回国：“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不久，相无回国，又作诗：“逢君已恨晚，此别又如何？大陆龙蛇起，江南风雨多。斯民正憔悴，吾辈尚蹉跎。故国一回首，谁堪返太和！”这两首均发表在《言治》季刊第1期上。

5月2日 致书张泽民，言不日来沪。

《白坚武日记》：“二日 早刻，精神爽快，午后赴汤济武处，访张泽民出游，某有督直风，说寓沪同人拟电拒签名。李寿昌致泽民书，阅之始悉不日来沪。”

5月10日 致电白坚武，谓不久即到沪。

《白坚武日记》：“十日 阴雨，烦闷不得出。晚，同王笠斋、张新吾、张贵敏小酌，赴丹桂戏园观剧，未及毕而归。雨声淋漓

彻夜。接阅寿昌电，不日来。”

5月上旬 从日本辍学回国，友人沈汉卿、沈芸生至码头送行。

李大钊《哭沈汉卿君》：“吾于去岁四五月顷，再往上海，君及沈君芸生送吾于横滨舟中，更购罐头鲜果多类馈余，江干握手，珍重而别。”（《甲寅》日刊，1917年2月23日）

5月中旬 抵上海

《狱中自述》：“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守常为了拯救国家，毅然决然丢下学业，甚至拿不到大学毕业文凭也毫不顾惜，不等学期終了，就在一九一六年上半年返回祖国，做社会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39页）

5月15日 《民彝》创刊，发表了李大钊在樱花节期间写的《民彝与政治》一文。文章以古今中外历史为依据，倡导“唯民主义”和“立宪政治”，反对“英雄主义”和“专制政治”。文中写道：“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而专制之政与君主之制，如水与鱼，如胶与漆，固结不解，形影相依。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

5月19日 在沪与白坚武叙谈。

《白坚武日记》：“十九日 收拾行具，夜车来宁沪，晤孙伯

兰、汤济武，报告宁状。与李守常叙谈。李凝修、宋仲彬同寓。访崔剑云，晚归寓，酣睡。”

5月21日 出席宪法研究会第一次集会。

《白坚武日记》：“二十一日 研究会开会，到会者有孙伯兰、李大钊、王法勤、彭介石、易白沙、张润之、李培藩、李步青、谢寅、梁家义诸人，此为第一次集会。晚阅民彝杂志，国本、民彝与政治二篇甚佳，多见到之言，民彝与政治系守常撰。”

5月22日 与白坚武访谷九峰等。

《白坚武日记》：“二十二日 午后同守常、责敏访谷九峰未遇，又访籍亮侪不在，遂同归。”

5月26日 到尚贤堂参观华品陈列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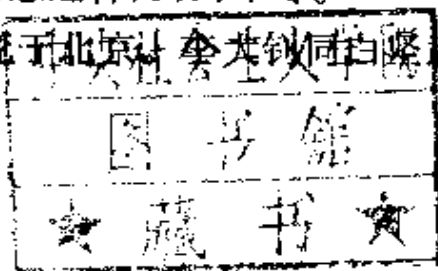
《白坚武日记》：“二十六日 午后，赴泰安里访守常，责敏继到。同凝修、守常到尚贤堂参观华品陈列所。买石图章一盒，用洋一元，寄可亭信一件。”

5月27日 同白坚武等赴宴宾楼。

《白坚武日记》：“二十七日 同守常、宋仲彬、李凝修、张责敏赴宴宾楼饮饌。”

5月 给友人霍例白写信。信中说：“弟抵沪以来，劳于酬应，未能裁笺候问，殊以为歉。此间自溥公来，各派意见消融无间，裨益大局匪浅鲜也。昨济公接川陈二庵电云：川决于箇日宣布独立，湘亦不远，而南京会议虽无结果，冯之态度，仍有希望，其部下尤为鲜明。看此情形，长江流域战云漫郁，倪张与冯已隐成敌国。传闻袁氏备战甚急，此则雌雄之决，仍非于一战不可也。综述近况，以慰远怀，匆匆不尽。”

6月6日 袁世凯病死于北京，李龙钺同白坚武等赴丹



桂观剧，悉袁死讯。

《白坚武日记》：“六日晚刻同李凝修、张责敏、守常小酌宴宾楼，赴丹桂观剧。阅新闻报，悉前大总统袁世凯病故。袁氏之为人，纯属旧奸雄。局说者曰彼之失败在否认道德二字，责之未尝不是，惟历史上成功之人物，果不否认道德乎。”

6月8日 同白坚武等访王宗周。

《白坚武日记》：“八日 午后访何海秋未遇。同守常、责敏访王宗周。”

6月10日 同白坚武等访耿鹤生。

《白坚武日记》：“十日 同守常、责敏访耿鹤生。晚赴马鹤天召饮。”

6月11日 同白坚武等观剧丹桂剧场。

《白坚武日记》：“十一日”“晚同守常、责敏观剧丹桂第一台，看黛玉葬花。往寄京师梅兰芳之黛玉葬花，倾动一时，未得倾聆。今欧阳予倩之黛玉亦复可观。”

6月21日 同白坚武等商议北归。

《白坚武日记》：“二十一日 同守常、责敏议北归。晚买达仁堂益仙救苦金丹十五丸，用洋三元。买表一只，用洋十四元。”

6月29日 同霍例白等谈文学。

《白坚武日记》：“二十九日 仲彬病未愈，未能赴杭。同守常、例白谈文学。晚口占一诗，悼亡女静兰也。”

6月30日 偕白坚武至泰安里，晚，同赴四马路买物品。

《白坚武日记》：“三十日 偕守常至泰安里，晚，同赴四马路买物件，归来沐浴。与守常谈，不觉午夜，抵舍又与王啸云

谈,三时睡。”

7月2日 同白坚武、霍例白访章行严。

《白坚武日记》：“二日 同守常、例白寻访章行严,未得其住所。晚,胡子笏请宴都益处,赴天蟾舞台观剧。”

7月5日 介绍白坚武与章行严晤谈。同宋仲彬等拟议北归。

《白坚武日记》：“五日 守常介绍与章行严晤谈,章君聪慧明秀,时正卧病白克路宝隆医院。连日鼻气发闷,服六神丸六粒,亦欠舒畅。拟同守常、仲彬、遵海归。连寄快信于洁芬,询行止消息,未得复书,闷闷。”

7月11日 同宋仲彬、霍例白等乘轮北上。

《白坚武日记》：“十一日 守常、仲彬乘通州轮船北上,同行者有霍例白、容伯挺。”

7月中旬 抵达北京主编《晨钟报》。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守常回国后,汤化龙请他主编《晨钟报》,这个报纸后来改名《晨报》。七月,我也回国,守常约我同编《晨钟报》。”(《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39页)

7月 出任汤化龙秘书。

8月1日 同白坚武访王立哉。

《白坚武日记》：“一日 偕守常、责敏访王立哉。”

8月3日 与白坚武等访张溥泉。

《白坚武日记》：“三日 偕守常、责敏往访张溥泉,路遇王笠哉同往。”

8月13日 同白坚武等访孙伯兰。

《白坚武日记》：“十三日 王范南来访。晚，偕守常、泽民访孙伯兰，谈某项教育。”

8月15日 《晨钟报》创刊，发表李大钊的《“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两文。

《“晨钟”之使命》认为：“袁氏逆命，谋危共和，未逾数月，义师勃兴，南天震动，而一世之奸雄，竟为护国义军穷迫以死。今虽不敢遽断改革之业，为告厥成功，而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

8月17日 写《“第三”》一文，发表在《晨钟报》上。文章中写道：“本报出世，今已为‘第三’日矣，请与读者言‘第三’。‘第三’者，理想之境，复活之境，日新之境，向上之境，中庸之境，独立之境也。”表示“吾宁欢迎方生未来之‘第三’日，盖‘第三’之日，乃行健不息之日，日新之日，向上之日也。”“老子有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第三’之境，实宇宙生生之数，人间进步〔之〕级，吾人当雄飞跃进以向‘第三’”。

8月19日 赴宴宾楼吴蓬仙之约。

《白坚武日记》：“十九日 同守常、泽民、质生赴宴宾楼吴蓬仙之约。晚，作山雨欲来风满楼时评。”

8月20日 《晨钟报》发表李大钊的《介绍哲人托尔斯泰》一文。文章说：“托尔斯泰者，近代之伟人也，举世倾仰之理想人物也。彼生于专制国中，以热烈之赤诚，唱导博爱主义，传布爱之福音于天下，扶弱摧强，知劳动之所以为神圣，身为贵族，而甘于菲食敝衣，与农民为伍，自挥额上之汗，以从事劳作。此其德行之美为何如耶。”

8月22日 所写《介绍哲人尼杰》一文登在《晨钟报》上。

文章指出：“尼杰者，乃欲于其自己要求与确信之上，建设真实生活之人也。对于弱而求强、缺而求完，悲惨而严肃深刻之生活，奋往突进，以蕲人性之解放与向上，有虽犯百战而莫辞之勇。内对一己之自我与生活，为锐敏之省察，外对当时社会之实状，为深刻之批判，以根究人性之弱点与文明之缺陷，而以匡救其弱点与缺陷，为自己之天职。彼固爱自己、爱社会、爱文明而又酷爱生命者也。”“其说颇能起衰振敝，而于吾最拘形式重因袭因循于奴隶道德之国，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奋发国民之勇气，此则记者介绍其人之微意，幸勿泛漠置之也。”

8月29日 《晨钟报》刊载李大钊的《权》一文。文中指出：“权无限则专，权不清则争。惟专与争，乃立宪政治之大忌，而制国民之常态也。故欲行立宪政治，必先去专与争；欲去专与争，必先铲除专制国民之根性。”

8月30日 在《晨钟报》上发表《政谭演说会之必要》、《达科儿之“爱”观》两文。

《政谭演说会之必要》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派别之争都是公开的，是在演说台上进行的。“而吾国之政争，则何如者。钩心斗角，恒在暗潮黑幕之中。双方相持，无论若何激昂，而慷慨淋漓热烈蓬勃之政谭演说会无闻焉。是非之公，遂不能与天下以共见。斯（于）（公）（开）之义，有未当，而阴谋猜忌之说之所由兴歟。”

8月31日 《培根之偶像说》发表于《晨钟报》上，署名守常。文章列出培根所说的四种偶像：巖窟之偶像、剧场之偶像、市场之偶像、种性之偶像，接着点明：“吾国历史，传袭最久，举国昏昏皆为崇拜偶像之人，闻倍氏说，其亦知所感奋乎。”

9月1日 回罔前所写《青春》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文章强调要寄希望于“青春中国之再生”；指出“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号召青年“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9月3日 同白坚武等商讨问题，并在《晨钟报》上发表《奋斗之青年》一文，介绍美国纽约脱利滨新闻社创始人霍列士。

《白坚武日记》：“三日 在伯兰处清理案件，劳甚。晚，有数问题同守常、泽民、叔和商之。”

9月4日 与白坚武等小酌致美楼，并在《晨钟报》上发表《新现象》、《别泪》两文。

《新现象》认为：“吾国人才，置之适所，本不足用，而以人才不经济之故，处处感人才之少，即处处嫌人才之多。社会与政治，既不能善用人才，以归于至当之途，而所谓人才者，又不善于自用，基此二因，已用者时有不安其位之思，未用者常怀用武无地之慨。人人皆为，有用之才，人人皆居，无用之地。此其为象，宁不堪慨。”

《白坚武日记》：“四日 同泽民访伯兰，尤忙未得谈片言而归。晚，请冯乐轩、黄鉴平小酌致美楼，守常、质生、泽民在座。晚眠甚晚，约在二时余矣。”

9月5日 在《晨钟报》上发表《祝九月五日》一文，庆祝宪法会议开幕。文章说：“吾祷祀馨香以求者，乃在欢迎福民之宪法，拒绝祸国之宪法。”

9月6日 同白坚武访秦立庵。

《白坚武日记》：“六日 早起未出游。质生代购新式书架一个。检点书物，花月痕少一本。质生借阅新民丛报两册。克苏借阅甲寅独立周报。偕守常访秦立庵。”

9月7日 与高一涵等议《宪法公言》主旨。移居皮库胡同新宅。

《白坚武日记》：“七日 守常在老便宜坊请宴一涵高君及秦立庵、田克苏，议宪法公言主旨。伯兰出访之未遇，再与守常访何海秋，未得其住寓。晚，偕立斋、守常访伯兰略谈。遂同泽民至皮库胡同新宅，守常今日移居于此。”

9月9日 在《晨钟报》上发表启事，辞去编辑职务。启事说：“晨钟创刊，鄙人承乏编辑主任一席，出版兼旬，缺谬未免，殊负阅者之雅望。今以私事萦扰，急思返里，爰请社中另托明达。鄙人此后倘于一事一理，有所指陈，仍当寄登本报，就正当世。所有编辑部事项，概不负责，特此声明。”

同日 离北京归里。

《白坚武日记》：“十日 昨晚秦立庵、田克苏请筵，高肖良因病未到，守常归里，单自赴请。”

9月27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信，谓初五来京。

《白坚武日记》：“二十七日 早阅学群已权界论十余页。午后到部接守常信，初五来京。”

10月1日 回京后仍居皮库胡同。

《白坚武日记》：“一日 星期上午在伯兰寓办事，泽民介绍车夫龚秀声来。晚到日日新报，摊赵南野丧份。赴皮库胡同看守常，同赴羊肉胡同。”

10月3日 同高一涵往访白坚武，未遇。

《白坚武日记》：“三日 电郁宪章勿遽移家后门，守常嘱为代知也。锦叔、挹珊来寓，略谈，午后到部。守常、一涵来，未在寓。晚，访守常未遇。到羊肉胡同，伯兰公出未遇。至礼路胡同王蕴东寓略谈。”

10月6日 偕白坚武至皮库胡同。

《白坚武日记》：“六日 寄宁、津二件。偕泽民到俱乐部，与黄厚以商定鲁一事。午后赴帅府胡同看房，郁宪章同行。在羊肉胡同候伯兰，未至，偕守常至皮库胡同。”

10月8日 同李蕪尘等访白坚武。

《白坚武日记》：“八日 星期早刻赴孙寓，为兰君静江寄函一件。降雨终朝，扫兴而归。晚，李蕪尘、王幼侨、高一涵同守常来谈。”

10月10日 与孙伯兰晤谈。午后同白坚武等赴中央公园。《宪法公言》创刊，发表李大钊的《国庆纪念》一文。

《白坚武日记》：“十日 双十日国庆，各机关放假，午前同守常到羊肉胡同，与伯兰略谈某会议员接洽事。午后同守常、黄见平赴中央公园，天日清明，游人鱼贯，诚可乐也。宪法公言第一期出版，遗憾甚多。”

10月13日 访白坚武。

《白坚武日记》：“十三日 早刻，郭仙洲来访，守常、黄敏继到。到孙寓借款百元定房租。”

10月20日 在《宪法公言》第2期上发表《制定宪法之注意》一文。文中提出制定宪法应注意的两点：其一，“制宪者当知宏厚宪法之势力苟得其道，不必虞法外势力之横来摧毁，而蓄意防制也。”其二，“制宪者须知今日制宪虽采成文主义，而不可尽背不文主义之精神也。”

10月27日 与白坚武访张溥泉。

《白坚武日记》：“二十七日 早，守常来，同访张溥泉，遇耿荷生，同至醉翁寓，遇袁不同、夏述唐。回寓，接惕之兄信，祖病又重，殊为忧虑。”

10月30日 与白坚武至光明殿西口看房。

《白坚武日记》：“三十日 赴内部领薪回，路遇郁宪章，同至东安市场买砚盂一具。午后，守常来，同至光明殿西口看房。至孙寓作稿一件。”

11月2日 与白坚武谈话。

《白坚武日记》：“二日 赴孙寓，介绍吴子超、李泽民、李采言充起草员，偕同者适吾。归，与守常谈，吾人生活问题最难解决，休养前途固不能以此止，然终有碍。”

11月7日 同白坚武访张溥泉。

《白坚武日记》：“七日 早，锦波叔来，携皮袍到寓。到部议新闻发布事。同守常访溥泉，遇吴蓬仙。”

11月10日 所写《省制与宪法》一文，刊登在《宪法公言》第4期上。

11月17日 同白坚武等打球。

《白坚武日记》：“十七日 早，访采言赴孙寓。接三兄来信一件。同守常、泽民打球。”

11月21日 偕白坚武访王从周。

《白坚武日记》：“二十一日 早托适吾缮辞表。晚，偕守常访王从周。惕之兄来信。”

11月24日 同白坚武晤孙伯兰。

《白坚武日记》：“二十四日 政府提任可澄长内务，众议院否决。午后，同刘毅公、守常晤伯兰。”

12月1日 参加黄蔡追悼会。

《白坚武日记》：“一日 国人为黄蔡^①开追悼会于中央公园，同守常、泽民赴会。”

12月4日 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学恳亲会向孙伯兰请款。

《白坚武日记》：“四日 晚，为法校同学恳亲会开办，同守常向孙伯兰请款。”

12月10日 为迎张树之，与《宪法公言》编辑同人合影。《宪法公言》第7期发表李大钊的《宪法与思想自由》。文章批驳天坛宪草第十九条附加“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语，指出“是语也，不啻将教授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隐然为一部分之取消”。文章认为：“吾国思想界之消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而“吾国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制”。

《白坚武日记》：“十日 秦立庵、田克苏约《宪法公言》编辑同人摄影于同生照像馆，迎张树之。”

12月11日 赴天津参加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同学欢

^① 即黄兴、蔡锷。

迎会，留六日。

《白坚武日记》：“十一日 同守常、二泽、子超赴津，开法
校毕业同学欢迎会，留六日。”

12月25日 至中央公园看云南首义纪念会。

《白坚武日记》：“二十五日 作古瀛同乡录序文，寄赵悦
禅。是日，为云南首义纪念日，偕守常访刘任夫于恒发店。又
同至中央公园看纪念会，斯会为政学会所包办。”

一九一七年

一九一七年(中华民国六年) 二十八岁

1月10日 晤白坚武，并在《宪法公言》第9期发表《矛盾生活之二重负担》一文。文章列举生活中许多新旧事物并存的矛盾现象，认为打破此种不调和、不自然、不统一之矛盾生活的办法，“在固新文明新生活之地位，以与旧文明旧生活分对等之势力，而深养其锋，以迫旧文明新生活相妥协相调和，否则征服之而已矣”。

《白坚武日记》：“十日 早车来京，晤守常，知伯公已南下。沐浴。”

1月17日 同白坚武往访张璧堂、张新吾。

《白坚武日记》：“十七日 接崔叔和来信一件。偕守常同访张璧堂、张新吾。”

1月21日 同白坚武、高一涵等散步、用饭、沐浴。

《白坚武日记》：“二十一日 日来上部患火舌喉，俱肿痛。午后，同质生、守常、泽民、高一涵、采言往南下洼，顺城根步至先农坛散步。又同回新华街，至前门左右附近，觅饭铺不得，至西河沿西海居，用饭之后，同守常、泽民在东昂平沐浴，归来。”

1月23日 同白坚武至厂甸买画。

《白坚武日记》：“二十三日 阴历一月元旦，早九时起。午

后，同守常至厂甸，守常买油画猫四张，赠余二张，又至俱乐部。”

1月24日 在朝阳门竹竿巷会见白坚武等。

《白坚武日记》：“二十五日 昨午后同泽民访守常、一涵于朝阳门竹竿巷。”

1月28日 《甲寅》日刊创刊。李大钊任编辑，并于创刊号上发表《〈甲寅〉之新生命》。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报》，约我们替他写社论。今天由守常写，明天由我写，后天由守常写，再后天由我写，如此轮流，每人隔一天给《甲寅日报》写一篇论文。我们在文章中攻击研究系，攻击现政府；而章士钊是维护他们的，他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守常又只顾真理，不顾什么情面，不合心意的，他就要痛骂。章士钊不敢去和守常交涉，便托我去和他商量。这怎么行呢？一个人的主张是不能够随便更改的。后来，彼此谈妥：不谈内政，只写国外新闻。”“到张勋复辟时，我们便登报申明，脱离了《甲寅日报》。”（《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39页）

1月29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调和之美》。

1月30日 同白坚武等往访张溥泉，未遇。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孔子与宪法》一文，再次批驳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之条文。

《白坚武日记》：“三十日 早刻，李采言遣使来。同守常、泽民访张溥泉，未遇。”

1月31日 与白坚武等人同游。

《白坚武日记》：“三十一日 寄崔可亭、黄鲁一各一件。午

后，同内子往东四牌楼林家。又同质生至守常寓，同出齐化门，坐冰床回，至东安市场会英楼用饭，游散终日，甚可乐也。”

1月 与高一涵共同起草地方自治法规。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北洋政府内政部长孙洪伊在那时可算是一位急进的民主派，他认识守常。一九一七年，孙找人起草地方自治法规，把守常和我找去，我们负责起草工作，经过三个月，草成。我们主张分权，旧派则站在集权方面，这个草案终于被北洋政府否决。”（《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39页）

2月1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真理》。午后，访白坚武。

《白坚武日记》：“一日 午后，接崔叔和来信一件，守常来谈。”

2月2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真理（二）》。

2月4日 偕白坚武沐浴，并在《甲寅》日刊上发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预定制宪期间案》两文。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认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道德者，宇宙现象之一也。故其发生进化亦必应其自然进化之社会。而其自然变迁，断非神秘主宰之惠与物，亦非古昔圣哲之遗留品也”。所以，“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企于自然进化之程，少加以人为之力，冀其迅速蜕演，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

《白坚武日记》：“四日 午后，同采言至米市胡同俱乐部。

晚十二时，偕守常浴罢归来，万籁沈寂，皓月在天，澄思涤虑，顿现光明之我，此乐不易得也。”

2月6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论收毁制钱宜有准备》一文。晚，同高一涵、白坚武等步月夜。

《白坚武日记》：“六日 十五，与守常、一涵、洁忱步月夜，一时睡。”

2月7日 所写《中国与中立国》、《回春之北京》两文，刊登在《甲寅》日刊上。前文反对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

2月8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元宵痛史》、《日本之托尔斯泰热》两文。

《元宵痛史》说，在袁世凯统治时，禁止人们讲“元宵”二字，因其与“袁消”音同。袁世凯死了，此禁令自然取消。这都是“共和复活之所赐”。

2月9日 所写《美德邦交既绝我国不可不有所表示》、《我国外交之曙光》两文，发表在《甲寅》日刊上。后一篇文章提出：“我国应迅与诸联盟国接洽，表示加入之态度，并与磋商加入之办法。”

2月10日 访白坚武，并在《甲寅》日刊上发表《黄金累累之日本》、《可怜之人力车夫》两文。

《可怜之人力车夫》指出，北京的人力车夫的生活最可怜，他们“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赢得数十枚之铜圆，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是矣”。

《白坚武日记》：“十日 内阁对德国提出抗议。守常、一涵来。”

2月11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今后国民之责任》、《威尔逊与平和》两文。

《今后国民之责任》认为：“执铁血以为政府后盾者，乃今日国民之责也”。文章还指出，要在外交上制胜，应以“诚心与协商国及中立国为友”。

《威尔逊与平和》一文中，把和平希望寄托于美国，说“吾人终信平和之曙光，必发于太平洋之东岸，和解之役，必担于威尔逊君之双肩也”。

2月12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中德绝交后宜注意西北》。文中指出，土耳其与德国为同盟，可能在中德绝交后，煽动新疆、青海一带回族人民，故政府宜速派专员去说明情况，稳定回族人民。“果吾之内部无何变动，则萃全国之精力，以应未来之变局，前途庶或有望乎。”

2月13日 同白坚武赴广德楼观剧。

《白坚武日记》：“十三日” “晚，泽民、守常同赴广德楼观剧，送童启颜赴日本留学。晤山东刘贯三，人甚诚朴。”

2月14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战争与铜》、《德皇之欺世论》、《爱国艺术家罗丹翁病笃》等文。

《德皇之欺世论》在揭露德皇维廉二世的欺骗言论之后，指出：“国际之间，但有利害之可言，更无恩仇之足报。利之所同，则昨敌而今友；害之相异，则昨友而今敌。今日之日俄乃其明证”。

2月15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学会与政党》一文，指出近年来学会日益增多，实际上是假学会之名行政党之实，故“学会者，政党之假面具也”。

2月16日 所写《诗人达阿儿之行踪》一文在《甲寅》日刊上发表。

2月17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攘权之武器》、《外交研究会》两文。前文告诫说，中国政府对德抗议，系国家存亡之外交问题，任何人“不惟不可资以为攻诘政府之柄，即欲利用此机会以攘取一部之政权而因以自效，亦非爱国之士所当出”。

2月18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北美之风云儿》一文，夸奖美国前总统罗斯福“雄飞迈进”之志。

2月19日 所写《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发表在《甲寅》日刊上。

2月21日 同白坚武访张新吾，并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哭沈汉卿君》、《“极东门罗主义”》、《一致与民望》等文。后一篇文章进一步论述了《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攘权之武器》一文中的观点。

《白坚武日记》：“二十一日 偕泽民访王励斋。晚，偕泽民、守常访张新吾。”

2月22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议会之言论》一文。

2月23日 同白坚武等人赴陶然亭散步。

《白坚武日记》：“二十三日 偕克苏、守常、质生、子超赴陶然亭散步，共以外套铺地，狼籍仰卧，斯时觉万念皆空，其乐陶陶，诚南面不易也。”

2月25日 所写《政论家与政治家（一）》发表在《甲寅》日刊上。文章认为，每个人都应重自用，“尽量以发挥其所长，而与福益于其群”。至于从事何种事业，精神的或实际的为“人

类社会皆所要需”。

2月28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蔷薇缘欤？蔷薇恨欤？》一文。

3月2日 所写《政论家与政治家(二)》发表在《甲寅》日刊上。

3月5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中德邦交绝裂后之种种问题》。文中提醒人们在中德断交后，要在西北国防、安排原聘请之德国人、处理德国租界及德国在华之财产等方面，做研究和准备。

3月7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爱国之反对党》一文。文章指出，在对德外交问题上，总统与总理发表不一致的说法，双方“宜以国家体面为重，速谋转圜之道，而利外交之进行”。同时，“在野之各政团亦宜以肃静诚恳之度，挽回此紊莽凌乱之时局，幸勿借题发挥，施其挑拨之伎俩，以图乘时攘权而快私意，则国家不幸中之幸，庶或有一线之光明”。

3月8日 与白坚武访张树之。

《白坚武日记》：“八日 偕守常访张树之送别，未遇。遂至东安市场掷地球。复至一庐。归寓，知崔叔和白沪来访之于民友社。”

3月11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立宪国民之修养》一文，认为中国人由于专制积习未除，“尚情而不尚理”，“任力而不任法”，缺乏立宪国民应有之风度。故“欲有以救之，惟在上流阶级，以身作则，而急急以立宪国民之修养相劝勉”。所谓立宪国民之修养，“即依吾儒忠恕之道，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以自重之人格，各人均以此惕慎自持，以克己之精神，养

守法循理之习惯，而成立宪国绅士之风度”。文章强调，为人不应隐恶，“自隐其过，是谓自欺”；“为人讳恶，是谓欺人”，“皆为诚笃之士所讥也”。

3月14日 所写《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造不管部之国务员问题(三)》一文在《甲寅》日刊上登载。

3月17日 晤白坚武，并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造不管部之国务员问题(九)》一文。

《白坚武日记》：“十七日 早，往东城竹杆巷访守常。午后，偕泽民晚车赴津，在津刘寓小憩，往德义楼践约，十二时回刘寓息。”

3月19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一文，二十、二十一日连载。

3月21日 与白坚武访何海秋。

《白坚武日记》：“二十一日 早，访张新吾，未遇。午后，偕守常访何海秋。”

3月24日 所写《法国内阁改组之由来》一文发表在《甲寅》日刊上。

3月25日 同白坚武等游公园，并在《甲寅》日刊上发表《面包与和平运动》。文章指出“交战国间之不能足食，大抵相去不远，和平之曙光，必将昭发于面包问题”。

《白坚武日记》：“二十五日 早刻十时，访崔叔和未遇。午后，同守常、泽民游公园。守常云，西洋文明为动的文明，中国文明为静的文明。余甚以为然，惟其动也，故进取。惟其静也，故保守。”

3月27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

及其政纲》一文。

3月29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一文，指出：“今以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即彼貌托共和之‘官僚政治’，于今亦可不尝试。苟尝试焉，必且撻国民之怒，抑之愈甚，抗之愈力，终以激成险烈可怖之变动”。

3月30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的《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批评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指出侵略者以他们的理论“为文饰侵略之材料，奖励战争之口实，以有今日之惨祸。”文章认为：“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以自享之物为未足，而欲强夺他人之所有，是谓之贪。不思竭自己之勤奋，求新增之创造，以为自养，徒患自然惠与之不足，是谓之惰。惟贪与惰，实为万恶之原”。

4月1日 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发表《青年与老人》一文。文章认为，老人与青年，皆为社会之需要，宜互相协力，以促社会进步。“老人一闻青年之行动，辄骇为危险。青年一见老人之云为，辄嗤为腐败”，均为“野蛮的、非文明的、专制的、非立宪的”。

同日 在《言治》季刊第1册上发表《战争与人口(上)》、《美与高》、《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等文，及《筱舫、寿山将往阿尔泰，诗以赠之》、《前意未尽更赋一律》两首诗。诗的内容是：“一声笳咽一腔泪，万里城环万仞山。最是多情今夜月，共君犹自出边关。”“策马玉门关，不为儿女颜。悲歌辞易水，壮志

出天山。白草千层雪，黄河九曲湾。遥知断肠处，应有雁飞还。”

在这一天的《甲寅》日刊上，还发表了《最近奥国政变之颠末》一文。

4月3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学生问题》一文。

4月5日 所写《学生问题(二)》发表在《甲寅》日刊上。

4月7日 所写《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一文发表在《甲寅》日刊上。

4月8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讲演会之必要》一文。文章强调举行讲演会对丰富人民群众知识的重要作用，并指出讲演会之四大优点：“非部分的，乃普及的”；“非机械的，乃活用的”；“非专门的，乃常识的”；“非固定的，乃应时的”。

4月12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

4月14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快信一件。

《白坚武日记》：“十四日 早，收守常快信一件，内附卓廷函，晚复。拟明日代表东公至宁。”

4月15日 去广和楼剧场看新剧《自由宝鉴》。该剧描写二青年男女在上海求学，互相爱慕，遭家庭反对。婚后，经济来源断绝，不得已辍学，遂去北京。不久，被坏人盗骗，女坠身妓中，男患病而亡，女亦服药自杀。男女临终，表示不该听信自由恋爱之新说。李大钊观剧后，极为气愤，两天后写《不自由之悲剧》，发表于十九日的《甲寅》日刊上。文章指出，事情发生明为“不自由之结果”，但“该剧之精神乃归咎于自由。此种逆乎时代潮流之演剧，固足以代表目今中国社会之旧思想，而以演剧之功用言之，抑锐新之思潮而保旧腐之传说，实为社会

所不取，亦为现代文明所不许”。

4月16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大战中之民主主义》。文中谈到：“俄国当交战之初，一般官僚则以开战而谋击破勃兴之民主主义，故官僚派之机关报，莫不著论谓俄国之敌不在德皇，而〔在〕其国之自由派及其社会民主党。”

4月17日 所写《真理之权威》一文发表于《甲寅》日刊上。文章认为：“吾人论事析理，亦但求其真实之境而已，一时幻妄之象，虚伪之用，举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张也。”“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

4月18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文章赞同日本学者提倡以大亚细亚主义对抗欧美之大西洋主义的主张，但指出：“若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以嫁祸于余亚洲之同胞”。

4月20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受贿案与立宪政治》一文。前两日，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殷汝骊因受贿事发被黎元洪免职。陈锦涛被捕，殷汝骊逃走。李大钊从报上得知此事后，颇有所感，遂写文章评论。他认为，从此事可看到立宪政治之优越性。文章说：“今日之贿案，若在专制时代，其不官官

相护，以阴销于暗昧隐秘之运动者几希。今以议会之监督，报章之揭发，万众睽之共闻共睹，魑魍魑魅乃以难逃于舆论国法之征诛，政治当局亦不敢显为袒右，则此案之发觉，直可谓立宪功用之所赐也。”

4月21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罪恶与忏悔》一文，认为“一个罪恶之构成，因果复杂，决非当事者之一人所能致”。“试寻政治上、社会上之腐败，足与个人以易堕落于罪恶之暗示模仿者，其端甚多，不遑枚举”。文中举出三项：“势位之足以保障罪恶”、“法律失其权威”、“奢侈之风盛行”。

4月22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简易生活之必要》一文，提倡生活简朴。“吾人自有其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之，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族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利作奴隶。”

4月23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中心势力创造论》一文，提出中国所以日益衰弱，是因为没有中心势力。文章说：“今日国家所有之势力，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而此分崩之各个势力中，又皆无其中心之物，足以统率此散漫无纪之团体，以致政象日涣，人心日离，如孤舟泛于风涛澎湃之重洋，海天无既，茫茫然莫所适归，斯诚政治上绝大危机也”。所以，要使国家强盛，必须创造一种新的中心势力。“自今而后，国民宜速自觉醒，驱逐此政治的营业者于政局之外，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混势抢攘之政治，庶或有澄清统秩之一日乎。”

4月24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

和运动》。文中在谈到俄国情况时说：“当俄京骚动之际，其各大都会，赤旗飘扬，一挥而蔽罗马那夫朝之日月，而CDPN之帜，到处与国民以绝明之痕印，不啻为社会民主党建纪功碑于人人之脑中。”

4月26日 所写《川局罪言》发表在《甲寅》日刊上。

4月29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文章指出：“中央集权之语，即本此向心主义而出；而自治、民治云者，亦即基于离心主义以与之对立而反抗也。最近世界政治之趋势，向心主义之势力日见缩减，离心主义之势力日见伸张，此为不可掩之事实。居今日而犹谋保存此十八世纪遗物之向心主义，乃无异于自绝。”

5月4日 与白坚武访刘愚白。

《白坚武日记》：“四日 访米市胡同俱乐部同人。午后，田克苏、林质生来访，同守常沐浴后，偕崔叔和访刘愚白，愚白，余之小试同年友也。少顷，李味斋、张新吾、陈笃芝来，遂同为不速之客，饭后同访张敬舆，此君议论风生，慷慨直陈，军界中谙政治者也。守常明日回里看细君病，约代为甲寅日刊作文，意绪纷冗，恐不能如愿也。”

5月5日 回乡。

李大钊《旅行日记》：“昨晚八时三十五分，由北京乘京奉通车出发。”（《甲寅》日刊，1917年5月9日）

5月6日 天将破晓，车过雷庄，李大钊忆起此处为辛亥革命时滦州革命军失败之地，不胜感慨。到昌黎后，乘骡车再游碣石山。

李大钊《旅行日记》：“天将破晓，过雷庄，猛忆此为辛亥滦

州革命失败之地，白亚雨先生、王金铭、施从云二队官及其他诸烈士，均于此地就义焉。余推窗北望，但见丘山起伏，晓雾迷濛，山田叠翠，状若缀锦，更无何等遗迹之可凭吊者。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象，以表彰之。然国人素性，但知趋附生存之伟人，不欲崇礼死去之英雄，斯等事又何敢望哉！”

5月7日 抵里。

李大钊《旅行日记》：“明晨南归，尚有陆路八十里，余容续陈。”

5月21日 在《甲寅》日刊上发表《自由与胜利》一文，指出自由与胜利系努力之结果。文章表示：“吾愿吾国民爱自由、爱胜利，吾尤愿吾国民之勇于努力。”

5月23日 写信给《甲寅》编辑部，述其在家之活动。信中依据听到乡间父老对时局的一些看法，认为“真正之舆论，在乡间不在都会”。这些舆论，“且较都市中人，共和则群趋共和，帝制则群趋帝制，徒为一时势力之气焰所驱役，以致丧其识察之真知直觉者，真实确正万分矣！”信中还说：“吾乡久旱，麦苗均渐枯槁。农家待雨孔急，争在庙宇神前作祈雨祷，仍无验兆。月余以来，麦粉腾贵，粮价陡涨，农父相见辄为唏嘘，谓今岁麦已丧其有秋；长此旱魃，大秋收获亦将无望。农民唯一之希望，乃在以汗血滴滴之辛劳，易一丰年耳。倘丰作一失，则生计之苦，殊难谋救济之途。以此思忧，忧可知矣！”这封信在五月二十八、二十九两日的《甲寅》日刊上连载。

6月22日 自乡回北京。

《白坚武日记》：“廿二日 守常自里来。小孩至今日十二

天。”

6月25日 由北京至天津。《甲寅》日刊发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及教务长易人》一文，系李大钊所作。

《白坚武日记》：“二十五日 暑气甚炎，未出门。守常、泽民来津。”

6月26日 与白坚武等访新吾、溥泉。

《白坚武日记》：“二十六日同守、泽到新吾、溥泉寓处。收家谕一件。”

7月初 张勋在北京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李大钊仓皇离京赴上海。

《白坚武日记》：“廿二日 守常来信已抵沪。复守常信并致伯兰信。同钱向忱、温佩珊游半园百花洲，步行归署。”

7月29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二十九日 早，收守常、泊寓各一件，并二兄来信。日来深以慈躬为念，接谕心始贴然。赴怡园招待彭静仁、常藩侯午宴奉陪。”

8月4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四日 收守常来信一件。赴光亚公司买磁器，洋一元七角。收宋仲彬来信一件。”

8月6日 寄诗给在江西赣江的白坚武。

《白坚武日记》：“六日 守常、采言各来函一件。守常并寄见怀诗一首，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惟哀愤稍过，会当有以慰勉之。录原诗如下，客居纠纷，未克答和，敬俟异日。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忆到万山无

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

8月15日 在《太平洋》第1卷第6号上发表《辟伪调和》一文。文章指出，民国以来，“缓进派与官僚武人相结，附敌同攻，助纣为虐，而一而再，不自忏悔。”他们“有一夙抱之梦想，与民政不容，与国体不适，即所谓开明专制与贤人政治是也。”其结果，“将以自存，适以自毁；欲以自利，反以自杀。此类之政治活动无以名之，名之曰伪调和；此类之政治团体无以名之，名之曰伪调和派”。

8月26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二十六日 访冠峰表兄叙谈。午后三时，督军请谈话。接到守常来信一件。刘督军通电一则，奉批嘱复赵执叔，请游秦淮河。”

8月27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二十七日 办刘督军复电稿。守常来信一件。”

9月11日 函白坚武。

《白坚武日记》：“接守常一函，介绍姚君祖义。守常为人，品洁学粹，俯仰今日之污世，大材不克收相当之用，余年来清友惟斯人耳。来函有言：今日所能得之佳象最佳，亦与今象不甚相远，今日所能得之恶象最恶，亦与今象不甚相远。兄试澄心以思，吾等所夙夜寐兴所构求之好消息，实亦至无聊赖。放眼神州，即吾侪所谓好消息之一境，衡诸国家政治之性质品位，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此真所谓沧海横流人间何世也矣。可谓伤心见到之语，非一般时流政客所能梦见也。”

9月 写信给在北京之友人李泰棻。信中说：“国变日别

后，仓黄（皇）出京，未及走辞为歉。南来栖迟沪，浹日无聊赖，幸有投止之所，不至漂泊旅馆，惟以读书自用，尚足告慰耳。返至于发表言论，今已全非其时，即有所欲言，亦无正当之言论机关供吾发表。大抵今日之民党已失其正系，不偏于溺，则流于暴，求能平心静气，刚毅不挠，依据法律以与强暴之势力为恒久之抗拒者，盖无闻焉矣。前不自禁，偶为太平洋作文一首，既而思之，又自深悔。以今日人心之沉溺于利，欲逆耳之言，庸何能入？且吾侪年少，性平修养未充诚信，中学未足格物，有所论列，徒召恶感，不足悔人，诚不如缄默自守，徐俟劫尽之期，听其自忏之为愈也。”

10月15日 在《太平洋》第1卷第7号上发表《暴力与政治》、《此日》两文。

《暴力与政治》说：“愚虽非如梁先生之单纯反对革命，而以良知所诏，则无论何时皆反对暴力，其终极目的，亦在消免革命之祸。苟有术焉，纳强力于法律范围之中使不为暴，则吾侪反对革命之勇，庸诎逊于梁先生。盖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革命虽不必尽为暴力之反响，而暴力之反响则必为革命；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故反对革命者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孰果穷因，宜如是也。”

《此日》认为：“以世运所逼，吾人仔肩所负之责任，愈益繁重。宜自今日起，至翌年此日，划为一期间，来年以下，亦复如是，而皆定其应做之事业，立其应达之目的。即以此未来之一一年，为吾国民历史之一页空白，待吾人本其优洁美尚之理想，施其敏断刚毅之努力以绚书之，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

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

10月18日 至南京，住华洋旅馆，晤白坚武。

《白坚武日记》：“十八日 访陈雪轩订宴，为冯乐轩荐七十四旅充书记官。快函于康子修，令促其来。守常来相谈尽欢，函督军订见期。”

10月19日 晤白坚武。

《白坚武日记》：“十九日 早刻，赴华洋旅馆看守常。”

10月21日 与白坚武等赴金陵大学观游艺会，并游明孝陵。由白引见江苏督军。

《白坚武日记》：“二十一日 在陈雪轩处晚饭，偕守常、雪轩、叔和赴金陵大学观游艺会。六师武技练习，甚有可观。津寓来函一件。温佩珊代购铁床洋四十二元。

偕守常见督军，接洽赴日事件。午后，同温佩珊、徐襄平、谢晋卿合照一影。游明孝陵，缘坂扶茅登高陵而上，体力颇疲，席地憩片时，下陵饮茶。归途遇一老丐乞钱，询之则山东沂州人也。出黄石一块相赠，给铜枚十五六。孝陵工程较长陵远所不如，开国之君尚朴也。返过古物保管所，稍周览。赴金陵春，代表督军请彭静仁、李守常二君，同任其事为温佩珊，陪者为杜扶东、施鹤初、程蒹斋、徐襄平。今日共游者余及李、彭、温、杜、陆绍文、徐、谢晋卿计八人。”

10月22日 江苏督军请李大钊先回上海候行，并赠路仪百元。

《白坚武日记》：“二十二日 午刻，留守常、新吾、何君饭。督军约何君明早十一时会谈。督军请守常先回沪候行，送路仪百元。”

10月23日 陪江苏督军游莫愁湖。

《白坚武日记》：“二十三日 唐将军代表何民岳早来访，张新吾陪见。督军游莫愁湖，并观粤军烈士纪念碑。归途游胡园，同游者何民岳、张新吾、李守常、朱叔程。”

10月29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二十九日 守常一函，并东公转梁俊峰一函。即复守常一函。”

11月9日 赴宁，会白坚武。

《白坚武日记》：“九日 守常来宁，代表某君有所接洽。武问泉来谈。晚，督军召集会议。”

11月10日 与江苏督军接谈，白坚武赠诗。

《白坚武日记》：“十日 阅报悉日美宣言披露，驻美顾使云内幕，尚有密件。午饭，留施鹤鹑、襄平、守常饭。约施及襄平赴三新池沐浴。襄平竟作主，浴罢，至太平巷陈寓访守常，遂同至督署晚饭，督军约九时接谈。守常北行，吾党感于年来行役之不得尽其材，缘斯自负所天湛然深悟者，惟兹一人，吾党灵光，赖以仅存于其行也。赠以诗，以敦其志。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夜十二时，匆匆作。”

11月11日 离南京北上。

《白坚武日记》：“十一日 星期 早赴华洋旅馆访守常，又同赴文德里访崔叔和、高质青。留送守常北行，到下关，路遇徐襄平，小聚瀛州旅馆，在宝记照像馆同撮一影。晚，小饮致美楼，归乘小火车至署。”

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八年(中华民国七年) 二十九岁

1月20日 十九日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进德会。李大钊为甲种会员。

《进德会报告》：“甲种会员十九人：夏元璠、李大钊、许绍癸、江益朋、郑阳和、刘绍文、卢恩、王造周、姜懋昌、杨吴泽、余庆铨、董弄、邓之诚、孙诒棫、吴道锤、李振彝、程绪颐、马云骏、吴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20日）

2月 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金毓黻《李大钊与五四运动》：“我根据北京大学档案不完整的记录，知道章士钊是在一九一七年任北大教授，又从是年九月起兼北大图书馆主任，到一九一八年二月，章先生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李大钊继续他作图书馆主任，蔡先生就答应了，自是时起，大钊先生就作了北大图书馆主任，但是不兼教授。这是我从一九一八年上季班印的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考察出来的。”（《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49页）

2月2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二日 二兄来谈家事。苏硕如来访。席桐卿、夏竞民、齐地山、崔竹平、吴梦兰、李问渠俱来笺贺新年禧。李守常、陈雪轩、苏少衡、刘次豪、梁峻峰、王席珍、王幼侨

俱来函，归始拆阅。”

2月17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十七日 午后三点至浦口下关，警署长许鹤舫招待至署，稍坐，雇马车来署。”“拆阅守常、崔可亭、张适吾、张新吾、宋仲彬、马干宸、尹蕴清来函。”

2月18日 与周同焯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

《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发起人启事》：“大钊等，为便于同人学习法文起见，商清华法教育会会员龚礼南先生，附设一夜班于本校，业经校长认可。凡本校同人及本校同人所介绍者，均可入班。愿学者请至斋务课报名，以便过期开课。发起人：周同焯、李大钊、段宗林、李辛白、徐之杰同启。”（《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8日）

3月1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馆主任告白》：“（一）前据化学讲演会全体会员函称：化学书籍太少，而借出者又久不归还，以致学者无由研究。拟请将借书规则酌加修改，凡一种书籍无两帙以上者，不论教员、职员、学生概不借出等语，所陈甚是。除一面查照各国大学图书馆章，厘定一完善章程，请校长核准定期施行外，希望参阅化学书籍者，尽可能在阅览室阅览。其余借出各书，仍乞按期限归还，以免多数向隅，此白。

（二）迭据学生诸君函称，国史馆及各科研究所，由本馆借书甚多，且无期限，殊有滞碍等情。查本馆与国史馆及各研究所，虽为分立机关，而于书籍之享用，究当谋一联络之方法。俟与国史馆及各研究所商定一互相借书之规则，次第施行，总期使各处图书可以循回转置流通阅览，俾收最大最普之效用，

以利研究而惠学子，此白。

(三) 查本馆旧章，向无关于寄存图书之规定。现在颇有愿将私有图书寄存本馆俾众阅览者，因拟定简章数条，业经校长核准，即日施行，倘有欲寄存图书于本馆者，本馆甚为欢迎，一切照寄存图书简章办理。此白。”

3月4日 《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李大钊给日刊记者的信函。全文如下：“记者足下，友人张君国威原名国宾，富有恤性，尝留学日本，习陆军。一日游游就馆（在九段公园靖国神社旁，中陈甲午庚子两役由吾国虏获之物品甚多），见而大愤，挥拳击毁之，为日人所捕。某公使敬其忠勇，为更名国威，仍令留学。辛亥事起，张君归沪，督率义军，厥功颇伟。民国建立后，复返日本，在早稻田大学习矿科。卒业归国，赴粤开矿，以诸多阻碍不克用其学。乃于去岁应沪上赴法华工之招，刻已抵法国矣。兹得其由法来函，述华工状况颇详确，特将原函录呈概要，请登入日刊，以为有志赴法勤工俭学者之介绍，余不白。李大钊。”

3月10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十日 午车回沪（宁），归沐于下关大观园。回途访李实忱，谈沪宁近情。归署，阅苏冠峰、李守常、韩一山来信，冠峰前云令四侄入学兵营，今特来函催约。”

3月12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十二日 接李风岐来函一件。李守常函询近况。”

3月15日 偕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四人参观清华学校。通信《李大钊先生来函》：“记者足下，本月十五日偕本校

图书馆职员章君、邓君、盛君、商君等赴清华学校参观，约早八时半许，由校乘人力车，十一时许始抵该校，备承清华校长赵先生、图书馆主任袁先生及各机关诸职员最诚恳之招待，且备中餐焉。袁先生由午前十一时至午后五时，耗六时间宝贵之光阴，导吾辈遍观各处，一一为亲切之说明，尤令人铭感无已。兹将当日所得之情形，为足下约略陈之，尚乞假以余栏，公诸校友，一以资观感，一以申谢意焉。”“(一)图书馆”、“(二)兵操及童子军”、“(三)斋房之整饬及厨房浴室之清洁”、“(四)学生储蓄银行”、“(五)清华学报及清华周刊”、“(六)职教员及学生之校外活动”、“(七)售品所及木厂靴鞋铺”、“(八)体育馆”、“(九)音乐团花卉室及游艺室”、“(十)学校警察之分布”。(《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19、20日)

3月20日 赠北京大学图书馆《乐群》杂志一册。

《图书馆布告》：“又顷承本馆主任赠下乐群杂志第一期一册。特此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0日)

3月29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二十九日 接守常一函，即复。寄张泽民一函。”

4月15日 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发表《今》一文，批评了热心复古和盲目乐今的观点，主张“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文章还谈到：“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

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3—4月 连续寄信给林伯渠,介绍十月革命情况。

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如何联系群众,如何组织军队,在实际生活中有些新的认识。”(《“一大”前后》(二),第31页)

4月18日 所写《强力》一文在《政法学报》第2期发表。

4月25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二十五日 内子来宁。接张泽民函一件,李守常函一件。”

4月26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并《新青年》一册。

《白坚武日记》:“二十六日 晨,登北极阁,访陆绍文,谢晋卿来访。接李守常兄来函,并赠新青年一册。闻卢子嘉军使、段芝泉总理,俱于今明日来宁,斯亦可谓北洋联络之表示欤。”

4月29日 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捐献《独立周报》三十二本。

《图书馆书目室启事》:“又承本馆主任李先生捐赠独立周报:第一年十四期(全),第二年念一期(全),俱共三十二本。”(《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29日)

5月15日 《新青年》第4卷第5号登载李大钊的《新的!旧的!》一文。文章认为:“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

5月24日 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捐献《学艺》第三期一本。

《图书馆书目室启事》：“(一)顷承李主任先生捐赠本馆学艺第三期一本。除编号存馆专函鸣谢外,特此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4日)

5月27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二十七日 李督请蓝公武陪宴。张则民来函一件,即复。守常来函一件,即复。”

5月28日 北大日刊公布李大钊捐助北京大学校役书费票银叁元。

《斋务课报告》：“捐助校役书费清单(第一次)”“李大钊先生捐票银叁元。”(《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8日)

6月1日 当选为北京大学进德会纠察员。

《进德会报告》：“被举之评议员、纠察员题名。本会之评议员、纠察员选举票,至本月一日始检毕。今先揭当选人姓名及其票数于左,其他各人所得票数,嗣后亦当排日揭载,以供众览。”“纠察员当选者:吴继哲八〇、郑阳和七五、江智六四、李大钊六二、梁展章六二、周榕五六、李辛白五三、徐之杰五〇、刘绍文四八、章士镛四五、章献猷四五。以上职员十一人(原定十人,因二章君票数同,故增一人)。”(《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6月3日)

6月2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二日 偕徐襄平在长松东号酬温居之客。收守常一函。”

6月5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馆主任告白》：“现拟于暑假期中,将馆中存储图书查检一次。自六月十

五日起，无论中西图书，一律停止借阅，并望将以前借阅之图书，务于暑假以前归还，特此告白。”

6月7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七日 收守常函一件，则民函一件。复守常一函。”

6月17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十七日 则民来函一件，守常来函一件。”

6月19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寄来《新青年》。

《白坚武日记》：“十九日 日来胸膈不清，懒饮食，晚饭特减食一次，略饮汤少许。收到守常寄来青年。”

6月29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馆主任告白》：“（一）现因暑假临迩，天气渐即炎蒸，离校者亦复甚众。图书馆开馆时间，应即酌为变通。自七月一日至九月十日，每日由上午七时至十二时开馆，下午及晚间闭馆。

（二）现在假期将届，所有借书逾限未交者，仍乞速行交还，以便清理，否则惟有照章停止借书权，特此予告。”

出席北京大学进德会评议员、纠察员第一次会议，并被推定为《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四编辑之一。

《进德会启事》：“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进德会评议员、纠察员第一次会记录。

本日到会者二十九人，姓名如左：

蔡元培、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陈宝镛、高日采。以上六人评议员。

李煜瀛、郑阳和、江智、钱玄同、陈大齐、李大钊、胡适、康

白情、朱一鹗、王恩久、李辛白、徐之杰、王少石、肖纯锦、陈汉章、蔡镇瀛、马寅初、陈邦济、江永一、黄中、寥书仓、梁展章、吴继哲。以上二十三人纠察员。

(一)李大钊君提议,改会名为‘有不为会’,讨论结果,赞成者少数,又以仍用旧名付表决,赞成者多数。(二)李君又以纠察员之职任与其职任之履行,颇不易做到,提议废除纠察员之名。座中讨论时,有提议以被举之纠察员,悉改为评议员者,以举手表决之,赞成者大多数,作为通过。(三)议推书记二人,掌本会通讯记录之事,当即推定江智、傅斯年二君。(四)议定本会刊行杂志一种,大约每季一出,定名为《北京大学进德会杂志》,当即推定编辑员四人:沈尹默、钱玄同、李大钊、康白情。(五)议决废除原定甲、乙、丙等阶级,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之条,为入会者必要条件,其余五条戒律,由会员自由任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7月4日)

7月1日 《言治》季刊第3册发表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强力与自由政治》、《调和之法则》、《调和贖言》、《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胡适〈美国的妇人〉跋》、《雪地冰天两少年》等七篇文章,以及四篇译文:《精琦氏宪法论》、《世界观》、《国家与个人》、《哀音》。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对比了十八世纪法国革命与二十世纪俄国革命之不同,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文章提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

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调和之法则》、《调和臆言》两文强调平衡矛盾双方的力量，指出：“欲使社会为有秩序之进步，最宜使二力同时皆有活动之机会，即使二力为空间的交互动作，勿使徒为时间的交互动作。”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认定：“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两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

7月9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馆主任告白》：“迭据学生诸君面陈，欲利用假期，阅览书籍，拟请将开馆时间略为延长。兹为尊重诸君好学之意向起见，自七月九日起上午七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六时开馆，汉文复本书籍，亦准借阅，特白。”

同日 参加商讨创办“世界图书馆”。

《世界图书馆之发起》：“七月九日午后四时，本校编译会开茶话会，欢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菊生先生。是日，蔡校长及本校讲师李石曾君提出创办‘世界图书馆’议案，因请张先生于午后二时到校，并约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君，及京师图书馆迁移午门筹备员陈仲骞君到校会议。本校胡适之、沈尹

馥、朱遯先、钱玄同、马幼渔诸教授皆在座。提议后，全体赞成。张先生遂函告上海商务印书馆，顷已得来函赞同。拟由华法教育会报告于巴黎会所，积极进行。大约半年以内，此事当有成议矣。”（《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8月17日）

7月15日 所写《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一文发表在《太平洋》第1卷第10号上。文章写道：“吾目所见者，皆Democracy战胜之旗，耳所闻者，皆Democracy凯旋之声。顺Democracy者昌，逆Democracy者亡，事迹昭然，在人耳目。奈何今之人，犹纷纷树Pan……ism之帜，或依于其下以与Democracy为难，其不自取覆亡者鲜矣！吾不暇为失败之Pan……ism哀，吾但愿为胜利之Democracy祝！”

7月17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十七日 日本将出兵西伯利亚。接家谕、守常各一件。”

7月26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二十六日 接李守常、冯劳宣函各一件。腹泻稍愈。午后骤雨。接崔丽叔一件。”

7月30日 北大日刊公布李大钊等同意遵守进德会有关戒约条款。

《进德会启事第七号》：“附填写愿书说明书：（一）本会三级办法业经取消，改定办法如下：（1）不嫖不赌不纳妾，为本会基本条件，凡入会者皆须遵守。（2）其他五项（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为自由选择条件，任会员选择，或全认之，或选数条认之，或全缺之，均听自便。但一经认定，即与基本条件发生同样效力，不得违反。”

入会会员姓名及守戒约条款如左（截至七月二十七日止，以后寄到，陆续再登）。“守本会基本三条戒约外加（不饮酒、不吸烟）者十二人：李大钊、王有德、胡祖植、高宝寿、李寰、杨步瀛、俞士镇、卢勃华、常惠、徐宝璜、邹德高、吴澹。”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7月30日）

7月 参与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

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去年留东同人归国，首由北京会员王光祈君提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一册，书中历叙同人今后进行，宜为一种有统系的有秩序的，并草拟学会规约大纲数十条。其时东京会员曾琦君等亦正有建设学会之计划，乃先派雷宝菁君归国接洽一切，同人意见遂归一致。曾琦君、张尚龄君亦先后由东京归国，乃有七年六月三十日岳云别墅之会议。

岳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到会者为：陈君涌、张君尚龄、周君无、曾君琦、雷君宝菁、王君光祈六人。会议结果，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遂由王君光祈草拟规约数十条，复在岳云别墅会议修改数次，并邀同会员李君大钊商榷一切。于是本会规约七十条全体产出。当时列名发起者，则为陈涌、张尚龄、曾琦、李大钊、周无、雷宝菁、王光祈七人也。”（《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

8月1日 白坚武接到李大钊寄来《新青年》。

《白坚武日记》：“一日 访王振羽、李甲三。收到守常寄来新青年六号。”

8月7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七日 会谈安得森、温佩珊。收守常信

一件。”

8月11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十一日 李守常来函一件，移家议作罢。”

8月19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内附白话诗三首。

《白坚武日记》：“十九日 接李守常函一件，并白话诗三首，为记之。山中即景：（一）自然的美，美的自然。绝无人处，流水空山。（二）人在白云中，云在青山外；云飞人自还，依旧青山在。（三）一年一度果树红，一年一度果花落。借问今朝摘果人，忆否春雨梨花白。（佳处颇有司空图诗品风味）

悲犬：我初入山，犬狂吠门前；我既入山，犬摇尾乞怜。犬哉犬哉！何前倨而后谦！”

9月10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主任告白》：“本馆书籍，分贵重与通常二种，除贵重书及各国文辞典久定不出借外，东西文普通书，凡只有一部者，亦既规定概不借出馆外（新定借书规则第二条），兹审度情形，特再规定：凡普通书虽有二部以上，而版次不同者，亦只出借其旧版，新版者仅得在馆阅览。此种办法，纯为谋大多数人阅览便利，并为慎重保存起见，本出于不得已，同学诸君，务希深体此意为要。”

9月14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馆主任布告》：“现在本馆业经照常办公，所有属于本馆各职员，务乞按规定时间到校办公，至盼至要。”

9月25日 参加北京大学编译处会议。

《本校编译处开会纪事》：“九月二十五日午后三时，本校编译处在校长室开会，到会者列名如左：刘叔雅、马寅初、陶孟

和、胡适之、王抚五、何伊架、程骏甫、李石曾、李守常、高一涵、陈百年、朱继庵、宋春舫、陈独秀。”

“开会之初，蔡校长报告二事：

（一）代表组入法文协会事 法文协社，为各团体所组织，编译处亦其一也，曾于本月十四日，开评议会一次，议决推陈独秀、胡适之二君为代表，组入协社，惟专任法文名著直译事。”

“（二）补助科学杂志事”，“因提议于编译处每月经费中，提出二百元，补助科学社。到会者皆赞成。”（《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27日）

9月 介绍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

蒋梦麟《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便拿起笔来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

10月3日 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刘复编订的《歌谣选》供稿。

《歌谣选》：“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来稿：瘦马拉搭脖，糠饭糝子活。直隶乐亭一带，地主多赴关外经商，农事则佣工为之。此谣乃讽地主待遇工人不可太苛。言地主以糠饭食工人，则工人所作之活，亦糝子之类也。”（《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3日）

10月4日 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刘复编订的《歌谣选》供稿。

《歌谣选》(三五):“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来稿:
春鳊秋鳊,白眼割谷。

乐亭滨海,产鱼。鳊、鳊、白眼,皆鱼名。春时最肥美者为鳊,秋时为鳊,割谷时则为白眼。”(《北京大学日刊附张》,1918年10月4日)

10月5日 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刘复编订的《歌谣选》供稿。

《歌谣选》(三六):“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来稿:
不剔辫子没法混,剔了辫子怕张顺。

入民国来,乡间盛传此谣。张顺殆张勋之讹。复案,剔字当是薙字之音转。”(《北京大学日刊附张》,1918年10月5日)

10月14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馆主任布告》:“本馆现拟迁往新大楼,惟以书籍繁多,非顷刻所能毕事,只有陆续搬运。自本月十四日起,每日上午闭馆,下午及晚间仍在旧舍开馆,照常办公。此白。”

10月16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馆主任布告》:“本馆第一阅览室设在新大楼第一层第二十九号室,专备阅览中外杂志之用,现已布置完竣,由十六日起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启室办公,晚间暂停,此告。”

10月22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馆主任布告》:“本馆办公室一概迁至新大楼第一层,各阅览室亦皆布置完竣,自今日起,即在新舍照常办公,此告。”

10月26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主任告

白》：“(一)本馆第二阅览室设在新大楼第一层第三十一号室，专以陈列各种日报，现已到有十五种，详表另行揭布，凡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均可随时入览。

(二)本馆拟将阅过之月报，汇存备考。本校各办公室如有阅过之报，幸勿掷弃，每旬日或半月送交本馆一次，至为感禱。

(三)本校所设阅报室不止一处，本馆极愿相与联络，除数种必不可少之报外，其余订阅中外各报，能随时协商分购，以求齐备而避重复，可以定期互换陈列，殊觉便利，各表同情，即乞将所陈各报名目登布日刊，然后互定交换陈列之法。”

10月 帮助并支持成立学生救国会。该会于二十日成立国民杂志社，李大钊应邀为指导。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约请了李大钊先生做我们的指导，约《京报》主笔邵飘萍和画家徐悲鸿做我们的顾问，并约杨昌济(怀中)先生为我们写文章。尤其是李大钊先生经常给《国民》写稿。”(《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

10月中 介绍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其时在愚生家聚谈之会友不过九八人，在十月中，才由李守常介绍毛泽东加入，成为座上之客。”

11月中 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中宣传俄国革命的伟大意义。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在十一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联餐席上，开始称道俄国的共产革命，认为比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得更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上，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

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

11月19日 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新潮社》作社址。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十一月十九,开第二次会。”“李守常先生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拨给了新潮社用。”“本年一月一日,第一号出世了。”(《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

12月3日 受聘任新潮社顾问。

《新潮杂志社启事》:“本部敦请图书馆主任、庶务处主任为顾问。所有本志印刷、登广告、发行及其他银钱出入事项,即由两主任分派出版部杂务课、会计课事务员执行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3日)

12月6日 北大日刊登载李大钊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演说,讲题为《庶民的胜利》。给北大图书馆捐赠《言治》等四册。

《杂录》:“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主任在中央公园之演说”(《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6日)

《图书馆(书)目室启事》:“顷承本馆李主任捐赠本馆:

今井博士《建国后策》一册

国耻之一一册

民彝第三号一册

言治第二号一册”(《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6日)

12月21日 代表北京大学图书馆参加“北京图书馆协会”,当选为中文书记。

《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纪闻》:“北京图书馆协会于去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午后二钟，假本校文科事务室开成立会，各馆代表到会者共二十人。当将会章及附则各六条议决通过，并即选举职员。清华图书馆代表袁同礼君当选为正会长，副会长本校图书馆代表李大钊君，与汇文大学图书馆代表高罗题君 Mr Galt 得票相同，即提出高君请众认可，高君当选为副会长，李君当选为中文书记，协和医学校图书馆代表吉非兰女士 Miss Crilfillon 当选为英文书记，北京图书馆协会遂完全成立。兹闻将于本星期六日即二十五日下午一时半，仍假本校开第一次职员会，商议进行方法云。”（《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1日）

12月22日 与陈独秀共同发起创办的《每周评论》创刊。

胡适《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日在北京大学的讲演》：民国“七年，陈先生和李大钊因为要谈政治，另外办了一个《每周评论》，我也不曾批评它。他们向我要稿子，我记得我只送了两篇短篇小说去。”

12月23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馆主任布告》：“近来各科学生，由馆借阅书报逾限多日不肯缴还者，竟居泰半。此种习惯，大失书物流通之效用。所有借书逾限者，应即于年假内缴还，以重公益。自明年开学日起，不缴者一律照章停止借书权。此布”。

12月27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来函及《每周评论》。

《白坚武日记》：“二十七日 李守常来函一件，并寄到每周评论一册。”

12月 为曾琦所著《国体与青年》一书写跋。文中指出：“资本阶级或中产阶级的Democracy若已获得，紧接着社会主

义,就是 Democracy 中的一个进程,不要把他看作与 Democracy 是两个东西。”

本年 写《俄罗斯文学与革命》,未能发表。文中论述了十九世纪俄国诗歌的作用,并对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杜勃罗留勃夫等作了介绍。文章还指出:“今也赤旗飘扬,俄罗斯革命之花灿烂开敷,其光华且远及于荒寒之西伯利亚矣。俄罗斯革命之成功,即俄罗斯青年之胜利,亦即俄罗斯社会的诗人灵魂之胜利也。”

一九一九年

一九一九年(中华民国八年) 三十岁

1月5日 《每周评论》第3号发表李大钊在元旦写的《新纪元》。该文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

1月9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九日 寄张则民一函。李守常来函一件，即复。”

1月15日 任“北京大学学生游艺大会筹备会”职员，负责“保管字画部”工作。

《学生游艺大会筹备会通告(第二号)》：“本会筹备职员，于前日开会推定，由蔡校长及画法研究会干事，分头征求同意。兹列之如下。北京大学学生游艺大会筹备会职员名单：”
“七，保管字画部：李大钊、郝桂林、贺牧西、姜恩后(画会)。”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17日)

1月 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庶民的胜利》、

《Bolshevism 的胜利》两篇文章。

《Bolshevism 的胜利》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Bolshe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文章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情况，说：“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文章最后指出，俄国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月19日 所写《北京的“华严”》、《新自杀季节》、《面包问题》等文，发表在《每周评论》第5号上。后文指出，战后日本“面包问题”甚为严重，而“一般武人，却是一日跋扈一日，压迫自国的平民，还在不算，更想和别国的武人勾结，害别国的平民”。

1月22日 和白坚武谈论近局。

《白坚武日记》：“二十二日 吴子超来访。访范静生，接洽未遇，留李督函，约再会。晚车赴京，寓李守常家，谈论近局。”

1月24日 陪同白坚武参观北京大学图书室，并访张适吾。

《白坚武日记》：“二十四日 午访梁燕孙、周子虞，道来意。参观大学图书室。偕守常访张适吾于东四三条。访王铁

珊，晤其子。”

1月25日 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学余俱乐部”。

《学余俱乐部征求会员启事》：“敬启者，同人等发起学余俱乐部，如本校教职员学员诸君，赞同此旨愿入本部为会员者，请惠寄台衔，赐交（文学研究所）左翼苍、（图书馆）李守常、（英文研究所）杨真江、（哲学研究所）肖鍊尘。”“俟择日再开成立大会，兹将发起简章列后：

学余俱乐部发起简章

第一条，本部宗旨，因本校同人求学余闲，藉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为主，不涉校外之事，暂定名曰学余俱乐部。

第二条，本部地点附设地学会内（东安门内北池子盍头作）。

第三条，本部会员暂以本校为限，如校外同人得本会会员介绍皆可入会。

第四条，本部备有各种书报，并随时罗致有关考证之古物及艺术品，专供本部同人展览。此外，次第组织游戏部，如拾球、投壶等类，文艺部如诗社词社等类。

第五条，本部会员月纳会费一元，由本部按月派人征收。其会员中现充学员者，会费得减为每季一元，按四季交纳。

第六条，本部于年终及暑假时，宴集各一次，愿与宴者届时另行组合。

第七条，本部职员应公推正副部长，常务干事及评议员等，俱一年公举一次。

第八条，本部事务及款项出纳，应由干事员按照议订会章

时所定章程，办理报告，以供众览。

第九条，本简章未尽事宜，俟征求众意后，再定详细章程，以期尽善。

发起人：吴梅、杨真江、肖鸣籟、冯祖荀、邓之诚、滕统音、朱希祖、叶瀚、刘光震、黄侃、左贯文、盛铎、侯毅、童学琦、蒯寿田、蔡元培、张相文、陈钟凡、徐宝璜、肖清海、陈浏、唐鸿志、李续祖、许绍獬、马裕藻、孙诒棫、狄福鼎、马衡、沈尹默、陈邦济、李大钊、胡适、夏镜澄。”（《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5日）

1月26日 在《每周评论》第6号上发表《政客》、《国民仲裁》、《平民独裁政治》、《过激乎？过惰乎？》、《乡愿与大盗》、《放弃特殊地位》等文。后文指出：“德国要想在世界上得一个特殊地位，惹起了一场世界大战。”“日本要想在世界上对于中国占特殊地位，也必要步德国的后尘。”

1月29日 北大日刊载李大钊曾送胡适之太夫人贽仪洋交票五元。

《马寅初启事》：“敬启者，本校同人等送胡适之先生之太夫人贽仪洋，多由鄙人转托学生银行代收。兹将贽赠人之姓名、数目开列于左，即希稽核。如有遗误之处，亦请函示，俾便查明更正。又自经手之日起，结至本月二十四日止，所收现洋四十五元，中票一百四十元，交票四十六元，亦于表后注明。惟事由银行经理酌取手续费现洋二元，以酬银行行员之劳，一并声明。”“李守常先生交票五元。”（《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月29日）

1月30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馆主任布告》：“二月一日为旧历春节，二日三日又为本校开游艺大会之

期，自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图书馆各阅览室一律闭馆，初四日照常开馆，此告。”

1月31日 协助《晨报》第七版(副刊)设立《自由论坛》。

《本报改良豫告》：“本报从二月七日起(即旧历正月初七日起)将第二张大加改良：(一)增设自由论坛一门，欢迎社外投稿，凡有以新修养新智识新思想之著作惠寄者，无论文言或白话皆所欢迎。(二)译丛一门，拟多采东西学者名人之新著，且择其有趣味者译之。(三)剧评一门，拟专择与文艺关系比较的有高尚精神者登载之，如承投稿，亦所欢迎。谨启。”(《晨报》，1919年1月31日)

2月1日 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和《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两篇文章。

刊登在《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上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指出，日本一些人所倡之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文章认为，亚洲人“应该共倡一种新亚细亚主义”，“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立，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

载于《新潮》第1卷第2号的《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主张各国特别是大国实行联邦自治制度，然后各洲形成全洲联邦，最后“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

2月7至9日 在《晨报》“自由论坛”上发表《战后之世界潮流》一文。文章认为：“这回德国的失败，不是败于外部的强敌，乃是败于内部的国民。这回民主主义的胜利，不是从前

英、美式民主主义的胜利，乃是新发生的德、俄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我们中国也许从西北的陆地，东南的海岸，望见他的颜色。”

2月16日 在《劳动教育问题》一文中强调，工人不但应该争得分配上的民主，而且还需要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文章指出：“现代的著作不许拿古典的文学专门去满足那一部分人的欲望，必须用通俗的文学，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现代的教育，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板的程序去造一班知识阶级就算了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此文载于《每周评论》第9号上。

2月15日 在《新青年》第6卷第2号上发表《战后之妇人问题》。该文认为，女权运动带有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的妇女所要求的权力与无产阶级的妇女毫不相干。被生活所迫卖淫现象的存在，并不能因为实现了资产阶级妇女的参政而得以解决，关键是由于“有一个强制妇人不得不卖淫的社会组织在那里存在”。据此，文章点明：“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

2月16日 在《每周评论》第9号上发表《祝黎明会》、《黎明日本之曙光》、《秘密外交》、《罪恶之守护者》等文。

2月20至23日 在《晨报》上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号召革命青年到农村去，向广大农民进行民主主义的教

育。文章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除去我们几个青年，举国昏昏，还有那个？”

2月23日 在《每周评论》第10号上发表《死动》、《普通选举》两文。

2月 写信给李辛白，为张岱杉索取《每周评论》。信中写道：“辛白吾兄先生：乞检出第一号至第九号的《每周评论》二份，寄赠东四四条胡同张岱杉先生，以后按期续寄，此颂，刻安。弟钊顿首”

3月2日 在《过激派的引线》一文中说：“前几天听见几个与政府有关系的人，看了几篇思想新一点、议论稀奇一点的文字，他们就动色相戒的说道：‘你们不看见过激主义已经到我们国来了吗？’实在讲起来，现在我们国内最新的议论，不晓得跟过激主义还差几千里呢。”“为开通他们这一班人起见，倒不可不译几本过激派的著作出来，给他们看。这种书果然译出，看得见的，可就不止那几位怕过激主义的人”。这篇文章发表在《每周评论》第11号上。李大钊的另一篇短文《光明与黑暗》也刊登于此号。

3月9日 在《每周评论》第12号上发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新旧思潮之激战》两篇文章。

《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介绍了唐山煤厂工人的劳动条件、工钱收入等情况，指出他们的生活十分悲惨，不如骡马。

《新旧思潮之激战》警告封建旧思想的维护者，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

3月10日 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演讲。

《新闻学研究会启事》：“本日晚七时半，本会敬请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在理科十六教室演讲，会员诸君务早到会为幸。”（《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0日）

3月14至16日 在《晨报》上发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文中提出：现代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应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

3月16日 当选为北京大学学余俱乐部庶务干事。在《每周评论》第13号发表《强国主义》、《小国主义》。

《学余俱乐部成立会纪事》：“学余俱乐部于上星期日午后，在理科第一教室，开成立大会，到者三百余人。公推吴瞿安君主席。由徐伯轩君报告部中经过之情形。”“后即宣布选举结果，蔡子民君当选为正部长，叶浩吾君当选为副部长，徐伯轩、胡适之、成宪孟、肖鸣籟四君当选为交际干事，黄季刚、沈尹默二君当选为文牍干事，胡之德君当选为会计干事，左贯文、李大钊、廖书仓三君当选为庶务干事，后即摄影而散。”（《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8日）

3月19日 致函学余俱乐部：“学余俱乐部诸先生均

(钧)鉴,鄙人事忙,不胜庶务干事之任,乞另选。此颂公安。”这封信登在当天的《北京大学日刊》上。

3月20日 与胡适等发表启事,为李辛白父丧徵集捐赠。

《李守常、胡适、程演生、高一涵、陈独秀、徐宝璜启事》：“李辛白先生现丁父丧,本校同人拟有拟赠贖仪者,望送本校会计课代收,此启。”(《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0日)

3月28日 在《晨报》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指出：“过去与将来,都是在那无始无终、永远流转的大自然在人生生命上比较出来的程序,其实中间都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生命力。一线相贯,不可分析(拆),不可断灭。我们不能划清过去与将来,截然为二。完成表现这中间不断的关系,就是我们人生的现在。我们要想完成这自然的大生命,应该先实现自己的人生。”

4月6日 在《每周评论》第16号上发表《混充牌号》一文,指出社会上若有一种东西流行,就有很多冒充者出现。“‘社会主义’流行,就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出现。”这一号上,还刊登了李大钊的另两篇短文:《统一癖》和《白人阀》。

4月8日 鲁迅寄李大钊信。”

《鲁迅日记》：“八日 县。休假。午付贫儿院年捐三元。下午寄李守常信。夜大风。”

4月9日 赠国史编纂处书两本。

《国史编纂处启事》：“又承李大钊君惠赠湘灾纪略一本、醴陵兵燹纪略一本。”(《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9日)

4月13日 在《每周评论》第17号上发表《解放后的人

人》一文。文章说：“放过足的女子，再不愿缠足了。剪过辫的男子，再不愿留辫了。享过自由幸福的人民，再不愿作专制皇帝的奴隶了。”

4月16日 鲁迅收到李大钊信。

《鲁迅日记》：“十六日 晴，大风。上午得钱玄同信，附李守常信。下午得傅孟真信，半农转。”

4月20日 在《每周评论》第18号上发表《宰猪场式的政治》、《汽车与邮片》两文。前篇短文指出，中国的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

4月27日 在《每周评论》第19号发表的《废娼问题》一文中，论述了不可不废娼的五点理由，并指出：“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

5月1日 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界写了《“五一节” May Day 杂感》一文，登在《晨报》上。文章介绍了“五一节”的来历，说明它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告成的日子，”同时，文章又指出：“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5月2日 北大日刊载李大钊曾送马寅初太夫人之赠仪现洋二元；又送李辛白父亲赠仪票洋五元。

《徐宝璜启事——》：“本校同人送马寅初先生太夫人之赠仪，截至四月月底为止，由学生储蓄银行经手，共收到现洋三十五元正，票洋一百八十陆元正。”“李大钊先生现二元。”（《北

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2日）

《徐宝璜启事二》：“本校同人送李辛白先生封翁之赠仪，截至四月月底为止，由会计课共收到现洋十三元正，票洋一百四十三元正。业由会计课送交辛白先生手收。”“李大钊先生票五元。”（《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2日）

5月初 参加五四运动游行以及救援被捕学生的请愿活动。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41页）

5月5日 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

《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今天是马克思一百零一回的诞生纪念日，兹篇系日本研究马克思的大家河上肇所著的简洁明瞭颇有价值，特译出来作研究的资料。渊泉识。”（《晨报》，1919年5月5日）

5月 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上，连续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将近三万字，包括序言在内共分十一个部分。在文章中，李大钊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介绍唯物史观的部分里，指出：“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接着，他

指出：“与他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马氏与昂格思合布‘共产者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文章在介绍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资本集中等原理后指出：“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现今各国经济的形势，大概都向这一方面走。”文章还明确指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5月10日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辞职后，北京大学教职员会议推举马序伦、李大钊等八位代表赴教育部要求挽留蔡元培。

《蔡校长辞职后所闻》：“教职员之言动：蔡校长出京消息已传遍该校，虽蔡校长留书以工科学生温宗禹暂代校务，但一时校内极为不靖。北京大学遂于前晚(九日)八时，开一教职员会议，决定推举代表八人赴教育部，请傅总长设法挽留蔡校长。昨日下午一时，所举定之代表马序伦、马寅初、李大钊、康宝忠、徐宝璜、王星拱、沈士远等齐赴教育部，谒见傅总长，请其设法挽留。傅总长当对各代表宣明自己诚恳挽留蔡校长之态度。各代表复问总统总理之意如何，傅总长默然有间，谓总统总理之意见，余未深知，故余亦无从代为宣布云。谈至此，各代表遂退出。闻北京大学各教职员之意，如不能挽回蔡校长，亦

决定总辞职云。”(《晨报》，1919年5月11日)

5月18日 在《每周评论》第22号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文章指出：“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5月23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二十三日 遣差持专函回宁。收家函即复。收李守常函。”

5月26日 所写《黑暗的东方》、《太上政府》、《第五师军人》在《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

5月29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馆主任布告》：“暑假临近，本馆例须清理，自六月一日起，凡图书报章，一律停止借出，其从前借出者，亦望从速交还，此告。”

赠北京大学图书馆《教育》一册。

《图书馆登录室第三告(部)布部(告)》：“本馆兹承本馆主任李先生惠赠教育第一期一册，特此声谢。”(《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29日)

6月1日 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强调思想、言论自由的意义，并指出：“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

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此文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4号上。

6月11日 至北京城南游艺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一九一九年六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主张推翻段祺瑞政府，并宣布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守常与陈独秀都去散发。”（《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41页）

6月22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二十二日 接李守常函，即复。昨收副官处一函。”

6月24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主任布告》：“暑假期内，本馆每日自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开馆，下午及晚间闭馆，但阅报室可延长至下午五时，此告。”

6月28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告知《每周评论》禁寄。

《白坚武日记》：“二十八日 北京派汪有龄、汪绍杰来沪，接洽和议，今日到申。收李守常一函，悉每周评论禁止邮寄。吴佩孚通电拒绝签字，并联合两方前敌将士一致主张。”

6月29日 在《每周评论》第28号上发表《牢狱的生活》、《不要再说吉祥话》、《威先生感慨何如？》、《改造》、《哭的笑的》、《新华门前的血泪》等文。后两篇短文强调在今后“应该常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的哭声”。

7月1日 少年中国学会开成立大会。李大钊等提议修改学会宗旨。

《本会通告》：“会员诸君均鉴：本会于七月一日开成立大

会。由李大钊、王光祈、曾琦、陈清、康白情、雷宝华六君提议，将规约第二条原文‘本学会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修改为‘本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词句较为简洁。诸君如有意见，请于一月以内通知敝处，以便改印规约。惟在海外者，可展期三月。即颂著祺。少年中国学会谨启。七月一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

7月6日 与胡适等发表启事，为谣传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一事辩白。

《胡适、周作人、刘复、高一涵、陈大齐、李大钊、钱玄同、唐伟启事》：“近来有人散布谣言，说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两君，被安福俱乐部收买去了。这种谣言本来不值一笑，因为安福俱乐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这两位高洁的青年。不幸国中缺乏常识的人太多了，居然有人相信这种谣言，居然有许多通信社和报馆，极力传播这种谣言，我们心里不平，不能不替他们两位辩个清白。”(《晨报》，1919年7月6日)

7月6日 在《每周评论》第29号上发表《赤色的世界》、《最危险的东西》、《光明权》、《我与世界》、《阶级竞争与互助》等文。

《阶级竞争与互助》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因此，文章提出“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的主张。

7月8日 鲁迅收到由钱玄同交来李大钊的文章一篇。

《鲁迅日记》：“八日 晴。上午往东交民巷日邮局寄二弟

信并泉四百。午后县。下午许季上来。晚钱玄同来，夜去。托其寄交罗志希信并稿一篇，又还书一本，又赠李遐卿杂志一册，交李守常文一篇，二弟译。”

7月13日 在《每周评论》第30号上发表《忠告黎明会》、《黑暗与光明》、《真正的解放》、《战栗》、《万恶之原》、《灰色的中国》、《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等文。

《真正的解放》一文指出：“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7月20日 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日本人听者》一文。

7月下旬 离京回乡，居于五峰。

李大钊《五峰游记》：“我们那晚八时顷，由京奉线出发，次日早晨曙光刚发的时候，到滦州车站。”“我们在此雇了一只小舟，顺流而南，两岸都是平原。”“到了家乡，才知道境内很不安静。正有‘绑票’的土匪，在各村骚扰。”“过了两三日，我便带了一个小孩，来到昌黎的五峰。”（《新生活》第2期，1919年8月31日）

8月初 写信给王光祈、曾琦，告知五峰的情况，说：“山中饮的是泉水，烧的是松枝，一草一木都有幽趣。兄等盍来此一游？”这封信发表在八月十五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上。

8月15日 少年中国学会公布职员选举结果，李大钊当选

为少年中国学会编译部编译员和《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纪闻》：“选举职员：本会评议部职员，系由大会选举。执行编译、两部及月刊职员，则由评议部选举。现刻选举评议员投票人数，已逾会员全数之半。选举结果，以曾琦、左学训、宗之樾、王光祈、雷宝华五君得票最多，应当选为评议员。易克疑、黄日葵两君得票次多，应当选为候补评议员。当即由曾、左、宗、王、雷五君组织评议部，选举评议主任，及执行等部职员。其结果王光祈君当选为执行部主任，王君除向大会辞去评议员改就执行部主任外，所有评议员缺额，应由候补评议员易克疑君递补。兹将本会全体职员名单，开列如下：

评议部主任曾琦，评议员左学训、宗之樾、雷宝华、易克疑（评议部系监督会务进行，选举各项职员，审查会员资格之机关）。

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副主任陈涪（执行部系办理本会对内对外一切会务之机关）。

编译部编译员李大钊、徐彦之、袁同礼、陈涪、康白情、黄日葵、孟寿椿、苏甲荣、王光祈（编译主任应由编译员互选，尚未选出）。（编译部系审查本会丛书之机关）。

月刊总经理陈涪，发行苏甲荣，书记黄日葵，会计王光祈。

月刊编辑主任李大钊，副主任康白情。

第一组月刊编辑员李大钊、康白情、徐彦之、孟寿椿、黄玄、陈涪、袁同礼、沈懋德、刘正江、雷宝华、周炳琳、王光祈（本组编辑第三期，系九月十五日发行，八月二十日以前齐稿）。

第二组月刊编辑员田汉、宗之樾、左学训、易家钺、黄忏华、黄日葵、苏甲荣、赵曾侗、彭举、李哲生、李劫人，孙少荆（本组编辑第四期，系十月十五日发行，九月二十日以前齐稿）。

第三组月刊编辑员魏嗣銮、李璜、周无、许德珩、陈宝锜、罗益增、雷国能、涂开舆、段子燮、张尚龄、陈登恪、曾琦（本组编辑第五期，系十一月十五日发行，十月二十日以前齐稿）。

（说明）一，以上分组编辑之规定，系按照各编辑员所居之地方以为分配标准。譬如第一组编辑员多居北京及其他各埠。第二组编辑员多居东京及长江流域各省。第三组编辑员多居欧美、南洋各处。纯为收集稿子便利起见也。二，各组编辑员轮流编辑，每三月轮流一次。譬如六、七、八期之月刊，则应由一、二、三各组依次分任编辑是也。”（《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

8月17日 在《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给胡适的信：《再论问题与主义》。文章论述了“主义”与“问题”的关系，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针对胡适攻击马克思主义，文章明确表示自己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并说：“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害（疑为实字之误——编者）象昭布在人类社会”。文章最后谈到对“根本解决”的认识，指出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所谓“根本解决”，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

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当然，要得到“根本解决”，必须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作指导，“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

8月30日 在《新生活》第2期发表《五峰游记》。《每周评论》被北洋军阀政府封禁。

《又有两报被封，每周评论与五七》：“北京之有周报，由每周评论始，该报由去年冬间出版，现时已出至三十六期，突于上星期六日，被警厅封禁。”（《晨报》，1919年9月3日）

8月 给郁崑写信。信中说：“入山以来，晨莫呼吸烟霞，日必攀松披榛，寻登绝巘，白云从足下飞去飞来，梨树正值果熟，一枝低压，盈千累百，所至憩息，园主辄赠十数颗，坐石啜食之。泉自高山流下，激动碎石，声响清越，举手仰吸，翛然有羽化登仙之概矣。深泉濯足，长歌采薇，回山去也。此中佳趣正多，不敢向人间泄漏，恐山灵见怪，且惧兄等羨煞也。名山攀友，不得作一时胜游，孤灯石室，颇有所忆，成长歌一首，盖怀兄及天问兄也。诗肃天问（即郭厚庵，北大图书馆职员——编者）函中，余不白。”

8月 写信给李辛白，为日本人佐原葛介订购《每周评论》。信中说：“上海有位日本人佐原葛介君，愿订‘每周评论’，自第一号起长期续订，报费若干，开单寄去，他必照数汇来。他的住址开在下面：上海虹口密勒路六号佐原葛介（殿）。”

8月 致函李辛白，信中说：“辛白先生：同文待印周报，木版尚未取来，昨日派人去取，彼未等回信。现在号房没有上

街的人，今晚又非用不可，乞我兄设法差人到晨报去取，取到即交同文。此问近安！弟钊顿首。”

8月 致函李辛白，信中写道：“辛白吾兄先生：郭楞仙寄来邮票三角奉上，乞即照寄。外有殷汝耕君住址一纸，亦望收存。由第一号起按期赠报一份，以吾社拟请殷君任驻东通信员也。此颂春禧！弟钊顿首。”

9月7日 在《新生活》第3期上发表《五峰游记（续）》。

9月11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馆主任布告》：“（一）本馆自十一日起，上午由八时至十二时，下午由一时至六时，晚间由七时至九时开馆，自二十日起出借图书，此白。

（二）新入校的学生诸君，可于开馆的时间，到本馆收发室领取阅书证，此白。”

9月15日 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上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文中说：“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

这一期《少年中国》还发表了《岭上的羊》、《山峰》、《山中落雨》三首诗。《岭上的羊》：“我在古寺门前站立，小羊的声音来自天际。看啊！岭上的羊，白的掺着黑的。一个一个的都爬上山去。羊呵！我细听你的声音里：纤弱带着仁慈，悲哀带着战栗，你不曾伤过别的东西，你不曾害过你的伴侣；天天

只傍着那山水，吃些草叶或草子；只有你怕人，没有人怕你。我不但不怕你，而且怜你；我不怕你，而且怜你，就是你的胜利！”《山峰》：“一个山峰头，长着几棵松树。片片的白云，有时把他遮住。白云飞来便去，山峰依然露出。”《山中落雨》：“忽然来了一阵烟雨，把四山团团围住，只听着树里的风声雨声，却看不清云里是山是树？水从山上往下飞流，顿成了瀑布，这时前山后山，不知有多少樵夫迷失了归路。”

9月16日 陈独秀被释出狱。李大钊写诗《欢迎独秀出狱》。此诗分三节：一，“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二，“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象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三，“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这诗在《新生活》、《新青年》上都刊登过。

9月21日 应觉悟社邀请到天津座谈、讲演。《新生活》第5期发表李大钊的《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

《三个半月的“觉悟”社》：“二十一号因为李大钊先生来天津，就由交际委员请到本社谈话。李先生对于本社出版不定期小册子的办法，同不分男女的组合，都非常赞成。并且还给

我们许多的建议。”(《觉悟》第1期,1920年1月20日)

9月25日 与蔡元培等发表启事,为朱蓬仙教授逝世请求捐赠。

《蔡元培等启事》:“本校教职员诸先生公鉴:敬启者,本校朱蓬仙教授(宗莱)因病逝世,身后肖条,同人有欲致送赙仪者,请于十月十五日以前,送交本校会计课代收,以便汇送至纫。公谊。”

李辛白、沈尹默、黄世晖、周同焯、马寅初、刘文典、沈兼士、康宝忠、蔡元培、刘复、朱希祖、郑阳和、李大钊、沈士远、马裕藻、陈大齐、马叙伦、钱玄同、段宗林、潘大道同启。”(《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9月25日)

9月28日 在《新生活》第6期发表《赤色青色》、《大笑话》、《难兄难弟》、《秘密……杀人》等文。后文提出,如果瘟疫是自然的罪恶,“何以死的大半是无产阶级和妇女?”

10月5日 在《新生活》第七期上发表《新鲜名词》、《黑暗运动》、《圣人与皇帝》等文。后一篇文章说:“我总觉得中国的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师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拚命在圣人上作工夫,我很骇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

10月6日 与马叙伦等发表启事,拟于双十节举行北京大学教职员全体公宴。

《马叙伦等启事》:“迺启者,同人拟于双十节举行本校教职员全体公宴,以申庆祝(时间、地点再行决定)。届时并有关于全体一二应商之事,欲相讨论,为荷。赞成即当筹备,否则请

于七号以前，赐函本校庶务处，同人当从多数意见以为决定。此启。

黄右昌、刘文典、周作人、许之埏、李辛白、朱希祖、沈尹默、马叙伦、刘三、黄世晖、胡春林、马寅初、马裕藻、沈士远、徐宝璜、李大钊、徐之杰、周同焯同启。”（《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6日）

10月10日 在《双十字上的新生活》一文中提出，人与人的共同生活关系应以“爱”为基础，“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文章认为：“博爱的生活，是无差别的生活，是平等的生活。在‘爱’的水平线上，人人都立于平等的地位，没有阶级悬异的关系。”要实行“爱”字，就必须有牺牲精神。“爱的方法，便是牺牲，牺牲的精神，便是爱”。文章最后希望人们：“都永远抱着《新生活》封面连环双十字上的四大精神！——博爱，自由，平等，牺牲！去不断的创造新生活！”这篇文章和他所写的《文治国庆》、《面包运动》、《武装祭孔》三篇短文，一起登在《新生活》第8期上。

10月12日 与陈独秀、蓝公武、徐宝璜等一起，到南湾子欧美同学会参加国民杂志社成立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李大钊说：“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君本此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勉旃！”（《国民》第2卷第1期，1919年11月）

10月15日 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上发表《妇女

解放与 Democracy》一文，指出：“没有妇女解放的 Democracy 断不是真正的 Democracy，我们若是要求真正的 Democracy，必须要求妇女解放”。

10月26日 在《新生活》第10期上发表《双十与五四》、《东西村落生活的异点》、《时代的落伍者》、《应考的遗传性》等文。后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有一种应考的遗传性，这就是“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

11月2日 所写《时间浪费者》、《最有力的调和者——时代》、《人与禽兽》、《参战军呢？》等文，发表在《新生活》第11期上。

11月9日 在《新生活》第12期上发表《牺牲》、《谁是“有实力”者？》、《出卖官吏——蹂躏人格》、《掠夺物品的遗迹》、《妨害治安》、《死》、《寺内死了》等文。《牺牲》一文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11月15日 为制止撕毁杂志发布布告。

《图书馆主任布告》：“近来发见数种杂志里的重要论文，被人撕去，此类事惟有请阅书报者自重。”（《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1月15日）

11月16日 在《新生活》第13期上发表《“鼓吹共产主义”》、《那里还有自由》、《圣裔的恤金》、《联人社会》等文。《那里还有自由》一文指出，约法上明明写着言论、出版、书信自由，可是实际上“记者可以随便被捕，报馆可以随便被封”，“印

刷物可以随便扣留”。

11月19日 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李超女士追悼大会。

《李超女士追悼大会启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苍梧李超女士，幼失怙恃，长受教育，深痛神州女界之沉沦，亟欲有所建树，矢志求学。不幸受家庭之虐待，横被摧残。曩修业于梧州女子师范，广州公益女子师范时，几经艰阻。旋以姊丈之援助，跋涉京华，得受国立女子高等教育。其家固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者，牵制愈力，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姊丈筹济备受责言，嫂抱不平凡以身殉。女士只身万里，忧愤莫诉，积悲成疾，遽于本年八月十六日赍志以歿，遐迩咨嗟，同深惋惜。同人等谨拟于十一月三十日（星期），在石驸马大街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会追悼，俾慰女士之灵，聊以作生者之气。伏祈各界诸君惠临为盼，如蒙赐以挽章诗文，尤所感激，请交下列三处为荷。”“发起人：周绍昌、李大钊、陈钟凡、胡适、蔡元培、毛邦伟、伍树芬女士、吴弱男女士、赵炳麟、关冕钧”（《晨报》，1919年11月19日）

11月23日 在《新生活》第14期上发表《被裁的兵士》、《归国的工人》和《一个自杀的青年》三篇短文。后一短文分析了社会上青年自杀的原因，指出：“社会制度的缺陷，不知道逼死了多少有高尚志趣的青年啊！”

11月30日 所写《“五星联珠”“文运大昌”》、《“一心一德”》、《“用民政治”》等文发表在《新生活》第15期上。

12月1日 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明道德的本质及其变动的原因，并据此得出四点结论：第一，“道德是有动物的基础

之社会的本能”。第二，“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第三，“道德既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那么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新道德的发生就是社会的本能的变化，断断不能遏抑的”。第四，“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这篇文章与他写的《青年厌世自杀问题》一起刊登在《新潮》第2卷第2号上。

12月2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主任布告》：“本校学生诸君：如有欲得京师图书馆优待券者，望来本馆收发室报名，以便汇齐函索，此告。”

12月7日 在《新生活》第16期上发表《“中日亲善”》、《“裤子”》、《主义》等文。《主义》一文说：“我们谈主义罢，王揖唐也来谈主义；我们非主义罢，阎锡山又来非主义，究竟如何是好呢？”

12月8日 写《什么是新文学》一文，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这篇文章发表在次年一月四日《星期日》周刊社会问题号上。这一天，《北京大学日刊》还公布了蔡元培委任李大钊为北京大学总务处委员的告示。

《本校布告》：“（一）本校总务处，经校长按评议会通过之试行章程，委任委员六人，并于其中指任总务长一人，如左：

总务长兼文牍、会计部主任蔡梦麟。

注册、编志、询问、介绍部主任郑寿仁。

图书部主任李大钊。

仪器部主任陈世璋。

出版部主任李辛白。

校舍、斋务、杂务、卫生部主任沈士远。”（《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8日）

12月9日 被校长指任北京大学图书委员及学生自治委员。

《本校纪事》：“各部委员及委员长之指任：照新定试行章程，应由校长于教员中指任各部委员，以设立各委员会。除组织委员早经指任，并得评议会认可外，本月九日校长提出九部委员名单于临时评议会，经到会评议员公同修正，并由校长指任委员长九人。今分别记录如左：（凡被任为委员长者，姓名下注一长字。）”（五）图书委员：顾兆熊（长）、李大钊（当然）、陈世璋、叶瀚、宋春舫、陈启修、朱希祖、孙国璋、马衡。”（九）学生自治委员：沈士远（长）、俞同奎、蒋梦麟、李大钊。（应加学生代表三人）”（《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11日）

12月12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馆主任布告》：“阅览书报诸君：幸勿在各阅览室内吸食纸烟，以防火险，并重公众卫生，此告。”

在《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上发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文中解释了新亚细亚主义的涵义，并在最后强调两点：“一，就是不要震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轻视弱小民族和那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势力。世界上的军

国主义、资本主义，都象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阔，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烜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战，信他必可摧拉。二，就是我们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从前‘以夷制夷’的覆辙。”

是日北京公立小学校以上教职员联合会，为要求清偿旧欠、改发现洋而决定从十五日起全体罢课。联合会议决组织固定办事机关，李大钊等负责新闻组工作。

《紧要新闻·教职员全体罢课问题》：“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决定本月十五日起全体停止职务一节，已见昨报。兹觅得十二日所决议之事项，原文照录于左：

(一) 对部复认为不满意，即当遵照上次议决停止职务。(二) 停止职务自本月十五日起。(三) 于停止职务期间，组织视察团，视察各校是否实行停止职务。(四) 上项议决修正为于停止职务期间，由本会推定会员若干人，调查各校情形。(五) 继续执行职务，须由本会议决一致行动。(六) 组织固定办事机关。

(一) 会址，(二) 职员：(一) 总务马叙伦、王桐龄。(二) 文牍费家禄、陈大齐、沈士远、陶履恭、吴永权。(三) 会计朱内光、沈士远。(四) 庶务关景山、张少山。(五) 新闻费家禄、陶履恭、李大钊。(六) 速记。(七) 交际。

本日出席专门中小学校各代表，除有本会他项职务外，皆作为交际代表。

闻教育当局自得此项消息后，颇形恐慌。昨日傅岳棻特

请各校长到教育部商议一切，面允发薪问题，厘定标准办法，对于小学教员全部发，中学教员搭八成，专门以上搭七成，嗣后即照此搭放，并通知财政部照发云云。

闻各校教职员以此项办法尚难满足，且每月薪水能否按期发放，及从前积欠如何清理，亦均未提及。故定今日（十四日）下午一时，仍在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开代表会议，决定最后办法。十五日全体罢课之决议能否打消，一时尚难预测云。”（《晨报》，1919年12月14日）

12月13日 《平民教育》第10号发表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两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

12月14日 在《新生活》第17期发表《什么是歪史》、《禁止说话》两篇短文，并参加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财政紧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重累。同人等因此种种理由，特组织‘工读互助团’，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倘然试办有效，可以推行全国，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照眼前试办的预算需费不过千元，凡赞成此举者，请量力捐助，为荷。

发起人：顾兆熊、陶履恭、李大钊、程演生、蔡元培、王星拱、陈独秀、高一涵、胡适、张松年、周作人、李辛白、孟寿春、徐彦之、陈溥贤、罗家伦、王光祈。”（《晨报》，1919年12月14日）

12月21日 在《新生活》第18期上发表《互助》、《工读（一）》、《工读（二）》等文。后一篇短文认为：“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

12月28日 在《大联合》一文中提出：“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这篇文章与他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神圣》两文发表在《新生活》第19期。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〇年(中华民国九年) 三十一岁

1月1日 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文章以“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为依据，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变迁，指出孔子的学说之所以发生动摇，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有了变化。“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文章警告企图“钳制新思想的人”，如果没有力量阻止经济的变动，只有老老实实“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

1月3、4日 在《星期评论》第31号、《新生活》第20号上，分别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和《哭冯国璋》、《忏悔的人》、《又是一年》等文。《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是一篇将近万言的长文，介绍了宗教新村试验的内容，未加评论；但文章开头曾简单说明社会主义学说是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而产生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简单一句话说出他的普通概念来，就是反对现在经济组织的精神和运动，各家的学说遂有

殊异，而于此点，却大抵相同”。

1月15日 在《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中提出要打破以力为基础的分上下阶级的纵的组织，建立以爱为基础的平等的横的组织。如“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这篇文章发表在《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2号上。

1月17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主任告白》：“本馆借书规程，凡非有复本之书籍，概不出借。嗣因学生诸君，偶有以特别理由要求通融者，不得不稍为变通。近查此类通融借出者，亦多不能如期交还，公家殊感不便。自本日起，凡不出借之书籍，概不通融出借，其已经通融借出及当然借出之书籍，亦望如期交还，以重书籍流通之用。本馆设有五阅览室，颇足供用。开馆时间又长，阅者诸君幸常来馆阅览，当无不便之处，且可藉此以养成利用图书馆之习惯。此告。”

1月18日 在《新生活》第22期上发表《低级劳动者》、《整顿学风》两文。《低级劳动者》指出：“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都比你们这些吃人血不作人事的绅士、贤人、政客们强得多。”

1月20日 与马叙伦等五十五人发起组织“北京大学教职员会”。

《马叙伦等启事》：“我们大家在一个学校里作事，很应该有一个联络情谊的组织，依互助的精神，筹谋本校全体的发展，增益团体生活的趣味。我们曾把这个意思和许多同人谈过，都认为有组织一个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的必要。现在定于本星期三（即二十一日）晚七时，在第二院（理科）大礼堂，开一

教职员全体会，商量商量。请诸位先生预先把组织的大纲想一想；到了那时，务必到会，是我们狠〔很〕盼望的。

俞星枢、周象贤、林损、钱玄同、孙瑞林、张崧年、钱振椿、陈大齐、马裕藻、李大钊、刘三、徐宾〔宝〕璜、朱希祖、丁绪贤、何炳松、郑寿仁、孟寿椿、陈启修、黄右昌、张大椿、陈世璋、王星拱、程演生、孙澍、李辛白、唐伟、沈士远、蒋梦麟、马叙伦、陶履恭、胡适、姚憾、彭一湖、周作人、刘文典、马寅初、左德敏、龚湘、周泽春、沈尹默、郑阳和、李大定、谭澄、许文增、李振彝、段宗林、胡春林、吴继哲、刘钜锷、张承隆、周同焯、郭须静、汪敬熙、戴岳、沈兼士等公启。”（《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20日）

1月25日 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一文中指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此文与《真是梦话》、《“特别体恤”》一起发表在《新生活》第23期上。

同日 李大钊致函白坚武，请其设法解决天津工科大学被关闭的问题。

《白坚武日记》：“二十五日 接宁寓转来李守常、温佩珊函二件。李为津工科大学关闭事，托设法维持。温则新口开港事，莫名其妙而已。”

1月 护送陈独秀到天津，并与俄人会谈。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和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象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

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后来每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64—65页）

章志《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我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开始担任北京《晨报》及上海《时事新报》驻津特派员职务，采访新闻寄到该两报发表，借此机会宣传天津新文化运动情况。因为执笔不慎，得罪了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及南开同学，于一九二〇年一月间被迫离校，搬到姜先生家中暂住。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同志，还有一位无政府主义同志（山西人，姓名已忘）正当那时由京来津。这位山西同志也借住姜先生家中，陈独秀先生在租界客栈里，李大钊同志住河北大马路日纬路附近友人家中。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会商谈天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车回京，我与姜先生及山西同志搭津浦车去上海转福建漳州从事新文化工作。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

2月2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三次总务会议。

《总务会议纪事》(一续)：“二月二日午后四时第三次总务会议。

到会委员：蒋梦麟、李辛白、李大钊。

蒋梦麟君主席。

一、李辛白君报告与商务印书馆订购印刷机合同。

二、先着手改组日刊。

(一)只登本校公布。(二)第一版与第四版登广告。(三)通常四号字，但因特别情形得酌量改用他号字。

三、订定各部职权界限。

四、文牍事由，每日由总务长择要宣布。

六时散会。”(《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26日)

2月8日 在《新生活》第25期上发表《精神解放》、《山穷水尽的青年》、《好一对兄弟国家》等文。《精神解放》一文认为，精神解放是一切解放的基础，“所以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

2月10日 北大日刊载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教 职员 临时委员会交际。与朱锡麟等发表启事。

《本校教职员会起草委员会启事》：“(一)启者，前月三十一日经本校教职员大会议决，暂由前次大会所举出之本校教职员会，组织大纲起草员十一人，组织临时委员会。同人等即于二月七日开会，举定胡适君担任主席，沈士远、胡春林、李大钊三君担任交际。其余诸君，每日由上午八时起至晚十时，轮流值班。并于每日下午六时至七时，开全体委员会。即于八日起按时在总务处行使职务，至正式会成立为止。惟以同人

等能力棉(绵)薄,时机又极紧迫,本校同人有意愿来此协助者,无任欢迎,专此敬颂时祺。

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会临时委员:朱锡麟、陈启修、李辛白、俞同奎、蒋梦麟、李大钊、陈大齐、胡适、胡春林、沈士远、徐宝璜同启。”(《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2月10日)

2月 同毛泽东商议组织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

《毛泽东给陶毅》:“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新民学会通信集》第1集)

2月 任《少年中国》编辑部编辑。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记闻》:“组织少年中国编辑部:本会于去年七月创刊‘少年中国’时,即已组织编辑部,惟当时推定编辑主任李大钊、康白情两君,均因事忙未能执行职务,所有编辑事宜,暂由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君代理。现在王光祈君将赴美留学,特于出京之前,开会讨论编辑事宜。议决组织编辑部,由李大钊、康白情、张崧年、孟寿椿、黄日葵五君担任编辑事宜。”(《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1920年2月)

3月12日 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筹备选举委员事,与陈大齐等致函周俊甫诸人。

《本校教职员会筹备选举委员致黄黼馨等君函》:“敬启

者。本月七日，本校开教职员会成立会，公决‘仍推前起草各委员为筹备选举委员。并公决由各委员公请其他教职员会同办理选举事务’等因。查此项事务，极为繁重，同人等能力棉（绵）薄，深恐或有疏误之处。夙仰先生热心公益，肆应才长，兹特依据前议，恭请先生为筹备选举委员，以资广益，千祈勿却为荷。此致

周俊甫、丁庶为、吴善之、柴东生、黄黼馨、杨栋林、许葆初、段子均、马幼渔、杜国庠、刘仲谟、黄幼轩、马夷初、胡壮猷、李伟民、孟寿椿先生大鉴

教职员会筹备选举委员陈大齐、李辛白、李大钊、胡适、蒋梦麟、胡春林、俞同奎、朱锡麟、徐宝璜、陈启修、沈士远谨启”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2日）

3月13日 少年中国学会开常会。公推李大钊负《少年中国》月刊发稿的责任。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纪闻》：“常会纪事：三月十三日午后四钟，北京学会同人假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常会，提议的事件如下：（一）组织丛书编译部。”“（二）整顿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议决少年中国月刊的编辑，由北京编辑部负完全责任。以后各处所有本月刊的稿件，务须寄交北京编辑部编辑发送。当公推李守常君负发稿的责任，黄一葵君负催稿收稿的责任，陈愚生君负编会务报告的责任。”（《少年中国》第1卷第10期）

3月14日 出席燕京大学教授 Porter 等及清华学校教员举行的宴会。

《中外教育家近事》：“十四日，燕京大学教授 Porter 等，及清华学校各教员，公宴本校校长及胡适之、蒋梦麟、李守常诸

先生。座中谈及文化运动与基督教双方之意见，蔡、胡、蒋诸先生对于宗教哲学颇多深沉之发挥，而协和大学教员 Zuger 先生尤能揭破一切宗教内幕云。”（《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7日）

3月15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六次总务会议。

《总务会议纪事》（二续）：“三月十五日午后四时第六次总务会议。

到会委员：蒋梦麟、沈士远、李辛白、郑寿仁、陈世璋、李大钊。

蒋梦麟君主席。

与组织委员会联席会议。

一、李辛白君提议：请出版事务员李振彝君担任讲义课职务，章洪钟君担任售书课职务。

通过。

二、李辛白君提议：请杂务课书记田誉君与出版部聂康培君对调。

通过。

五时半散会。”（《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27日）

3月17日 被通知参加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会议。

《图书委员会启事》：“本委员会定于本日星期五午后四时，在行政各委员会会议室（即总务处）开会，请各委员到会。

委员名单：顾兆熊、陈启修、李大钊、马衡、陈世璋、叶澹（瀚）、朱希祖、宋春觞、孙国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7日）

3月22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七次总务会议，提议补刻刘

申叔先生遗著四种。

《总务会议纪事》(二续):“三月二十二日午后四时第七次总务会议。

到会委员:沈士远、郑寿仁、李大钊、蒋梦麟。

蒋梦麟君主席。

一、李大钊君提议:补刻刘申叔先生遗著四种。所有应补刻价两项:(一)二十八元三毛五分二厘。(二)十九元一毛八分,可否由本校支付,将来即由本校出版部印刷发行?

通过:交由图书部办理。”(《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27日)

3月21日 当选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委员。

《本校教职员会委员选举结果》:“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会成立后,于上周举行委员选举。投票于上星期六下午截止,于上星期日上午在第三院大礼堂开票。计共收到选举票二百八十四张。内有三张因无记名作废。余二百八十一票,由筹备选举委员会与到场襄助诸教职员共同检点计算。”“职员当选为委员者十五人:蔡元培二四六票,李大钊二四〇票,李辛白二三七票,胡春林二一一票,周同焯二〇四票,黄世暉一九六票,郑阳和一八九票,许文培一六四票,吴继哲一三八票,刘钜鍤一二八票,段宗林一二七票,李振彝一〇一票,陈翊忠八六票,岳绍武八三票,徐之杰七七票。”(《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23日)

春 接待共产国际远东局长威金斯基,并介绍其去上海见陈独秀。

张国焘《我的回忆》:“一九二〇年,约在五月间,共产国

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份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来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

3月 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于一九二〇年三月。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启事。声明：‘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李大钊先生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领导人，他常在‘康慕尼斋’办公。”

4月1日 在《新青年》第7卷第5号上发表《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一文。此文是李大钊在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于三月份宣告解散后给陈独秀的信。文中说：“我以为在都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是我们根本的错误。”“工读团要想维持，还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才是。其有一部分欲实行一种新生活的人，可以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

4月9日 与胡适等发表启事，为学生介绍工作。

《介绍学生工作》：“现在有一些学生想实行半工半读的主义，用他们的劳力来帮助他们求学的费用。各机关的各位先生，若有学生能做的事，无论短工长工，都请通知下面签名的三个人，并请说明工作的种类和工钱的数目，我们可以介绍相当的人来接洽。

胡适、李大钊、徐彦之同启”（《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9日）

4月16日 被通知参加于二十日召开的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会议。

《图书委员会启事》：“本委员会定于本星期二（四月二十日）下午四时，在行政各委员会会议室（即总务处）开会，请各委员到会。

委员名单：顾兆熊、陈启修、李大钊、马衡、陈世璋、叶澣（瀚）、朱希祖、宋春舫、孙国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6日）

4月21日 主持少年中国学会的讲演大会。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报告》：“讲演会纪事：四月二十一日，本会延请李石曾先生在北京大学法科大讲堂开讲演大会。到会者约六七百人。午后三点开会，由李守常君报告，旋即请李先生讲演，其题目为‘中国少年与社会之新潮流’。”“讲演毕，复由李守常君宣告散会。时已将五钟矣。”（《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

4月28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九次总务会议。

《总务会议纪事》：“四月二十八日午后四时第九次总务会议。到会委员：陈世璋、李大钊、李辛白、沈士远、蒋梦麟、

郑寿仁。蒋梦麟君主席。

议案：（一）主席报告：平民教育讲演团请本校津贴本年第三学期讲演录印刷费现洋七十八元，允否？祈公决。

议决：平民教育事业，同人极表赞同。惟学校经费异常支绌，补助綦难；应请该团团员另行设法捐募为便。”（《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9日）

5月1日 在北京大学校工和学生召开的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上讲了话，并在《新青年》第7卷第6号上发表《“五一”May Day运动史》。文章指出，在中国，对这个节日的纪念虽逐年进步，但至今仍“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我们在今年的‘五一’纪念日，对于中国的劳工同胞，并不敢存若何的奢望，只要他们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

5月5日 被通知参加于七日召开的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会议。

《图书委员会启事》：“本委员会定于本星期五（五月七日）下午四时在行政各委员会会议室（即总务处）开会，请各委员到会为盼。

委员名单：顾兆熊、陈启修、朱希祖、陈世璋、叶瀚（瀚）、马衡、孙国璋、宋春舫、李大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5日）

5月7日 与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各委员致蔡元培校长报告书。

《图书委员会致校长之报告书》：“今将图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七项，报告如左：

（一）预算案内之添购图书费，应定为每年六万元。

- (二) 图书部应设购书课。
- (三) 整理日报目录,并添购南方各报。
- (四) 建议总务处组织消防队以防火险,并从速建筑图书馆。
- (五) 纸片目录,每类应编总号数。
- (六) 各研究所阅览室书籍,均归图书部登录编目。
- (七) 订购书籍之函件,应编号存底。

校长钧鉴

图书委员会九年五月七日

图书委员长: 顾孟余

图书委员: 李大钊、马 衡、
孙国璋、陈世璋、
陈启修、朱希祖。

今将图书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决之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十三条,报告如左:”(《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10日)

5月13日 所写《红萝卜党》、《乱七八糟》两文在《新生活》第37期上发表。《红萝卜党》指出,有些看来虽是新生的进步的东西,其实不过“外面挂上一层红皮,里面却全是白的。”

5月22日 少年中国学会召开常会,讨论实行学术谈话会办法。李大钊认定研究之书籍为《政治与群众道德》。是日,为黄耀华逝世捐现洋一元。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报告》:“五月二十二日常会纪事:本会常会,向为每月开会一回。自上次常会,执行部提议,遂自本次起,增加为每周一星期开会一回。兹将本次开会所

提议事件分别纪之如左：一、筹备少年中国月刊周年纪念号”，“二、苏君演存提议辞交换杂志任务”，“三、实行学术谈话会办法。学术谈话会为本会重要会务之一，前经议决举行。惟因北京会员类皆异常忙冗，久未举行。本日由会员提议：自下次开会始，实行学术谈话。兹将各会员已认定研究书籍开列如下：

1. 李君守常认定研究古里大森著《政治与群众道德》。”（《少年中国》第1卷第12期）

《黄耀华追悼会出入用数清单》（一续）：“蒋梦麟君捐现洋二元。沈士远君捐现洋一元。李大钊君捐现洋一元。郑寿仁君捐现洋一元。李辛白君捐现洋一元。陈世璋君捐现洋一元。孟寿椿君捐现洋一元。以上共捐到现洋八元。系孟寿椿先生经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22日）

5月28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部主任通告》。“本馆书籍，经过一次改编目类，换贴号签，又经过一次迁徙，理应彻底清查整齐一下。兼想乘此机会，造出一份确实的统计表。自六月一号起，所有图书，一概停止借出，并望把借去的书，一概交还。特此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29日）

5月31日 白坚武收到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三十一日 午十二点快车回宁。收阅李守常、韩一山、傅子余来函。访温佩珊，代托同益煤矿公司借款事。”

5月 陪同山西大学图书馆长参观北京大学图书馆。

《山西大学公函》：“逕启者，本校成立十有余载，虽附有图书馆，而设备诸形缺略。素仰贵校规模宏大，组织完善。特

派本校图书馆长张君藩臣前往参观，俾资借镜。至时务请惠予接洽指导一切，实纫公谊。此致

北京大学

山西大学校启 五、五。

按右函系张君带来，张君米时，已由本校图书主任李守常先生导引参观，并招待一切。”（《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29日）

6月18日 捐赠北京大学图书馆大批杂志。

《捐赠杂志》：“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以大批旧杂志捐助本校图书馆，日本文者有太阳、支那、外交、雄辩、生活、向上、正论、新日本、洋及洲、东大陆、外交时报、经济论丛、六合杂志、东京评论、东方时论、中央公论、哲学杂志、日本浪人、东亚之光、国民评论、隔周杂志、洪水以后、第三帝国、日本评论、日本及日本人、世界之日本、伦理讲演集、国民经济杂志、国家学会、国家及国家学、社会及国家，和黎明会讲演等二百六十七册。中文者如雅言、楚宝、寸心等三十册。又小册十七册。刻已登录完竣，分存各阅览室云。”（《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18日）

6月20日 在《新生活》第38期上发表《自然与人生》，并定将于二十七日在学术讲演会讲《群众心理与群众道德》。

《学术讲演会启事》：“本会定于六月廿七日（星期日），在西城前京畿道美术学校讲演。兹将题目及时间列左：

讲演题目：群众心理与群众道德。

讲演者：李大钊。

时间：早午九时至十一时。

讲演次数：第一次。”（《晨报》，1920年6月20日）

6月22日 北京大学评议会常会讨论李大钊等提议修正教员待遇章程的议案，并委派李大钊等参加修改职员待遇章程委员会。

《六月二十二日常会》：“到者：蒋、陈、贺、何吟、陶、朱、朱、俞、马夷、马幼、胡、沈_{马幼渔代}。教务长顾梦渔先生，法律学系主任黄右昌先生出席。”“(4) 修正教员待遇章程委员会报告。”“又蒋梦麟、郑寿仁、李辛白等二十五人提议议案：评议会长钧鉴：顷闻评议会将修正教员待遇规程之举，梦麟等以为凡属校中职员宜受同等待遇，此种规定似宜斟酌周备，俾全校职员均得适用。兹依本年四月一日通过之评议会规则修正案第六条，建议如右，请予提出，不胜盼祷。

蒋梦麟、刘钜焜、章洪钟、许文培、李振彝、郑寿仁、谭澄、张承隆、马家驥、周同焯、李辛白、左贯文、汪敬熙、郑阳和、李大定、沈士远、胡祖植、齐昌豫、胡春林、肖清海、李大钊、盛铎、徐之杰、杨真江、段宗林。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议决：扩张原有之修正职员待遇章程委员会，加入：蒋梦麟、郑寿仁、李辛白、李大钊、沈士远五位。”“通过。”（《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

《修改本校教职员待遇章程之经过》：“六月二十二日，评议会派蒋梦麟、郑寿仁、李辛白、李大钊、沈士远诸先生加入委员会。并将六月二十一日职员之提议，并案移交该委员会通盘筹算，另议详细章程。教职员统称曰职员，定名曰职员待遇章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7日）

6月23日 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讲习会讲习员。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讲习会简章》：“第一条，本会

以利用假期，讲习图书馆学，谋图书馆事业之发展为宗旨。”

“第四条，本会讲习员姓名列左：但临时得加请中外名人讲演。

沈祖荣、戴超、李大钊、李贻燕、程时燧。”（《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23日）

6月24日 北大日刊公布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职员会文书组委员。

《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各组委员姓名表》：“文书组委员：主席马叙伦、朱希祖、李大钊、林损、周同焯、岳绍武、胡春林、陈翊忠、黄右昌。”（《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24日）

6月30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馆主任布告》：“现在天气炎热，自七月一日起，本馆每日开馆时间，改为由上午七时至上午十时，余时及星期日，一概闭馆。”

是日，《晨报》刊登广告，谓李大钊将于七月四日为学术讲演会作第二次讲演。

《学术讲演会启事》：“本会定于七月四日（星期日），在西城前京畿道美术学校讲演，兹将题目及时间列左：

讲演题目：群众心理与群众道德。

讲演者：李大钊。

时间：早九时至十一时。

讲演次数：第二次。”（《晨报》，1920年6月30日）

7月1日 出席北京会员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一）北京方面的报告：七月一日大会。七月一日，为本会成立第一周年纪念日，照章应开会员大会。北京同人，特于是日午后一时，假座岳云别墅开会。到

会者，为袁君守和、黄君日葵、康君白情、孟君寿椿、雷君孝实、李君守常、周君枚孙、邓君仲澥、张君申府、陈君愚生。首由陈君愚生报告开会宗旨”。（《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

7月7日 被通知参加北京大学“修改职员待遇章程委员会”会议。

《“修改职员待遇章程委员会”启事》：“兹定星期五（七月九日）晨九时，在第一院接待室开会。务请委员诸君按时到会为禱。委员名单：陶孟和（主席）、朱锡龄、陈大齐、俞同奎、胡适、马寅初、贺培之、蒋梦麟、郑寿仁、李辛白、李大钊、沈士远。共十二人，现马寅初、陈大齐二先生已出京，共计委员十人。”（《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7日）

7月8日 北京大学评议会议决将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

《北京大学评议会七月八日特别会》：“到会者：校长蒋代、蒋、朱希、朱继、贺、黄、张贺代、何朱继代、陶、胡、沈、马夷、马幼夷代。”“（4）图书馆用助教事。议决：（马寅初先生修正案）图书馆添用助教，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全体通过。”（《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第2册）

7月 被聘担任讲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社会学”和“女权运动史”两门课程。

程俊英、罗静轩《五四运动的回忆点滴》：“七月七日，教育部正式免方还职，委毛邦伟先生担任我校校长。他还未到校就职，我们就到他家提出下学年希望聘请的教师，主要是李大钊老师和陈中凡老师。”“李大钊老师担任‘社会学’和‘女权运动史’两门课程，这使我们初步接触到马列主义的理论”。（《五

四运动回忆录》第 277 页)

7月21日 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常会,当选为评议员。是日,北大日刊宣布,李大钊任北大妇孺救济会调查部主干。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一)北京方面的报告：七月二十一日常会。是日北京本会同人，于午后一钟，假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常会。到会者有张君申府、邓君仲澥、周君枚孙、李君守常、苏君演存、徐君子骏、黄君日葵、陈君愚生。会议事件如下：

一、发表评议员选举结果。评议员选举，本应于开大会时发表结果，惟因当时国外会员所投之票，多未寄到，因决于下次开常会时再为发表。兹各处所投之票，业已收齐，遂于本日常会发表，其结果如次：

左君舜生四十五票、李君大钊二十九票、恽君代英二十三票、杨君贤江二十二票、余君家菊十九票、孟君寿椿十六票、黄君玄十五票。以上七君，所得票数最多，均当选为本届评议员。又宗君之魁十三票、黄君日葵十二票、陈君洧十二票。以上三君，所得票数均满投票人数五分之一以上，照章均作为候补评议员。”

“舜生、守常、子毅、英父、家菊、寿椿、仲苏诸兄公鉴：本届评议员选举结果诸兄得票最多，当选为评议员。除选举票数另行宣布外，特此通知，即希查照。执行部谨启。”（《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

《北京大学妇孺救济会通告》：“北京大学妇孺救济会干事名单：总干事：蔡元培。副总干事：沈士远。（一）调查部主干：李

辛白、李大钊、徐宝璜、许文瑛。干事：徐之杰、胡春林、卢勃华、苏昭桂、周同焯、黄世晖。”（《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21日）

7月23日 受聘任北京大学教授。

《文牍课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收发文件事由单》：收文，无。发出文件共十三件。“一，请王烈先生为本校教授聘书。一，请李大钊先生为本校教授聘书。一，请谭熙鸿先生为本校教授聘书。一，请齐昌豫先生为本校助教聘书。一，请吴康先生为本校助教聘书。一，请陈达材先生为本校助教聘书。一，请王峻先生为本校助教聘书。一，请顾颉刚先生为本校助教聘书。”（《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30日）

8月1日 与胡适、蒋梦麟、陶履恭、王征、张祖训、高一涵一起在《晨报》上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认为“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而要达此目的，则先要“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据此，宣言提出有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等方面自由的九点要求。

8月3日 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讲习会讲“图书馆教育”。是日，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

《北高图书馆讲习会志盛》：“到会听讲者不下百余人，内有女子十余人，多系各省或各校选派来京或有志研究此项教育者。每日开讲座为之满，洵吾国图书馆教育发展之一新纪元也。”“八月三日，八至九时，‘图书馆教育’，李大钊。八月四日，九至十时，‘图书馆教育’，李大钊。”（《晨报》，1920年8月8日）

《白坚武日记》：“三日 温佩珊、徐襄平约余共请谢晋卿，令余厨备办。晚收守常来函一件。”

8月4日 《北京大学日刊》披露，李大钊将于五日参加北京大学行政会议。

《行政会议开会通告》：“兹因校中要事，定星期四（八月五日）晨八时，在第一院总务处开会，务祈各委员准时到会，并请李守常、陈聘丞两先生出席，特此通告。九·八·三。委员名单：蔡校长、陶孟和、黄振声、俞同奎、王兼善、顾孟余、马叙伦、胡适、蒋梦麟、沈士远、李大钊、陈世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8月4日）

8月13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十三日 早，沪联合会代表周剑秋来访，告以大局内情。李守常来函一件，即复一函，促则民照预约进行。”

8月14日 接待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讲习会来北大图书馆的参观者。

《本校新闻》：“十四日上午八时许，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讲习会来本校图书馆参观。先后到者约七、八十人，由询问处招待，导往参观毕，复由本校图书部主任将图书馆之沿革及组织为简单之说明。至十一时而去。”（《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8月21日）

8月15日 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文，提倡人道主义、世界主义。文章中说：“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本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切。”

8月16日 出席天津觉悟社、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少年中国学会五团体，在北京陶然亭召开的茶话会。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二)友会的联络：十六日午前九钟，天津觉悟社在京社员，函邀北京宗旨相同各团体，在南下窪子陶然亭开茶话会。是日到会者除觉悟社社员十一人外，团体凡四：为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及本会。人数约二十余人。首由刘君清扬报告开会宗旨，继由朱〔原文如此。应为邓。——编者〕君文淑报告该社组织及经过，继为周君恩来演说，各团体代表，相继各有所述。本会由李君守常代表答谢，张君申甫亦有意见发表。继由李君提议各团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间，此后似应有进一步的联络。当经决定，由各团体各推代表三人，于十八日午后一时，假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开筹备会，筹商办法。聚谈至十二时始摄影散会。本会所推代表为李守常、张申甫、陈愚生三君。”（《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

8月17日 在《晨报》上发表《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指出：“时至今日，一切历史上传留下来的势力，都一天一天的粉碎了。什么宗教咧，皇统咧，军阀咧，政阀咧，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礎。”

8月18日 觉悟社等五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各团联络筹备会。李大钊为少年中国学会代表。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三)各团联络筹备会：十八日午后一时，觉悟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人道社及本会五团体代表，假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开各团联络筹备会。当经议决名称，定名为改造联合，并议决事业数条及组织大纲。公推本会会员张君申甫创拟草案，拟妥开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再行分

交各团体通过。”(《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

8月19日 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茶话会。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四)八月十九日茶话会：北京本会同入于是日仍假座来今雨轩开茶话会，由陈君愚生报告昨日开会经过情形，并征询本会同入对于此次联络有无别项意见。众无异议。继李君守常提议，略谓：本会之创立，原系研究学问团体，思想须极自由，主义自不一致；惟两年以来，世界思潮既有显然之倾向，而国内应时发生之无数小团体，亦莫不各有鲜明之旗帜；本会同入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云云。当经议决，即请李君以个人名义提出意见，征求全体讨论公决。”(《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

8月21日 与王文彬等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启事，要求召集临时国民大会，并拟定解散非法国会、肃清祸国党孽、裁减军队、禁止侵犯民权、实行地方自治、公布国家会计、取消卖国密约等七项提案。

8月 介绍两名觉悟社社员参加“华俄通信社”工作。

湛小岑《我所知道的觉悟社》：“《改造联合宣言》经各团体代表会议通过后，觉悟社留京的几个社员即在李大钊先生领导下从事劳工、妇女和青年学生运动。有两个社员经李大钊先生介绍参加了苏联的国际通信机构‘华俄通信社’工作。”(《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160页)

8月下旬 回河北乐亭家乡接家眷。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五)会员消息。李君守常回籍接

家眷，准下月初回京。”（《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

9月初 回北京。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员消息，“北京会员李君守常，于前月回籍接取家眷，已于月初回京，寓西城石驸马大街后宅三十五号。”（《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1920年10月）

9月16日 与蔡元培等组织赈灾会，为北方灾民发起募捐。

《北京大学赈灾会启事》：“今年北方早灾，异常重大。灾区有五、六省之广，灾民有数千万之众。无衣无食，道殍相望。瞬届寒冬，苦痛尤甚。窃思此等难民同属国民份子，坐视不救，夫岂人情。同人等念责任之所在，用特组织斯会，仰祈本校全体赞助，慷慨认捐，以尽互助之谊，无任禱荷。此启。九、九、一六。”

认捐办法：假定教职员学生每人认捐以一元为单位（多多益善）。教职员认捐者交由会计课代收，学生认捐者交由斋务课代收。俟集有成数，届时如何赈放，再行公决。

发起人：李守常、沈士远、蒋梦麟、蔡元培、顾孟余、李辛白、马叙伦、胡祖植、郑寿仁、陈世璋、俞同奎、马裕藻、朱希祖、黄右昌、罗文干。”（《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23日）

9月17日 担任现代政治的讲座。

《开学演说录·陈启修先生演说词》：“第二，添设了一个现代政治的讲座。因为现代的政治问题日趋复杂，如劳农政府、巴黎和会、国际联盟等等，亟待研究的很多。加以现在的社会，无论如何，总还脱离不开政治，所以实在不能不研究。这

个讲座已定由陶孟和先生、李守常先生、张慰慈先生及兄弟四人担任，打算帮助大家一同研究。”（《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7日）

9月18日 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常会。辞《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编辑。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报告》：“九月十八日常会：是日午后四钟，北京本会同人假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常会，到会者为李君守常、易君君左、邓君仲澥、孟君寿椿、苏君演存、张君申甫、陈君愚生。是日提议事件如下：

一、改组月刊编辑部 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原为五人，主任李君守常，编辑孟君寿椿，张君申甫，黄君一葵，康君白情。现李君守常、孟君寿椿，均因事忙不能兼顾；康君白情已赴美，张君申甫亦将出国，同时辞职。当经改推苏君演存为主任，黄君一葵为副主任，担负编辑全责。”（《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1920年10月）

9月19日 陪同白坚武等游北京城南公园。出席张适吾的晚宴。

《白坚武日记》：“十九日 早刻，锦波叔来访。收到崔丽叔宁寓函，并转来泊寓函各一件。故乡际此寸粟不收之候，前途实为可忧。偕李守常、锦波叔、刘际青游城南公园，步行一周，苍松荫天，故殿相望，气象有足称者。张适吾请晚饭，北洋法政同学到者有：王辅唐、李采言、李凝修、李则民、李守常、何麟阁、赵苻脚、康凤来、刘际青诸人，尽欢而归。”

9月24日 陪同白坚武出席孙汉忱的晚宴。

《白坚武日记》：“二十四日 孙汉忱到京，余畅叙吴子玉

处近日内情。晚宴之于瑞记饭庄，约李守常、王励斋作陪，王未到。”

8月25日 应约参加孙汉忱的午宴。

《白坚武日记》：“二十五日 孙汉忱约余及葛耀廷、李守常在京汉车站饭店午叙。饭后偕孙汉忱到中央公园游谈。”

9月26日 陪同白坚武等游万寿山。

《白坚武日记》：“二十六日 中秋。早偕孙汉忱、李守常、刘际青至万寿山，包汽车一辆，自西直门出发，历排云殿、龙王庙等迹。时间尚早，复以余力游万生园。终日奔驰，不以为苦，所谓游山宜在少年时信然。晚应葛耀廷约，在新明大戏院看梅兰芳演嫦娥奔月一剧，化妆、表情、腰肢、身段，俱臻妙境。”

9月 与邓仲澥等介绍陈政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新加入会员 陈君政系浙江绍兴人，现住北京大学哲学系第二年级。昨经邓君康、孟君寿椿、李君大钊、苏君甲荣、刘君仁静介绍加入本会文科。”（《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1920年10月）

9月 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年评议部部员。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评议部记事》：“本会第二年评议部部员李守常、恽子毅、余景陶、孟寿椿、杨英甫、黄日葵、左舜生七君当选。最近关于会务，有种种讨论，兹分别详纪如下：”
“（三）少年世界出完第一卷，暂时停刊。此条子毅、守常、日葵均赞成停刊。南京方面会员，亦致函评议部，云该方面多数会员，预备努力于丛书事业，无暇顾及杂志，故本会第二种月刊少年世界，出至第一卷第十二期止，暂时停刊。”“梦九提议：为介绍会员，力求审慎，同志对于某人认为符合本会条件，宜请

求评议部同意，得同意后，再介绍于多数同志，待经过较久时间，再请其入会。此条家菊、守常、代英、寿椿、舜生均主张与受介绍人同地之介绍人以两个为限，(一)可免徇情之弊。(二)可使受介绍人多识外处会员，而真收入会的实益。以后同人介绍会员，从此条公布日起，请先介绍与各处会员通讯，与被介绍者同地的，只能限两人，否则评议部不能通过。”(《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1920年10月)

10月1日 应邀出席韩国代表的宴会。

《白坚武日记》：“一日 京报纪广州魏邦平独立，莫荣新有逃走之势。韩国代表濮姓及军人金某，宴余及高彦如、姜寿祺、王励斋、李守常于十刹海会贤堂。”

10月 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唯物史观研究课。

《注册部通告》：“李大钊先生担任史学系唯物史观研究，自米周始授课。此布。”(《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日)

10月 政治教授会议决，李大钊讲授《现代普选运动》。

《政治教授会启事》：“兹将本月一日政治教授会议决事项列左，请政治系教员及学生诸君公鉴：”“现代政治之讲题及担任教员，已定者如下，其他俟随时决定后，另行通知。

(一) 劳农政府：陶履恭，二次讲完。

(二) 中国劳工现况与现代各国劳工组织之比较观：陈启修，二次讲完。

(三) 现代普选运动：李大钊，次数未定。

(四) 平和会议与平和会条约：张祖训，次数未定。

(五) 现代各国之社会党：陈启修，次数未定。”(《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7日)

10月6日 出席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会议。

《民国九年十月六日开第五次会议》：“到会者：朱希祖、陈启修、顾孟余、孙国璋、马衡、李大钊、陶孟和。

一、议决：在第一院设教员阅览室。

二、议决：所有书籍概不借出馆外，以前借出之书籍限期收回。”

10月9日 同白坚武游中央公园夜景。

《白坚武日记》：“九日 寄泊寓一函。沐浴。访何重勇，偕李守常游中央公园夜景。”

10月14日 当选为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

《蔡元培启事》：“本届评议会选举，共收到选举票四十三张，内废票两张（因所举超过法定人数）。兹将各教授所得票数，开列如下：

陶履恭三十一票。顾孟余、蒋梦麟、俞同奎各三十票。胡适二十九票。朱希祖二十六票。王星拱二十四票。陈启修二十三票。李大钊、马叙伦各二十票。何育杰十九票。陈世璋、沈士远、郑寿仁、冯祖荀、张大椿各十八票。以上十六人当选。”（《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4日）

10月15日 北大日刊载李大钊为北京地方服务团捐款洋四元。

《北京大学启事》：“本校前代北京地方服务团，向教职员学生各方面，征求团员及捐款，兹谨宣布之。”

“李大钊洋四元、王修洋二元、叶浩吾洋五元、曾广尧洋一元、刘文典洋一元、白雄远洋二元、欧本鹏洋一元。”（《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5日）

10月16日 任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委员。

《评议会通告》：“十月十六日评议会议决事件应行公布者如左。”“（二）本届组织、预算、审计、出版、仪器、图书、庶务聘任各委员会委员，由校长推定，提出名单，业经评议会通过如左。”“图书委员会委员：顾孟余（长）、李大钊、陈世璋、叶瀚、陶履恭、陈启修、朱希祖、孙国璋、马衡。”（《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18日）

10月17日 在《新生活》第41期上发表《变革的原动力》、《人治与自治》。前一篇短文指出：“饥饿是变革的原动力。法兰西大革命，饥饿是重要的原因；俄罗斯大革命，饥饿也是重要的原因。”

10月25日 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常会。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报告》：“十月二十五日常会。是日午后三点钟，北京同人假北京大学图书馆开会。到会者为李君守常、孟君寿椿、徐君彦之、邓君仲澥、苏君演存、高君尚德、黄君一葵、张君申甫、陈君愚生。是日所提议事件如后。一，筹备延请名人演讲。”“二、整顿月刊广告”。“三、改订常会日期”。（《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

10月29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主任启事》。

“近来旁听生诸君要求和本科生一律借书的很有几位，此事俟交图书委员会会议决后，再为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30日）

10月 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张国焘《我的回忆》：“九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会的共

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首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我简略的报告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那时上海小组所创办的《劳动者周刊》已经出版，我们在会场上将创刊号发给大家看，这也是使会议生色的一件事。”

“我们讨论到工作如何进行及分配。黄凌霜等根据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张各项职务不必用甚么确定的名义，小组决定应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担。结果决定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联络的任务，我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黄凌霜、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的责任，罗章龙、刘仁静和我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担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至于经费问题，李大钊当众宣布，他每月捐出个人薪俸八十元为各项工作之用。”

11月8日 出席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会议。

《民国九年十一月八日开第六次图书委员会》：

“到会者：顾孟余、陈世璋、马衡、叶瀚、朱希祖、李大钊。一，议决英文杂志应由陈聘丞、陶孟和两先生，日文杂志应由陈惺农、朱遽先、李守常三先生到图书馆审查，应否续订。”

11月25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十八次总务委员会议。

《本校纪事》：“第十八次总务委员会议纪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

出席委员：陈世璋、李辛白、沈士远、郑寿仁、蒋梦麟、李大钊。

蒋梦麟君主席

议案：

一，旧制旁听及选科生，新改正科，可否根据旁听及选科时年考成绩，发给津贴？

议决：本校未便决定，电询各该省覆电照办。”（《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1月26日）

11月26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例会。

《十一月廿六日开例会》：“本日到会人：陶孟和、胡适之、陶代、陈聘丞、马叙伦、王抚五、俞同奎、郑寿仁、陈启修、沈士远、朱希祖、冯祖荀、张大椿、何育杰、顾孟余、蒋梦麟、李大钊。”

“（九）李守常提出教员学生借书规则修正案。陈聘丞先生提议：（一）凡单本之书籍，不借与学生出馆外阅看。（二）暂取生及旁听生借书，无论单本复本只能在馆内阅看，不得借出馆外。”（《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

11月28日 为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作《自然与人生》的讲演。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北京方面的报告》：“十一月廿八那一天，假座北大第一院第二教室开第一次学术谈话会，除会员都到外，并由各会员预约许多非会员男女同志十余人加入。”“那天分讲演讨论两项，讲演题目为《自然与人生》，是会员守常担任。讨论题目为《罗素、勃拉克与中国婚姻问题》，是会员仲澥提出的。”（《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1921年1月15日）

12月1日 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揭露唯心史观的实质，指出用这种史观写的史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的听他们掠

夺”，而唯物史观则与此完全相反，其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在唯物史观看来，“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所以，“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

12月2日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李大钊为首批会员。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通告》：“本会于本月二日正式成立，编译丛书及请名人讲演，均在积极进行中；特先将简章宣布如下：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简章

(一) 宗旨：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二) 定名：暂定为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会员暂时限定北大同学）。

(三) 方法：1. 文字宣传

A, 编译社会主义丛书，甲种（大丛书），乙种（小丛书）。

B, 翻译社会主义研究集。

C, 发表社会主义论文。

2. 讲演

(四) 会员：对于社会主义有信仰和有研究能力的北大同学，由本会会员介绍或自愿入会，均经全体会员通过加入。

(五) 出会: 会员因(一)自愿(二)信仰变更(三)于一年期内对于本会无所贡献者, 得自由或由本会认为退会。

(六) 职务: 会务由全体会员负责, 采轮流或自由担任制度。

(七) 所得捐: 会员用本会名义发行之书报或论文所得报酬, 应抽百分之五为本会会费, 又百分之五为公共购书费。

(八) 特别捐: 会中遇有特别需款时, 用绝对自由的方法, 征收特别捐, 无入会金及常年捐。

社员名单: (依姓氏笔划繁简为序)

李大钊(守常)、何恩枢(北衡)、徐其湘(六儿)、陈学池(儒康)、郭弼藩(梦良)、陈顾远(晴皋)、费秉铎(觉天)、鄢祥提(公复)。

通讯处: 本校第一宿舍郭梦良处。”(《北京大学日刊》, 1920年12月4日)

12月7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临时会。

《十二月七日开临时会》: “出席人: 蒋梦麟、顾孟余、朱希祖、李大钊、郑寿仁、沈士远、陈世璋、俞同奎、王星拱、何育杰、冯祖荀、陈启修、张菊人冯代、陶孟和顾代、胡适蒋代。”“(五) 学生对于图书馆办法建议案, 沈士远先生提出, 交图书委员会审查。通过。

李守常先生要求下次开会时, 应将此案尽先付议。通过。”(《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

12月8日 在《批评》第4号上发表《欧文底传略和他底新村运动》一文。并出席北京大学第十九次总务委员会议。

《本校纪事》: “第十九次总务委员会议纪事 十二月八日

下午四时。

出席委员：蒋梦麟、郑寿仁、陈世璋、李大钊、沈士远、李辛白。”（《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0日）

12月23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二十次总务委员会会议，并参加该校评议会十二月常会。

《本校纪事》：“第二十次总务委员会会议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下午二时。

出席委员：沈士远、郑寿仁、李辛白、蒋梦麟、陈世璋、李大钊。蒋梦麟君主席。议案：“（四）平民教育讲演团，请由学校于本校附近，设讲演所一处，以为该团员讲演地点。议决：平民教育讲演团，所以提高国民常识，推行平民教育，应予提倡辅助，即由学校在本校附近，择适中地点，租房一间，为该团设备讲演场所。”（《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24日）

《十二月二十三日开本月常会》：“到会人：蒋梦麟、陈世璋、冯祖荀、俞同奎、郑寿仁、陈启修、何育杰、李大钊、张大椿、胡适陈聘丞代、陶孟和顾孟余代、王星拱、沈士远、顾孟余。

（一）蒋代理校长提出考试委员会委员名单

考试委员会委员：顾孟余长、郑寿仁书记，马幼渔、黄国聪、贺之才、丁燮林、王星拱、罗惠侨、陶孟和、朱希祖、燕树棠。

照原提案通过。

（二）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照左粘修正案通过。”（《北京大学评议会议事录》）

12月24日 与蒋梦麟等致函北京大学教职员会总务会议主席，挽留马夷初。

《北京大学教职员会总务会议主席姚憾启事》：“兹将迭囑

挽留马夷初先生函件，登布于左。敬希 察览并祝台绥”

附送嘱挽留马夷初先生函件于后：“恨吾先生大鉴：敬启者，自五四运动以来，教育界历经波折，赖马夷初先生等奔走维护其间，方得保持原状。今阅日刊得悉马先生函请解职，同人等默察教育前途事来未艾，用特函请先生切实挽留，俾得继续任职，以竟全功，无任盼祷。此上并祝 教祉。

（下列署名以签名先后为序）”

“顾颉刚、查士鉴、张西曼、陈达材、李大钊、胡默青、万秀岳、卢中巖、刘瑞庭”（《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24日）

一九二一年

一九二一年(中华民国十年) 三十二岁

1月11日 与李辛白等募股筹组新知书社。

《新知书社招股广告》：“本社附属於北京大学新知编译社内，以印刷发行新知编译社之图书杂志为主要营业。以（一）代售国内各种有价值之图书杂志；（二）由欧美日本返运书籍；（三）代印各处出版品等；（四）代售教育用品，为附属营业。资本总额暂定为两万元，共分四千股，每股五元，分四期招足。第一期先招五千元，业已开始招募，限于本年三月三十一日截止，募足时即行开办。凡本校教职员及同学诸君愿入股者，请向下列各处，交足股款，领取收据，即于四月一日起换取股票。所有招股简章、组织简章，除已揭载本月七、八两日本校日刊及京沪各重要报纸外，有愿索阅者，请函致南河沿大纯公寓成舍我君，当即寄奉。募股经收处：

（一）北京大学学生银行（北河沿第三院）。

（二）李辛白君（第一院出版部主任室）。

（三）沈士远君（第一院庶务主任室）。

（四）沈兼士君（第一院国文教授会）。

（五）李大钊君（第一院图书主任室）。”（《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月11日）

1月15日 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上发表《自由与秩序》，指出：“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

1月17日 出席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会议。

《民国十年一月十七日开图书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到会者：顾孟余、陈启修、顾代、朱希祖、陶孟和、李代、李大钊、马衡。”

1月20日 收袁同礼函一件。是日，鲁迅寄李大钊信一封。

《袁同礼君致蒋梦麟李守常两先生函》：“梦麟、守常先生：上月寄守常先生一信，已收到否？闻孑民先生业已赴法，由梦麟先生主持校务。近想两先生健康、大学进步！罗素已抵中国，并任教席，闻之欣悦！同礼抵美以来，愈感经营本国大学之不可缓！年来出国留学，不可谓不发达，此为过渡时代当然之现象。平情而论，以就学国外与在国内研究者相较，所多得者亦甚有限，而经济上则太不合算！况国内教育不发达，一经回国，最易与旧空气同化，然此仅就上等学生而言。至于宿妓涉赌之流，宁让其在国内沈论（沦），不必来此为外人藐视也！教育当局对于出国留学，亟应加以取缔。愿先生能唤其注意！”（《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月20日）

《鲁迅日记》：“二十日 晴。上午寄李守常信。下午还图书分馆书。”

1月22日 为反对停办《新青年》杂志事，致函胡适。信中写道：“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

对的不赞成停办，因为停办比分裂还不好。”

1月26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并被推举为修正各种章程五委员之一。

《十年一月廿六日开常会》：“出席人：郑寿仁、朱希祖、陈启修、冯祖荀、陈世璋、顾孟余、张大椿、沈士远、俞星枢、陈聘丞、何育杰、陶孟和、蒋梦麟^{顾代}、李大钊、马叙伦^{沈士远代}、王星拱。（一）职员待遇规则学〔草〕案。议决：保留至下次常会时再议，并由评议会推定委员五人，调查部定章程及本校从前各种章程修正之。即刻推定蒋梦麟、陶孟和、朱希祖、李大钊、马裕藻五君为委员。”（《评议会议事录》）

1月27日 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临时会。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北京总会的报告》：“三，一月二十七日临时会。执行部副主任邓君仲澥将有赴粤任教职，而正主任陈君愚生又复在川，不得不另行推举一人暂时代理执行部事宜。特于一月二十七日，假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召集临时会议。邓君仲澥以事临时赴西山，是日出席者为李守常、苏演存、孟寿椿、高君宇、陈仲瑜、刘养初、黄日葵七君。公推陈君仲瑜代理执行部主任，众均赞成。又苏君演存以实无余力担任月刊编辑，拟于第九期出完宗教问题号后，卸却少年中国月刊编辑正主任，辞意坚决。众拟请副主任黄君日葵担任，而黄君又以在求学时代，宜多读书，不愿过于分心。苏君因提议将编辑部移沪，与印刷同在一地，较为便利。并推荐左舜生君担任编辑，众均赞成，遂通过。”（《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

1月 赞同于七月在南京召开国内、日本及南洋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全体大会。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评议部记事》：“恽代英君提议，于民国十年七月，在南京开国内、日本及南洋的会员全体大会。原案已见本刊本期恽代英君之《少年中国学会的问题》一文内，不再重录，该文即这提案的说明书。余家菊、左舜生、孟寿椿、李守常、黄日葵诸君均甚赞同。”（《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1921年1月15日）

2月2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二十一一次总务委员会议。

《本校纪事》：“第二十一一次总务委员会议纪事 十年二月二日下午四时。出席委员：李辛白、郑寿仁、沈士远、李大钊、蒋梦麟、陈世璋郑代。

蒋梦麟君主席。议案：一，以后校内各机关新聘事务员及书记，均以三个月为试用期；试用期满，如确系称职，然后正式任用。议决：通过。”（《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2月4日）

2月3日 出席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会议。

《民国十年二月三日开图书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到会者，朱希祖、陈启修、孙国璋、顾孟余、陈世璋、陶孟和季代、李大钊。”

2月4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主任通告》：“近顷有几位同学关于图书馆有商榷者数事，兹为简单答复于左：

（一）第三院阅览室即将设置。

（二）第一院典书课办公室与阅览室即行分开。”

2月19日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假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开常会。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北京总会方面》：“二月十九日假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开常会。由邓仲澥提出下列诸问题，讨论结

果如下。”第四，讨论主义问题 本学会虽定有宗旨曰“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会员间有觉得太空泛了，拟选择一种‘主义’以充实之，庶乃精神贯注，成效可期。”“因此北京方面，议定尽一、二月内先将各种主义精心研究。并一面邀请深知社会主义者到会讲演，以备吾人参考。过二三月后，由会员间开讨论会数次，稍稍决定采取之趋向，以备南京大会开会时提出。并希望各地会员亦同样进行，且通讯讨论。”（《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1年3月15日）

2月20日 所写《民众的新年》、《近来的倒戈运动》、《堕落的法兰西文明》等文，发表在《新生活》第45期上。

2月21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二十一日 早，接家谕并李守常函。接葛耀亭自保定来电，系马日发，仍促余前往。”

2月24日 鲁迅接李大钊来信。

《鲁迅日记》：“二十四日 晴。夜得李守常信。得大学信。”

3月2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

《三月二日常会》：“朱暹先、李守常、张菊人、郑铁如、何吟管、陶孟和、陈聘丞、俞星枢、沈士远、马夷初^{沈代}、胡适之、王抚五^{陶代}、冯汉叔^{何代}、顾梦余^{朱代}、陈惺农^{胡代}、蒋梦麟。

（一）音乐系之设立。由教育部每月给二百八十元，为筹备费；本校即以此费资送赵元任博士往欧美留学。两年之后，始实行开办。开办费及常年费，届时请部增加预算。

通过。

（二）沈尹默教授请续假两年，以便在京都大学继续研究。函中并言辞去本校所给津贴。议决：续假二年。

通过。

(三) 夏浮筠教授函称,无法买船票,请续假半年。”(《评议会议事录》)

3月3日 为新知书社募款三百元。

《新知书社计划书(成平拟)》:“(2)股款之预测:我们的招股简章上,本说只招足四分之一(即五千元)即行开办。现在距第一次招股截正(止)期还有一日,而观测募股清(情)形,已有超过五千元之趋势。”“现在且把各募股人募股的成绩,列表如左。”“李守常君三百元、沈士远君五十元、沈兼士君五十元、李辛白君乙百元。”(《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3月3日)

3月5日 在《新生活》第46期上发表《黄昏时候的哭声》、《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山西》等文。前两篇文章描述了北京贫民生活的悲惨情景,指出:“一家饱暖千家哭,稍有情感的人,便有酒肉在前,恐怕也不能忍心下咽吧!”同日,北京《益世报》刊登了李大钊的《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

3月6日 被推举为新知书社筹备委员会总务股委员。

《新知书社开会纪事》:“新知书社于上星期日(即六日)下午一时,在第二院,开募股人大会,出席者,约二十余人。由成舍我君主席,先将新知书社之旨趣,略为声述,大意谓:‘中国现在救济知识的饥荒,实比救灾还重要。’”“我们校内同人,就联合北京教育界,来发起这个新知书社,并分途招募股款”。“决定即日组织筹备委员会,并当场推定成舍我君为筹备主任。李辛白君、钱秣陵君、李守常君、吴前模君为总务股委员。”(《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3月8日)

3月12日 被推举参加索薪斗争的组织委员会。

《北大高工教职员议决罢工 自本月十四日起实行》：“昨日下午北大教职员在第二院大讲堂开临时大会，讨论经费问题。到者百余人”，“由姚懋教授主席，胡适、陈世璋等教授相继发表意见，略谓政府当局将国家收入当作私产，任意分配，创造新的教育事业，如开办交通大学，职工教育讲习所。对于固有的学校，公认的最高教育机关，反不予维持。结果为‘自三月十四日起’暂行停止职务，要求政府于直辖各铁道收入项下，拨付教职员积欠薪俸及国立各校经常费。继推出陈世璋、马叙伦、王绍瀛、陶履恭、谭仲逵、顾梦余、王星拱、周象贤、李守常等十一人组织委员会，执行上列表决案。”（《京报》，1921年3月13日）

3月15日 被指定为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新闻股办事。

《教育界之罢工风潮》：“昨日国立各校教职员已实行罢工。上午十时，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二十余人，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会，临时推定北大代表马叙伦为主席。先由高师代表马裕藻提出，高师教职员希望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从今以后，组织一永久的联合机关。讨论结果，先组织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每校得派代表三人到场，惟只有一表决权。自明日（即今日）起，每日下午一时半至三时半，在美术学校开会。并票选马叙伦为主席，由主席指定女高师代表李贻燕为文牍股办事，美术代表吴起凡为庶务兼会计股办事，美术代表徐瑾及北大之李大钊为新闻股办事。全体议决。（一）要求指定确实款项，作为教育基金。（二）要求清偿积欠薪修（俸）。并由美术代表徐瑾，报告该校

教职员会决定要求政府将各部所办学校，一概划归教育部管辖，以谋教育统一。讨论结果，均以此问题，为正当办法。决于上政府呈文内详叙须统一教育之理由。直至下午一时半，始宣告散会云。闻该会对于宣言书一项，拟从速发表。将此次罢工之目的，宣告于世，以免外间之误会。”（《晨报》，1921年3月16日）

3月16日 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会议。

《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情形致王怀庆报告》：“窃三月十六日早，电陈德荣电招，谦于下午二时到北大第二院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查是日到会者共二十四人，探知其姓名者如罗章龙、李一志、徐六几、张作陶、顾文仪、徐文义、郭文华、宋价、何孟雄及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廷璠、伯时、德荣。”（《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3月18日 为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北大加派的代表。

《教职员联席会议》：“昨日（十八日）下午一时半，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北京美术学校开第三次会议。首由马叙伦主席报告，”“北大加派郑寿仁、陶履恭、顾孟余、王绍瀛、谭熙鸿、何鸿基、李大钊、周象贤等八人为代表。”（《京报》，1921年3月19日）

3月20日 在《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上刊登给费觉天的信，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文中指出：“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所

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3月21日 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决定组织“半周刊”。李大钊被指定担任编辑事宜。同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李大钊的《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昨日各校教职员代表会议》：“昨日（二十一）下午一时半，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会代表联席会议，在北京美术学校开第四次大会。先由主席马叙伦报告”，“报告毕，谭熙鸿发言，谓外间对于本会之态度与不得已之行动，诸多误会，甚且有谓本会为党派所利用者，本会不得不将态度苦衷等，完全表闻于世。主张自行发刊报纸，既可表示吾人之意见，又可使社会减少误会。讨论结果，决定组织‘半周刊’，自本星期三起，每星期三星期六各发行一次，并设发行、印刷两部于北京大学。指定北大之李大钊、孟寿椿及女高师之李贻燕三人，担任编辑事宜。最后，并稍讨论本日（二十一日）下午四时三代表往见教育范总长之手续。”（《晨报》，1921年3月22日）

3月30日 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提议成立事务所及筹备油印机，并被选为执行委员。

《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情形报告》：“窃于三月三十日下午一时三十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开第四次大会。查是日到会者共三十五人，探知其姓名者，有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尚德、宋价、顾文萃、王伯时、郑振铎、徐六几、张作陶、陈德荣、李一志、顾文仪、

徐文义、郭文华等。”“李大钊、顾文萃提议，本团事务日渐纷繁，实际上发达亦得很快，所以应极急进行的手续，势必多起，兹拟设立一个事务所及筹备印刷机，使总机关成立，以利办理。随付表决，多数赞成。事务所由调查股极力寻找，而油印机由李大钊、顾文萃担任筹措。”“由团员张君临时动议，将本团旧有之四股制及委员制，改正为执行委员会”。“大多数同意，当即投票改选。公推张国焘为书记委员；刘仁静为会计委员；顾文萃、高尚德、祁某为组织委员；宋价、王伯时、某为教育委员；李大钊、郑振铎、某为出版委员。”（《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3月 在《曙光》第2卷第2期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下之实业》。前一篇文章提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人都有了，最近谈 Communism 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各国的C派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春 帮助天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郝久亭谈天津建党情况》：“于方舟、韩麟符等在五四运动前就受到新中学会的影响了，至五四运动起来后，就更与李

守常、于树德、安体诚等密切起来。天津五四运动的组织与各种组织名称,均与李守常等指导分不开的。五四运动后,曾由于树德等元纬路某里办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既又在河北建立女星社,于方舟、韩麟符等又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着在会内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订有新青年刊物。会与团建立的确切时间我不敢肯定,但确有期可循。五四运动后,我去烟台时尚无此种组织,至一九二一年六月,我去宣化中学教学路过天津,与安体诚见面,才知道于方舟等已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来,并了解是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变的,我才在口头上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教学中发展团员。”

4月8日 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上海与北京会员的谈话会。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二)四月八日北京的谈话会。上海会员恽震、吴保丰两君,因参观北京唐山等处工厂北上,四月八日在会员李君守常家开会。到会者除恽、吴两君外,有章君了天、苏君演存、沈君君怡、李君守常、孟君寿椿、陈君仲瑜六人。”(《少年中国》第2卷第11期,1921年5月15日)

4月19日 鲁迅寄信给李大钊。

《鲁迅日记》：“十九日 晴,风。午后寄李守常信。”

4月24日 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大会。

《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大会情形报告》：“窃于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大第二院开第五次大会。查是日出席者十六人:李大钊、王伯时、谌小岑、王永禄、易道尊、王复生、张国焘、高尚德、祁大鹏、宋价、刘仁静、罗章龙,不知姓名三人及谦等。”(《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4月25日 被女子高等师范教职员会补推为出席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的代理有发言权代表,并在会上报告接见北大毕业生同学会代表的情况。

《教潮仍未可抱乐观,积欠问题仍未解决。八校学生代表又赴院请愿,北大毕业生同学会起为后援》:“昨日(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美术学校开第二十三次大会。主席马叙伦因病未愈仍缺席,由北大代表陈世璋代理主席。报告(一)女子高等师范教职员会来函,补推李大钊君为代理有发言权代表。(二)主席马叙伦来函,因脑病未愈,请假一星期。(三)北大毕业同学会派代表前来,已由李大钊接待。”“李大钊归席,报告接见北大毕业生同学会代表廖书仓、林彬二人情形,谓二代表叙述该同学会意见,在确实筹定教育基金及有担保,希望教职员方面,勿为政府所欺。并述该会上府院部呈文及函电内容。该会已决定联络八校毕业同学组织联席会,为教职员后援,望本会议随时将进行情形,报告该会云云。”(《晨报》,1921年4月26日)

4月26日 任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代理主席,主持第二十四次大会。

《消息沉闷之学潮,昨日全体教职员赴部索薪,但无结果,今日又去。八校学生请校长教职员会商》:“昨日(二十六日)下午二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第二十三(四)次大会。主席马叙伦仍因病缺席,由高师代表李大钊代理主席。报告八校学生临时联席会来函,请辞职教职员代表及各校长,于星期五(二十九

日)下午二时,到女高师该会事务所,会商八校经费问题。金以学生方面,既能注重于此,星期五下午,虽为本会议定例开会期日,可暂停一次会议,由全体代表齐往会商,当即复函与该会。次即讨论积欠问题,金以教育部方面,对于已领到二个月薪金,有自由支配,并划出一部,为发给部员薪金之意,同人当然不能承认,且尚有三个月欠薪未发,乃决定昨日散会后,全往教育部追索。并定于本日(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全体仍往教育部,为严厉的要求,非欠薪问题解决,其余诸问题,概不过问。散会时已下午四时,随即赴教部索薪,仍无结果云。”(《晨报》,1921年4月27日)

4月27日 主持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第二十五次会议,讨论毕业生考试问题及赴教育部索薪问题。

《教职员辞职索薪之无结局》:“昨日(二十七)下午二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第二十五次会议,各校代表俱到,主席马叙伦仍请假,由女高师代表李大钊代理主席。报告(一)八校此届毕业生,派代表黄哲文(法专)、方豪(北大)、朱光桓(工专)、顾华孙(农专)、黄汝贤(医专)等五人来会。谓此届毕业试验,可以师生名义,出题考试。(二)教育部三司长任鸿雋、陈宝泉、高步瀛三人来函,谓本日下午奉国务院之命,须与各校长接洽,请代表不必赴部。当即讨论,对于毕业生要求考试问题,咸以同人辞职后,已脱离学校,按法当然不能为负责的回答,惟对于学生自身,同人亦甚抱歉,希望学生向校长方面交涉,倘校长不能负责,可再向负责机关交涉。次讨论三司长来

函问题。”“讨论结果，同人与该司长等之约见在先，此时以一纸搪塞。决定仍赴部坐待。其次讨论本星期五到八校学生临时联席会，应有发言之人，乃由徐瑾提议，请谭熙鸿、马裕藻、陈世璋三代表发言，无异议。最后约请八校校长到会谈话。”（《晨报》，1921年4月28日）

4月29日 出席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学生临时联席会，招待八校校长及辞职教职员代表，并作发言。

《政府旅行中之教育界消息》：“昨日（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学生临时联席会，在石驸马大街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大讲堂，招待八校校长及辞职教职员代表。除高师校长外，余七校校长均到，教职员代表则八校齐到。首由学生代表陶玄（女高师）起立，述招待校长教职员理由。略谓学生方面，主张教育经费独立，分为三项。”“教职员代表李大钊、马裕藻二人，亦发言曰，教职员现在辞职之中，原不能过问，惟以公民资格视之，亦何忍教育破产，故校长团方面，提出于政府之说帖，要求筹定教育基金。乃基金未筹定以前，不能中断交通部之特别协款之办法，同人亦表示赞成。故若政府能依此而行，并正式经国务会议通过而宣布于世，同人亦必不坚持索欠云云。”（《晨报》，1921年4月30日）

5月1日 主持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第二十五次临时大会。

《教职员昨讨论复职问题详情》：“昨日（一日）星期日下午二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门箭道北京美术学校开第二十五次临时大会。八校代表全到，主席马叙伦带病出席，仍由女高师代表李大钊代理主席。报

告(一)前日教育部任、陈二司长赉国务院公函来会接洽情形，及与校长非正式接洽情形。(二)本日八校长已正式来函请同人复职。”(《晨报》，1921年5月2日)

5月初 参加讨论家族制度存废问题。

《“家庭研究”特刊号(七、八两期)——家族制度存废问题目录(预告)》：

“社会主义与家族制度(一)——易家铨

社会主义与家族制度(二)——费觉天

无政府主义与家族制度——凌霜

虚无主义与家族制度——朱谦之

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家族制度——徐六几

个人主义与家族制度——罗敦伟

唯物史观与家族制度——陈启修

社会主义者的家族制度观——郭梦良

近代思想与家族制度之崩坏——罗敦伟

题未定(?)——李大钊”(《京报》，1921年5月1日)

5月3日 在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议上，报告罢工以来经过及宣言复职情形。

《北大教职员捐俸建筑图书馆》：“昨天下午各校教职员代表，召集各该校同事，报告罢工以来经过及宣言复职情形。北京大学因校舍被人纵火，守卫甚为严密，故特假美术学校大礼堂开会。因天下大雨，至会者共五十余人。代表李大钊、谭熙鸿二教授将罢工后经过详情，一一当众报告。后由徐宝璜提议，该校教职员对于该二代表之奔走和措施，当加以感谢及追认，众赞成，遂一致道谢。”(《晨报》，1921年5月4日)

5月4日 上午，在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举办的“五四”纪念会上发表演说；下午，主持召开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第二十六次常会，决定六条办法，并拟于下星期一上课。

《昨日男女学生之五四纪念，上午女子开会，下午男子开会》：“又闻上午十时，女学界联合会，假女高师大礼堂开会，先奏乐，后由会长报告开会情形。去年五四，曾假东城美以美会开会，到会的人很多。此次因为筹备音乐跳舞会，不及兼顾，所以不能筹备盛会，不过略志纪念罢了。但是会员的精神，仍旧兴起勃发，又蒙名人来讲演，我们趁这机会，得听宏论，真是又快乐又感激的。报告后全体唱‘五四纪念歌’，就请蒋梦麟先生、李守常先生演说，继以来宾演说，会员演说，后唱国歌，以助余兴，散会已下午一时云。”（《晨报》，1921年5月5日）

《下星期一各校上课有希望，联席会议之报告渐一致，附中、小学已定六日先上课，高师拟捐款建图书馆为纪念》：“又昨日（四日）下午二时，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美术学校开第二十六次常会。仍由李大钊代理主席，先由法专王兆荣、医专葛成勋、美术徐瑾、女高师李贻燕、高师何炳松、农专毛恩旭、北大谭熙鸿、工专戴济等八代表，各将前昨两日各在本校开教职员会情形，详细报告一番，大意相同，均主张速将确实保障方法办妥，并希望能于下星期六（九日）上课。主席乃将此事付讨论，经详细讨论结果，约略决定办法六条。至下午四时，各校长（高师校长未到）来会，乃由谭熙鸿代表发言，要求校长方面，速照代表办法办理。王家驹代表校务讨论会发言，略谓校长方面对政府已有二种表示：（一）正式呈文，（二）公函。呈文中要求速将三部订明不作别用之办法订好宣

示，及请指定担保之银行；公函则质问预算问题及的款（款的）问题。至于教职员方面提出办法，自当尽力做去。如至彼时不能解决，校长方面当负完全责任办理，总希望早日上课云云。教职员对于此事，亦已表示同意，大约下星期一，准可上课矣。”（《晨报》，1921年5月5日）

5月6日 主持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第二十七次常会，决定办法四项。

《教育经费问题忽生变化》：“昨日（六日）上（下）午二时，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开第二十七次常会。主席马叙伦仍请假，由女高师代表李大钊代理主席。”“经详细讨论结果，决定办法四项，非政府完全办到，必不再与政府苟且敷衍面子，兹将其四项办法照录于下：

“一，交通部自四月份起，每月拨付财政部特别协款充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及北京师范大学暨公立中小学校经费二十二万元，须尽先拨存国家银行，一面咨明财政部，财政部接到交通部前项咨文，即日咨达教育部，教育部接到财政部前项咨文，即日送达支付书于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及北京师范大学，暨京师学务局。二，教育部于每月十五日止，未接到财政部前项咨文，应即咨行财政部转咨交通部，促其于三日内，履行附则第一条办法。三，财政部筹有上列各校经费的款，及拟定确实保障方法，或筹足教育基金时，须先咨行教育部，转令上列各校，俟得同意后，交通部方得截止拨付前项特别协款。四，交通部或财政部，须指定价值二百万元以上之担保品，征得国家银行之同意，以备交通部如届附则第三条规定期限，不能履行付款时，即提出该担保品于国家银行，由银行暂照前项办法

第一条额定数目垫付，限期由交通部拨还。”(《晨报》，1921年5月7日)

5月10日 主持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临时会议。

《五里雾中之教育经费问题》：“昨日(十日)下午三时，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在美术学校开临时会，八校代表均到，仍由李大钊代理主席。当即报告八校校长原定本日来会，切实答复，现在只来一公函，声明无从接洽情形，旋付诸讨论。”“于是一致决定于今日(十一日)午后三时，约各校长谈话，并催索积欠。”(《晨报》，1921年5月11日)

5月11日 主持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第二十八次常会。

《昨日教职员与校长之谈话会，教职员质问三事，校长团大诉苦衷》：“昨日午后二时，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美术学校开第二十八次常会，仍由李大钊代理主席。”“即请八校校长到会列席，八校校长均到。当由本会议代理主席提出：(一)四月份应摊还积欠”。“(二)保障方法，昨函并未提及，到底如何。(三)昨函称无从接洽一事，今日到底有政府否。质问各校长。”(《晨报》，1921年5月12日)

5月13日 主持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第二十九次大会。

《学潮将又起一波》：“昨日(十三日)下午二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代表席联〔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第二十九次大会，八校代表均到，主席马叙伦仍因病请假，由李大钊代理主席，”“决定于今日下午三时，开临时会议，先请各校长到会报告靳总理正式之结果后，视其回答

程度如何及有无诚意，然后再议全体二次辞职与否之问题。”（《晨报》，1921年5月14日）

5月14日 主持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临时会议，议决发函警告。

《愈趋愈远之学潮》：“昨日（十四日）下午三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临时会议，主席马叙伦仍病假，由李大钊代理主席。”“经详细讨论，结果议决由本会议发函警告。并议决例案数起。”（《晨报》，1921年5月15日）

5月16日 主持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第三十次常会。

《不可收拾之学潮，校长团宣言辞职，教职员限政府二十六日履行条件》：“又昨日（十六日）下午一时，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在美术学校开第三十次常会，仍由李大钊代理主席。”“一致决定向政府声明，限期于本月二十六日止，须将国务会议决定之三条办法，及拨付将来经费之保障方法，完全办妥，切实履行。并即推定起草员即日起草，其原文俟明日续志。”（《晨报》，1921年5月17日）

5月17日 主持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的紧急会议。

《校长团辞职后之教职员态度》：“教育经费问题，自政府二次失信后，从前教职员及学生之运动，已完全失败。各校长因受各方面之指摘，业于前日全体二次辞职。教职员方面因事关重大，于昨日（十七日）上午十时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召集紧急会议。八校代表均到，主席马叙伦仍因病缺席，由女高师代表李大钊代理主席。”“于是一致决定直接向政府明白表示无法维持之意，上书政府限至本月二十日上午十二时

止，须将国务会议所议决之三条办法，及拨付将来经费之保障方法，以及四月份五月份之经费与应摊还之积欠等问题，为完满解决。如届期不能解决，仍以延宕手段对付同人，同人等则视政府已无维持教育之诚意，取消五月三日宣言暂允留职之原议。”（《晨报》，1921年5月18日）

5月19日 鲁迅寄李大钊信。

《鲁迅日记》：“十九日 晴。上午寄郑振铎信。寄李守常信。寄钱玄同信。”

5月20日 主持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并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临时会议，讨论易家钺出会问题。

《教育经费问题解决无望矣》：“昨日（二十日）下午三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北京美术学校开大会，仍由女高师代表李大钊代理主席”。“决定于今日（二十一日）下午一时开临时会议，公决最后方针。”“其第二次总辞职宣言，即由文书组起草，今日（二十一日）提出讨论。散会时已四时矣。”（《晨报》，1921年5月21日）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 北京总会方面》：“（一）五月二十日的临时会。会员易君家钺和本学会同本学会会员之团体及个人两方面，平时精神同事事实上都可算没有什么关系。而易君在社会上一切举动，北京及沪宁诸同人又多不甚满意。今春易君曾自请出会，当时执行部没有发表，也是本北京同人不甚以会员轻易出会为然的意旨，无非欲郑重其事。近日京报上发现右（按：原文如此）君辱骂女高师苏梅一文，吐词淫秽，阅者无不骇怪。各方面均认为易君手笔，而彼亦无以自白。此文直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产，于社会前途影响实大。舆论哗然。平素

与易君有关系的团体先后宣告除名，本学会自更不能置而不问。重以会内外之来诘责者纷至叠来，遂于五月二十日晚上八时在守常家召集临时会议。出席者为陈愚生、雷孝实、李守常、黄日葵、沈君怡、刘养初、高君宇、章一民、苏演存九人。初有主张把易君除名的。讨论结果，金以易君此事已受了各方面许多的社会制裁，无事吾辈再为已甚，且为社会计、为个人计，亦甚望易君能从此觉悟，勉为一良好青年，故议决请执行部把易君前自请出会函提交评议部追认。适次日易君亦自来函再请出会，并表示非常抱歉之意，遂由执行部一并提交评议部，全体赞同易君自请出会，此事遂告一结束。”（《少年中国》第3卷第1期，1921年8月1日）

5月25日 鲁迅收到李大钊信。

《鲁迅日记》：“二十五日 晴。午后寄沈雁冰信。寄孙伏园信。午后往视二弟。得李守常信。”

5月28日 任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所出之半周刊总编辑。

《再度辞职后教育界之会议声》：“昨日（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辞职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在前京畿道美术学校开第三十六次会议，八校代表全到。马叙伦主席。”“决定加推副主席一人，并即投票选举，北大代表谭熙鸿得票多数，当选为副主席。”“半周刊之编辑，除李大钊为总编辑外，派黄文弼、孟寿椿、李翼庭、谭熙鸿、谷源瑞、胡鸣盛六人分任其事，并希望八校各派一人为编辑云云。”（《晨报》，1921年5月29日）

5月31日 与八校教职员代表五十余人，赴教育部索取

欠薪；同日，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组织的留别会。

《教职员连日索欠之情形》：“又昨日十时，教职员等代表五十余人，又赴教育部索欠。由该部庶务科派员在西花厅招待。普通司长陈宝泉、专门司长任鸿雋出而接见。教职员中马叙伦、李大钊、谭熙鸿等，相继发言，陈述索欠之理由，并质问国务院究竟有无具体之办法。任、陈等均以教育当局业已发表为词，不肯为负责之答复。双方辩论甚久，不得要领。唯是日陈任中又负约不到部，教职员代表与陈、任两司长到陈宅，时陈任中适坐车中要走。代表等阻之。陈任中出言不逊，代表等力请下车。陈不得已下车，代表又请其到部，并责其何以出言不逊。陈不得已，跪地叩首谢罪。”“至下午一时，司长乃请代表在部午膳。至下午四时，任、陈二司长来言，本日实无办法。请诸位暂回，俟明日马次长到部再商。马次长既敢到部，自有善法云云。代表等答言，同人到部，并不与马次长相干。如要同人回去，请诸位在同人等前宣誓。不管次长到与不到，限一日或二日，将积欠之事办妥乃可。任、陈不允，惟云须部中全体负责乃可。可否由诸位请各参事司长全到此处，当众负责。于是医专代表往请参事汤中，女高师及法专代表往请社会司司长高步瀛，工专代表往请参事邓萃英，高师代表往请参事秦祕，北大代表往请参事蒋维乔。一面徐鸿宝泌（秘）书飭庶务科预备晚膳十桌。此昨日下午五时之情形也。”（《晨报》，1921年6月1日）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二）五月三十一日的留别会。会员沈君怡赴德留学，孟寿椿赴美留学，均不日离京。北京同人特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城南公园开留别会，摄影纪念。到者有

李守常、陈愚生、黄日葵、刘养初、高君宇、章一民、邓仲瀛、苏演存八人。是夜于浣花春公饯，谈到九时，尽欢而散。”（《少年中国》第3卷第1期，1921年8月1日）

6月3日 与各校同学千余人，及各校校长教职员到国务院请愿，要求拨发教育经费，遭反动军警殴打。

《挨打后教职员学生之文告》：“（三）各校学生通电，上海各报馆转各法团公鉴：昨日小学以上各校学生代表二十二人到国务院请愿拨发教育经费，被拘纯一斋内，经一昼夜尚未出院，消息不通。本日各校同学千余人，复偕同马次长及各校校长教职员冒雨续行到院请愿，自上午九时迄下午四时，始终拒绝不见。同人坚求放入，不意门前密布之军警，即用枪柄肆行殴打，并往来追击，当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被（遍）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倒地，不省人事，此外受重伤者三十余人，轻伤者百余人。似此野蛮横暴虽土匪盗贼何以加此。同人痛愤之余，恨不能与万恶政府同时拼（命）于新华门前，特据情飞电奉闻，同人誓奋余生，作最后奋斗以殉我神圣教育。至应如何惩此万恶政府，惟国人速图之。临电不胜迫切。又此电将发时，闻教部人员将于明日全体辞职，并闻。北京公立各校学生临时联席会议叩。”（《晨报》，1921年6月5日）

6月16日 伤愈，无恙。

《白坚武日记》：“十六日 接到李泽民来函一件，知守常无恙。沐浴。”

6月中 陪同美国国会图书馆汉文书籍编目员卫德女士

参观北京大学图书馆。

《本校纪事》：“美国国会图书馆派遣汉文书籍编目员卫德女士(Katharine H. Wead)到中国来研习汉文，并研究汉文书籍编目方法。本校于五月中旬接到金陵大学校长鲍文(A. I. Bowan)先生的介绍信”，“六月中，卫德女士到校参观图书馆，其时正在罢课期中，办事方面无可见者，由图书部主任李守常先生导观各书库，并请其转达美国国会图书馆长卜提间博士(Dr. Putnam)，请他把他们的书目片子，送给我们一分，又汉文书籍编目法亦请其向施文葛博士索寄一部。兹得来书云(金陵大学原译稿)：守常先生赐鉴：今夏道出燕京，备承指导，又蒙示以藏书，甚感甚感。随即致函国会图书馆馆长卜提间博士，转达足下拟索取该馆目录卡片之盛意，想彼现已有报命矣。至该馆中文部主任施文葛处亦已去函，请其将中文书编目法函致尊处，藉备参考。至尊处所有祁君著之中文书编目法，曾蒙允假给敝处一用，兹特请敝馆主任具函奉借，务希慨允，一俟译书告竣，立即奉还。此颂公绥 卫德谨启一九二一·九·十七。”(《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9月30日)

6月 共产国际派马林与李克诺斯基来中国，到北京同李大钊等商谈召集全国性的建党会议。

栖梧老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九二一年六月间，第三国际派马林来中国，与他同来的还有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李克诺斯基，他们先到北京同李大钊、张国焘等会谈了几次，马林建议召集一个全国性的建党会议，北京方面的同志同意这个建议，李大钊同志因为工作关系，不能离开北京，即由张国焘同马林、李克诺斯基一路到上海与李汉俊等会商。”

6月28日 在《晨报》上与李季、李发等共同发表《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

《专件·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我们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的三层意思：——一，想普及新文化运动。”“二，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三，想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编辑人(以姓字笔画繁简为序)李大钊、李季、李发、李汉俊、邵力子、沈玄庐、周作人、周佛海、周建人、沈雁冰、夏丐(丐)尊、陈望道、陈独秀、戴季陶、经亨颐。(通信处：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转新时代丛书社，商务印书馆)”(《晨报》，1921年6月28日)

6月29日 出席北京各团体联席会并发言。

《军警干涉后之各团联席会》：“京师公立各校学生联席会，发起各团体联席会。本定于昨日午后在女高师开会，嗣因事前军警干涉，乃通知各团体移于某校开会。到者除教职员及学生各团体外，有全国报界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及京师教育会，共十一团体。由众推公立各校学生代表何玉书为临时主席。旋即报告该会主张，关于六三问题，请政府撤换靳云鹏，关于教育问题，筹办学校。并请全国教育会提前开会，及学生总会开会，以讨论一切。又该会代表刘衡静发言”，“八校教职员代表李大钊，谓教职员前因所处地位的关系，以索欠为一种手段，社会一部人的观察，对于此点，颇不明了，马邻翼亦误会教职员为争欠薪，而不知此外尚有教育经费巩固之一大目的。至于六三事件，所以在法庭起诉，实因政府欲假法律为利器，教职员不得已而以此手段对付之。在现政治下之法律，非国民起而拥护之，难望其有独立精神，今日多数团体主张从法律解

决，应当注意。”（《晨报》，1921年6月30日）

7月1日 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发表《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

7月4日 主持教职员联席会议第五十四次会议。

《昨日之教职员联席会议·调停清华罢课风潮，议决电唁安徽学生姜高琦，研究全国教育基金问题》：“昨日教职员开第五十四次联席会议，王兆荣因病请假，由女高师李大钊代理主席，报告范静生氏来与本会议主席王兆荣接洽情形后，续即报告本会议赴沪代表谭熙鸿由杭来信，报告与各方面接洽情形后，对于清华学校此次因援助八校罢课，致高等四年级学生未能毕业，三年级以下未能升学，牺牲太大，同人等实抱不安，不得不图挽救调解之法，寻议决致函清华学校董事会及教职员会，并派梁希陆费执燕树堂三人为代表，与金仲藩校长接洽。次议决对于安徽学〔生〕姜高琦受伤过重，已于七月一日殒命，应电吊唁。次于筹划全国教育基金问题，如退还庚子赔款，分清国家教育租税等，议决作一议案，俟下次交本会议教育基金委员会，详细研究，以备将来全国教职员联合会成立时提出，遂宣告散会。”（《晨报》，1921年7月5日）

7月15日 代表八校辞职教职员联席会与学生联席会接洽，希望学生与教职员取一致行动。

《决定承认五条办法之教育界·教职员校长团决议相同，惟复职当在政府慰问之后，学生方面可望一致行动，但亦须俟调人之正式答复》：“迁延四月之教育风潮，自前日下午范、江、傅、张四调人，正式与校长教职员学生三方面接洽后，各方面意见，大体已归一致，惟形式上尚有待商之处，故未能即告解

决。昨日(十五日)上午九时,八校辞职教职员代表开临时联席会议,仍由王兆荣主席。”“对于学生方面之意见,讨论结果,由本会议公推王兆荣、李大钊二君,即日与学生会接洽。时已十一时,遂宣告散会。”“学生方面,昨日上午国立公立各校学生临时联席会在高等师范开会,由何玉书等报告与调人接洽情形后,金以学生所注重之问题,调人尚无正式回答,此时不便讨论,俟接到调人正式答复后再议。当时教职员会议派王兆荣、李大钊两代表到会,将教职员开会议决情形,向学生报告,并希望学生与教职员取一致行动,大概学生方面不致再发生他项问题,惟俟调人正式答复之一番手续耳。”(《晨报》,1921年7月16日)

7月20日 参加会葬陈愚生夫人金绮。

《吴虞日记》：“七月二十号 星三 十六 晴

至陶然亭会葬陈愚生夫人金绮,晤李守常、许幼田、康心如、心之、雷孝香、孝实、鄢公甫、倪平欧、李之长、康婉明。十二时,雇车过琉璃厂。”

7月30日 预定在美术学校讲《社会与个人》。

《读者日历》：“三十日(阴二十六日星期六)——八校公共学术讲演会。地点:美术学校。时间:上午九时至十一时。讲题:社会与个人。讲演者:李大钊。”(《晨报》,1921年7月27日)

7月 为李泰棻《西洋大历史》一书作序。

暑假期中 应邀赴四川举行暑期讲演。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陈愚生已由京回川,并邀有会员李大钊、邓仲澥、杨效春、黄日葵赴川举行暑期讲演,现均留滞重庆,陈君通讯处仍在东川道尹公署。”(《少年中国》第3卷第

2 期,1921 年 9 月)

8 月 16 日 在长美轩晤蒋梦麟、吴虞等。

《吴虞日记》：“八月十六号 星三 阴晴不定

至长美轩，晤蒋梦麟、马夷初、李守常、王弘实、李贻燕、谭仲夔谈久之。”

8 月 参加发起国立八校教职员太平洋问题研究会。

《吴虞日记》：“八月十七号 星三 微雨 谭熙鸿、马叙伦、蒋梦麟、李大钊、王兆荣、王士杰、燕树堂、李贻燕、俞同奎、王家驹、熊崇煦、邓萃英、张蔽、郑锦、吴宗枏、黄人望、尹贵武、张鼎乾、徐瑾、武绍程、许绳祖、戴兆元、葛成勋、许瑛璇、唐廷诰

于本月发起国立八校教职员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并定于十九日午后二时，在前京畿道美术学校开成立大会，凡八校同人，均请出席。”

9 月 10 日 被选为少年中国学会第三届评议员。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二) 本学会第三届评议员之举出。本会选举第三届评议员事，现已完竣，兹将执行部报告照录如后。

迳启者：本屆评议员选举结果，左舜生、恽代英、苏甲荣、李大钊、余家菊、陈清、邓仲澍七君得票最多，应当选为评议员。除选举票数另行宣布外，特此通知，即希查照。此致本会诸君。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谨启 十年九月十日”(《少年中国》第 3 卷第 3 期,1921 年 10 月)

9 月 14 日 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谈话会，推举执行部正、副主任。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北京总会最近状况》：“北京方面会员，暑假中留京者：为李守常、陈愚生、章一民、杨钟健、鄢祥禔、苏演存六人”。“北京同人特趁余君来京，愚生将去之时，于九月十四夜七时，在中央公园米今雨轩前面开谈话会。到者为高君宇、李守常、陈愚生、黄日葵、余景陶、杨钟健、鄢公复、陈仲瑜、章一民、苏演存十人。当时由执行部宣布本届评议员选举结果（详情另见总会通告）。适在座者有本届评议员李守常、陈愚生、余景陶、苏演存四人，因商定推举杨君钟健为本届执行部正主任，陈君仲瑜为副主任，其余评议员三人，则另发函征求其同意焉。”（《少年中国》第3卷第4期，1921年11月1日）

10月2日 同意为北京大学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开辟阅览室。

《北大学生继起组织讨论会》：“北大学生费觉天、周长宪、陈国桀、陈学池、倪平欧、黄绍谷、鄢祥禔、郭梦良、吴天放、梅恕因、汪瀚、胡泽、邹德高等”，“因于日前发起北京大学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并于昨日在该校理科大讲堂开成立大会”，“又该校图书馆主任李大钊面允收集一切材料，别置一室，以供会员参考。”（《晨报》，1921年10月3日）

10月15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二十二次总务委员会会议。

《本校纪事》：“第二十二次总务委员会会议纪事 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出席委员：李辛白、李大钊、余文灿、沈士远。沈士远君主席。议案：一、各省津贴缺额，多按学年成绩选补，现因上学年尚未举行学年考试，本届各省催送学生成绩，是否仍以九年度学年成绩咨报各省，作为选补津贴之标准？议决：仍以九年度学年成绩咨报各省，作为选补津贴之标准。”（《北

京大学日刊》，1921年10月18日）

10月16日 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常会，讨论一般会务。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一）十月十六日总会的常会十月十六日下午七时，在北大第二院地质研究会开会，到会者有李守常、苏演存、黄日葵、邓仲澥、陈仲瑜、杨钟健及新由日本回国之会员沈懋德君共七位。首由杨钟健报告近况，略谓会员终身志业表已付印，研究会无大进行，各地会员消息亦不灵通等等。”（《少年中国》第3卷第6期，1922年1月1日）

10月18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

《十月十八日开会》：“出席人：陈启修、何育杰、胡适、冯祖荀、朱希祖、陶孟和、沈士远、李大钊、陈世璋、顾孟余、张大椿、王星拱、俞星枢。

（一）韩述祖先生要求延长留学期间六个月，研究职业心理案。议决：大多数可决。（二）何育杰先生提出，本校教授孙瑞林自请赴美，研究高深学术，请援本校优待教授出洋留学条例支給全薪或半薪案。议决：支給原薪半数两年。

（二）临时优待教员办法案。此后本校教员援优待先例，请求准假休息支取原薪或半薪时，须事前预先知会学校请求审查。多数通过。

（三）预科委员会组织大纲。”（《评议会议事录》）

10月20日 在图书馆会见吴虞。

《吴虞日记》：“十月二十号

顾颉刚来，同往观丛书，又同至图书馆填借书证。晤李守常。复同往观中国书库，提出书多种入研究所。时已十二时。”

11月1日 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通知李大钊等，催交入会愿书及终身志业表。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执行部通告》：“（一）查本会会员，尚有左列诸君，未曾签交入会愿书，业已将入会愿书分别寄去，尚乞即日签就，寄交执行部为盼！”

“周晓和、李珩、张芳谷、刘泗英、赵世炯、赵寿人、雷孝实、李守常、毛泽东、陈政、汤腾汉。”“（二）本会前曾请会员诸君填写终身志业表，时已将近十月，寄回者已有五十五人，尚有左列二十七位，未曾交来，已由执行部分别再行补寄一表，请诸君补填。”“李大钊、赵寿人、雷宝华、赵世炯、黄日葵、段子燮、赵叔愚、张芳谷、李贵诚、鄢祥禔、沈昌。”“本年已交会费者：”“毛泽东、陈清、李守常、杨钟健、陈政、左舜生、张闻天、恽震。”（《少年中国》第3卷第4期，1921年11月1日）

11月2日 当选为北京大学评议员。

《校长启事（一）》：“本届本校评议员选举，已于昨日下午四时一刻在第二院大礼堂当众开票，计收到选举票共六十九张，兹记其结果如左：谭熙鸿四十四票、顾孟余四十二票、胡适四十一票、王星拱四十一票、陈世璋四十票、何育杰三十五票、陶履恭三十二票、沈士远三十票、朱锡龄三十票、李大钊二十九票、俞同奎二十九票、冯祖荀二十九票、马裕藻二十七票、夏元璜二十六票，以上十四人当选。”（《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3日）

11月4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主任启事》：“范时训、李中安、万文生、李逢时、张国祥、聂思敬诸君鉴：望于四日下午一时至四时间来图书主任室一谈。”

11月9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当选为评议会书记。

《民国十年十一月九号第一次评议会》：“到会者：王星拱、马裕藻、夏元瑛、陶孟和、俞同奎、冯祖荀、沈士远、贺之才、朱锡龄、陈聘丞、何育杰^{陈代}、张菊人^{锡龄代}、谭熙鸿^{代理主席}、李大钊、顾孟余。

（票举评议会书记，李守常以五票当选，谭仲逵四票为次多数）”“（一）议事规则宜实行案。议决：按评议会规则实行。（二）校长委任组织委员会委员案。组织委员会：马寅初（长）、陶孟和、胡适、马叙伦、陈启修、陈世璋、顾孟余、沈士远、谭熙鸿。议决：原案通过。（三）校长委任预算委员会委员案。”（《评议会议事录》）

11月13日 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常会。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一）北京总会》：“十一月十三日北京总会的常会，会员邓仲瀛君新由四川回京，北京总会会务进行，又须详细讨论，遂定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二时在公（中）央公园开本月常会。是日到会者有邓仲瀛、黄日葵、苏甲荣、陈政、陈仲瑜、鄢祥禔、李守常、杨钟健八人。首先谈会务进行各事，议决照上次会务努力进行。邓君刻已回京，社会主义研究会不日即可成立。”（《少年中国》第3卷第5期，1921年12月1日）

11月14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二十三次总务委员会。

《本校纪事》：“第二十三次总务委员会议纪事 十一月十四日午后四时。出席委员：李大钊、余文灿、李辛白、沈士远。沈士远君主席。议案：一，法文系学生要求核减书价。议决：学校采购学生各种用书，均照原价发售。法文系学生所请未能照准。”（《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6日）

11月28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

《民国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二次评议会》：“顾孟余、陶孟和^{顾代}、谭熙鸿、贺之才^{谭代}、马裕藻、何育杰、夏元璜^{何育杰代}、王星拱、冯祖荀、沈士远、胡适、张大椿、俞同奎^{张大椿代}、朱锡龄、李大钊。

(一)校长交议新定研究所组织大纲案。议决：由本会公推三位整理此次校长提交之新定研究所组织大纲，并从前本会通过之研究所办法，然后提交本会议决。

整理前次通过之研究所办法，并校长提出之新定研究所组织大纲，改为四人，已推定顾孟渔、胡适之、马幼渔、谭仲逵。

(二)议决：未办研究所之各系，在该各系所设之学门研究所未成立以前，得斟酌需要设立研究室。

(三)陈校医变更校医室组织并预算意见书案。”(《评议会议事录》)

12月1日 在《晨报》上发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

12月8日 与北京大学教职员临时委员会三委员共同发出通告，召开全体教职员谈话会。

“本校教职员诸君公鉴：敬启者，本校教职员会推出之临时委员会，自经大多数委员相继宣告辞职后，几于无形消灭，对内对外均无从负责，现在教育经费又生问题，若不将此若有若无之临时委员会告一结束，恐致有误进行。兹定于本月十日(星期六)下午二时，在第二院大讲堂开本校全体教职员谈话会，俾弟等得以报告经过之情形，而诸先生亦得以讨论善后之办法，事关公共，敬希蒞临。王绍瀛、周象贤、王星拱、李大钊全启。”(《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2月8日)

12月14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

《第三次评议会》：“沈士远、朱锡龄、张大椿锡龄代、马裕藻、何育杰、俞同奎、冯祖荀、谭熙鸿、陶孟和李守常代、贺之才谭仲逵代、李守常、王星拱。”

“（一）陈校医变更校〔医〕室并预算意签案。”

“（二）新定研究所组织大纲案。”

“（三）谭仲逵先生提议‘在研究所担任指导之教员皆为名誉的及义务的’案。”

“（四）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案。”（《评议会议事录》）

12月15日 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的讲演。十六、十七日连载。

12月22日 在北京大学作《工人的国际运动》讲演。

《政治学系教授会启事》：“本星期四上午九时至十二时之现代政治讲题为《工人的国际运动》，由李大钊先生担任，在第一院第三教室讲演。特布。”（《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2月21日）

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二年(中华民国十一年) 三十三岁

1月8日 《晨报》副刊发表李大钊在北京孔德学校的讲演,题为《今与古》。文章批驳了“今不如昔”的说法,认为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指出“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

1月18日 所写《现代的女权运动》在《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5期发表。文章强调:“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一致的行动。”

1月24日 出席北京大学总务委员会临时会议。

《总务委员会临时会议纪事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出席委员:沈士远、李辛白、李大钊、余文灿。

议案:提议以后本校聘用书记,用公开招考办法,由聘用机关将该员职务(注明每日办公时间)、报酬、资格、程度各项登本校日刊徵聘之。

议决:通过。请校长复核批示遵行。”(《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1日)

1月30日 在《学艺》第3卷第8期发表《论自杀》一文。

2月4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部主任通

告》：“本部招用书记一名，曾经登布日刊，现在报名者已有多人，望即于二月六日下午二时至四时，来本校图书主任室面试。此白。”

2月8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主任通告》：“本部招用书记，承诸君来馆面谈，不胜感谢。现已聘定前在本馆服务甚久之卢遇庚君，以资熟手。其余诸位俟后有相需之处，再为函聘可也。”

2月9日 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继续讲《工人的国际运动》。

《政治学系教授会启事》：“本星期四之现代政治，由李守常先生继续讲演《工人的国际运动》，时间和地点均照旧（上午九至十一、第一院第三教室）。”（《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8日）

2月11日 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出席北京大学第五次评议会。

《校长布告》：“本届评议会第五次会议（十一年二月十一日）议决案应行公布者如左：”“（五）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

所长（当然委员长）

教务长、本门主任、图书主任（均当然委员）

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15日）

《第五次会议。民国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出席委员：蔡元培、张大椿、沈士远、马裕藻、朱锡龄、夏元璠、俞同奎、王星拱、贺之才、冯祖荀、李大钊、顾孟余、何育杰、陈世璋。

（一）主席提出职员待遇法案。议决：先付油印交各委员审

阅后限于一星期内发表意见，两星期后再开临时会讨论议决。

(二) 主席提出教员保障法案。”(《评议会议事录》)

2月12日 出席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

《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北大同学新闻记者同志会，系由该校教职员及已毕业或未毕业学生从事于新闻界者所组织。十二日上午在该校第二院大讲堂开成立大会，来宾方面到者有胡适、徐宝璜、李大钊诸教授。由众公推黄右昌主席，当报告开会宗旨及筹备经过。次由徐宝璜、胡适、李大钊演说(见后)，再次会员黄右昌、徐一尘、张煊演说。随通过简章，选举职员。”(《晨报》，1922年2月14日)

2月18日 出席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事》十一、二、十八。

“委员长：蔡元培。

委员：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一、报告：(1)特别阅览室设立之经过。”“(2)歌谣研究会。”“(3)考古学研究室。”“二、提议：(1)研究规则。”“(2)奖学金。”“(3)杂志。”“(4)研究员用纸问题。”(《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27日)

2月19日 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一次公开讲演会上讲《马克思经济学说》。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五)》：“本会开第一次公开讲演会，不论会员或非会员皆欢迎自由来听。

讲演人：李守常先生。

题目：马克思经济学说。

地点：北大第二院大讲堂。

时间：本月十九日(星期日)下午一时起。”(《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17日)

2月21日—23日 《晨报》发表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的讲演。讲演中介绍和分析了剩余价值学说，论述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原理。讲演中指出：“‘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社会主义’到了她羽毛丰满的时候，自然也非打破资本主义不可。鸡子打破他的卵壳，‘社会主义’去打破资本主义，这都是‘革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讲演还提到：“近几年来，劳动界的势力渐渐地大起来。英国共产党已经受了‘第三国际大会’的命令，而加入国内的劳动党。世界的劳动者，现在差不多渐渐地都联合起来。他们的势力一天巩固一天，革命的时期也一天逼近一天。这完全是受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在中国，有现在的这种情形，也不能不说这是马克思的影响。”因此，讲演最后表示，盼望有更多的人研究马克思的学说。

2月25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

《第六次会议。民国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到会委员：蔡元培、沈士远、陈世璋、贺之才、何育杰、谭熙鸿、胡适、马裕藻、顾孟余、王星拱、陶孟和、夏元璠何代、李大钊。

(一) 主席报告：仪器主任改聘李盛章先生等担任。蒋梦麟先生在美为本校图书馆募捐，延续假期及现请谭仲逵先生代理总长案。议决：通过。

(二) 沈士远、陈世璋君提议,限制职员在校兼职案。

(三) 主席交议执行本校教授在校外非教育机关兼职,及在他校兼任重要职务者,应改讲师之手续案。”(《评议会议事录》)

2月27日 参加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

《总务处启事》:“兹收到俄国灾荒赈济会捐册,嘱为代募。特复印数十份分置本校各办公机关,敬请诸位先生慷慨捐输。无论多少,务希在本星期内填写以便汇齐,将来即由会计课于发薪时扣付,如直接送到总务处者当即给予正式收据。二月二十七日。”

“来函如下:敬启者,现在俄国窝瓦河两岸,有一千五百英里大的地方,因早成灾,看着就要饿死的人三、四千万。”“所以同人等也发起了一个救济俄灾的团体,名曰俄国灾荒赈济会。”

“本会董事长:熊希龄。

彭君颐、伊里春、彭泽湘、杨寿镛、陈洪深、彭树棠、张庸池、李大钊、王冷斋、陆少游”(《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28日)

3月1日 出席北京大学总务委员会议。

《校务纪闻》:“第二十九次总务委员会议(三月一日下午四时)

出席委员:谭熙鸿、沈士远、余文灿、李辛白、李大钊、李麟玉谭代。谭君熙鸿主席。

议案:一,积欠学费之学生中,有因经济困难日前新旧学费均无力缴纳,要求学校特别通融准暂缓缴案。”“二,学生要求本校与各学校交换讲义案。”(《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3月4日)

3月5日 在《新生活》第55期上发表《胶济铁路略史》。

3月8日 约陆侃如谈话。

《图书主任启事》：“陆侃如君鉴：有事须面谈，望于本日（3月8日）下午四点钟至五点钟间来第一院图书主任室一谈。”（《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3月8日）

3月9日 致电白坚武，介绍陈独秀与白接洽。

《白坚武日记》：“九日 寄李倬章快函。晚，李守常自京来电，有要事相托，已托陈仲甫来接洽。”

3月13日 与北京大学出席北京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王星拱等，发出紧要通告，传达联席会议决议案。

《紧要通告》：“后者，交部对于教育经费，延不拨付，现已积欠将及三月。而财部对于阁议议决‘俟关税实际值百抽五时，每月加拨八校经费十万元’一案，又行推翻。联席会议遂于本月十日开会讨论办法，议决决案两项及提案一项如下：”

“提案一项，（一）要求政府将两个月又七成之积欠，于三月十五以前扫数拨清。若无圆满结果，则教职员对于学校不负责。右项提案，由出席代表各回本校开全体大会。徵求同人意见，方能取决。”“联席会议本校代表李大钊、王星拱、王绍瀛、周象贤同启。”（《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3月13日）

3月17日 为陈德荣事，致函沈士远。全文如下：“士远先生：陈德荣君事，弟探询之结果，不得要领。我想由校出一保呈，亦无何妨。他们盼望很切。乞即属文牍处拟稿如何。”

3月21日 出席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学生助学金与奖学金问题。

《北大对学生之补助与奖励·设助学金及奖学金》：“日前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在北大开第二次会议，出席者为委员长

蔡元培，委员顾孟余、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立(玄)同、周作人诸人，讨论奖学金及助学金草章。”（《晨报》，1922年3月21日）

3月23—25日 在《晨报》副刊上发表2月5日写的《黄庞流血记》。文中说：“我们的目的，在废除人类间的阶级，在灭绝人类间的僭擅。但能达到这个目的，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2—3月 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的辩论会作总结。

朱务善《回忆守常同志》：“有一次，我们在北大开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这次辩论延长数日之久，参加的人都是北京各大学各专门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守常同志被邀请为辩论会的评判员。在辩论会上发言非常踊跃，争辩激烈。最后听众都想听一听当代马克思主义专家的意见，一时满场俱寂。守常同志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手里拿着一页笔记大纲，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解答问题。守常同志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正如封建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必然性，非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守常同志在这次辩论会上的结论，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增加的会员达数十人之多。”（《人民日报》，1957年4月29日）

4月1日 在《晨报》上发表《失恋与结婚自由》。

4月2日 所写《致晨报记者函》，在《晨报》上发表。

4月9日 在日文《北京周报》第12号上发表《宗教妨碍

进步》一文，指出：“宗教是向人宣传廉价的妥协性，它妨碍彻底探求真理的精神，对人类进步是非常有害的，因而我们才竭力加以反对。”是日，李大钊出席非宗教同盟第一次大会并发表演说。

《昨日非宗教同盟第一次大会》：“昨（九号）日下午一时起至五时止，该同盟又召集同志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开讲演大会，到会者中外合计约千余人。首由主席肖子昇报告开会”，“蔡子民因足疾不能站立演说，遂由肖子昇代读蔡子民之演说词（见后），又次由主席一一介绍张耀翔、李石曾、李守常、吴又陵诸人出席演说。”（《晨报》，1922年4月10日）

4月12日 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捐赠《国风报》五十二册。

《图书馆登录室第三部布告》：“李大钊先生惠赠国风报五十二册。”（《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4月12日）

4月14日 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捐赠《革命军》一册。

《图书馆登录室第三部布告》：“李守常先生惠赠革命军一册。”（《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4月14日）

4月16日 白坚武接李大钊来信。

《白坚武日记》：“十六日 接李守常一函。孙佩章一函。收张则民寄来书品。”

4月26日 和王绍瀛等发表启事，提出辞去北京大学出席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的职务。

《王绍瀛等启事》：“敬启者，弟等出席八校教职员联席会，原系由于本校教职员代表临时委员会之委托，嗣后委员会多数委员相继辞职，委员会久已无形消灭。是弟等出席代表之资格久已不存，惟以本校教职员大会虽曾开会数次拟改选代

表，而到会者总未能达到法定人数，在此期间对外对内苦无接洽机关，弟等只得权负此责。今弟等既依八校联席会议之议决，辞去代表之名义及职任，断无再行滥竽之理，是以再次声明，敬请同人速开大会，改选代表出席联席会，以免贻误会务，是为至要，谨启。王星拱、王绍瀛、李大钊、周象贤同启。”（《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4月26日）

5月1日 出席高师工学会、北京大学马克思研究会及北京学生联合会三团体共同举行的“五一”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同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李大钊的《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

《昨日三团体之五一纪念大会》：“高师工学会、北大马克思研究会、北京学生联合会三团体，共同于昨日午后二时许，在高师举行五一纪念大会。到会者五百余人，首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及个人感想。随请李大钊演说，其大意可分二段。（一）五一运动历史概略，先述五一纪念由来及美国五一运动经过，次述大陆方面法、德诸国对于五一运动的表示，及远东日本、中国近来亦极重视，末述俄国劳农政府纪念五一之特色。（二）工学主义与五一纪念，劳动乃愉快的非痛苦的，自由的非强迫的，学界人士以求学之暇，从事作工，乃尊重劳动之表示，工人以作工之暇，从事学问，乃人类应享权利，工学打成一片，乃为人类极轨。次阐发八小时工作及八小时教育之原理及其利益，极为痛快淋漓。次由高一涵演说”，“又闻该会尚请有陈启修及长辛店工友代表演说，后陈以大学救护团事务，未能脱身。长辛店工人代表，则以战事关系，仅请假三小时，会未开毕，即仓卒回去。又高师工学会工学杂志特刊五一

纪念号，说明纪念原因及其价值甚详，而马克思研究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亦各印有传单在会场内散布云。”（《晨报》，1922年5月2日）

5月4日 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举行的五四第三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

《昨日之五四纪念大会》：“昨日午后二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在高等师范风雨操场举行五四第三周年纪念，到会者千余人。先由徐世贤报告开会大意，继由平校学生唱国歌，五四纪念歌。随请来宾李石曾、李大钊、邓萃英、张鼎乾相继演说。最后尚有平民学校学生演说，时已四时，遂宣告散会。”（《晨报》，1922年5月5日）

5月5日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行马克思诞生百又四周纪念大会。请李大钊等莅会并发表讲演。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五月五日（星期五）是马克思诞生百又四周纪念日，本会定于是日下午一时，在北大第三院（北河沿）大堂举行纪念大会，并请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高一涵诸先生讲演。此会系公开性质，无论何人均一律欢迎。特此谨告。”（《晨报》，1922年5月2日）

5月6日 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马克思与第一国际》。

5月10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三十次总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次总务委员会会议。五月十日下午四时半》：

出席委员：李麟玉、李大钊、李辛白、余文灿、沈士远。

“沈君士远主席。

议决案：

一、本期学宿费未交者，限本星期内交清。届期尚不交

者，即作为休学论，不得应本届学年考试或学科考试。

二、所有旧欠学宿费各生，统限暑假前清交。

三、本届毕业生学宿费未交清者，不得请领修业证书及洋文成绩证书。

四、本科各班实行恢复点名。”（《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5月11日）

5月11日 白坚武请吴佩孚聘李大钊等为顾问。

《白坚武日记》：“十一日 辰到保定，寓督署光园，沐于德润池。寄函询家中有无扰乱。并函申江友人告以吴公决心恢复法统。请吴子玉将军聘李大钊、王试功、万鸿图、张书元、张则民诸君为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

5月12日 与胡适等在蔡元培家开会，讨论《我们的主张》。

《胡适日记》：“五月十二日 七时，打电话与蔡先生，借他的家里开会，讨论《我们的主张》。其余各人，也在电话上约定十一时相见。”“十一时，在蔡宅开会，到者：梁漱溟、李守常、孟和、孟余、汤尔和、徐伯轩（未约他，偶相值）、经农等。他们都赞成了，都列名做提议人。

蔡先生留我们吃饭，饭后他们都散了。我独与蔡先生闲谈。三时，王亮畴、罗君任也来，他们略有讨论，修改了几处，也都列名。连知行、在君、王伯秋、文伯和我，共十五人。

下午，孟余自行取消，加入一涵、慰慈，共十六人。”

5月13日 同蔡元培、胡适等联合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评、讨论，或赞助。

(一) 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二) ‘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以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我们很诚恳的提出,很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的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宣传。

十一,五,十三。

提议人	职 业
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知行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懋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 徵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 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

5月22日 介绍俄人霍德罗夫与吴佩孚、白坚武会见。

《白坚武日记》：“二十二日 请吴将军聘张英华充财政高等顾问。俄人霍德罗夫来保定谒吴公，并以李守常之介绍同余作主义上深谈，余答话分三段：一新主义之结合，一新政治之趋势，一远东问题。渠聆余言表十分满意，谓入中国来第一伟论，与余订交殷殷握别，其译员薛撼岳亦美材也。”

5月 通过高恩洪的关系，向京汉、京奉等六条铁路，派遣六名共产党员^①任密查员，开展工人运动。

《铁路罢工潮》：“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直胜奉败，交通系内阁随之倒台，代之而起的为直系军阀，吴佩孚御用内阁，于是交通系的职工教育计划未能实现。吴佩孚新胜之余，收买人心，通电发表四大政治主张，其中一项便是‘保护劳工’。吴佩孚知道交通系在铁路上有长远的势力，同时又知道共产党在铁路上有新兴势力，于是他就企图利用共产党铲除交通系。共产党当时北京党部明知道吴佩孚的利用，然而亦乐得相互利

^① 当时派出的六名共产党员是：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何孟雄、包惠僧、袁子贞。

用一下，因为在铲除交通系这一点上对于工人阶级是有利的。经过李守常同志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密查员（守常同志荐去的共产党员）。”“这六个密查员，当然不对任何人宣布，实际上即是职工运动特派员，主要的是在各路工人群众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对于交通部则选择某地为工人所最痛恨的交通系的职员，臚列其营私舞弊的罪状，作成报告送去。再则这六个密查员对交通部虽是有固定的人名，但出发各路可换别的同志，真的，这样一来，我们在铁路上的工作得到顺利的发展，差不多六条铁路都建立了相当的基础，特别是京汉铁路沿路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计十六个之多。”（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8—29页）

6月7日 去保定会见吴佩孚。

《白坚武日记》：“七日 李守常来接谈两日，为吴公赞助。万仞千来，昨即回申。”

6月15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李大钊放弃支持“好人政府”的主张。

张国焘《我的回忆》：“这年六月初，北京政局的变化表面化了。六月二日徐世昌通电下野，黎元洪主张以废督裁兵为其复职的条件；尤以好人政府的宣传，获得一般舆论的支持。李大钊先生致函我们，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在党外的朋友们，也直接间接表示希望中共对好人政府的主张予以支持。这就使中共中央觉得应根据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制定的方针，联系

中国目前局势的发展，从速发表一个对时局的主张。”“这个文件于六月十日通过之后，我即于六月中旬被派往北京。我的使命是与李大钊等同志谋得政治上的协调。我携带了一卷中共对时局主张的印刷品，交给李先生，向他说明原委并与之商讨。他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并说前些时候他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所以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

《第八次会议。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出席会员：胡适、沈士远、朱锡龄、马裕藻、顾孟余、陈世璋、贺之才、谭熙鸿、李大钊、何育杰、陶孟和、冯汉升、王星拱。

（一）提议孔德学校借用第三院一部分，作为该校工舍。议决：通过。但须将原图稍加修改。

（二）提议修正考试制度案。议决：通过。

（三）提议修正学生在校肄业年限案。议决：缓议。

（四）预科委员会权限案。”

“（五）体育委员会案。”

“（六）设立医务部案。”

“（七）化学实验征收保证金案。”

“（八）贺之才教授请假案。”

“（九）宋春觞教授请回复教授权利案。”

“（十）辞退组伦、柴春霖、陈怀、周龙光等教授案。”（《评议会议事录》）

6月18日 被选为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常务干事。

《昨日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开会，讨论进行方法》：“北京非宗教大同盟自前次开成立大会以后，继开临时大会一次，通过

章程，并推举汪精卫、蔡元培等三十余人为干事。昨日（星期日）上午八时，该同盟各干事假北大第三院开第一次干事会议，选举常务干事，讨论以后进行方法。到会者共计二十余人，当选举肖子昇、李石曾、朱务善、张耀翔、李守常、韦玉、范鸿劼及缪伯英女士等八人为常务干事。继讨论以后进行方法，结果略分（一）召集全国非宗教团体开总同盟大会。（二）办月刊。（三）举行定期讲演……五项，由常务干事办理之。该同盟还出有《非宗教论》论文一巨册，皆中外名人杰作，凡数十万言，廉价发售，该同盟即欲以之作为宣传之利器云。”（《晨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9日 约胡适等与孙丹林会见。

《胡适日记》：“六月十九日 上课。孙丹林（汉尘）来京，现暂就内务次长的事，他要和我们谈谈，故守常约我和子丈、石曾同他吃饭，此人是吴佩孚的诸葛亮；吴氏得有今日，大半是他的功劳。吴氏用兵确有天才；孙氏说他全是从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书得来，但变化应用却全是他的天才。他在政治上实在不过是一个婴孩，全靠孙氏及白愷亚的扶持。”

6月23日 与沈士远等联名著文介绍陈纬君。

《谭陈纬君夫人行状》：“前清季年，夫人尝与乃姊汪陈璧君夫人，偕作革命运动。在香港秘设机关部”，“民国四年冬，乃姊璧君夫人及姊丈汪精卫先生赴法，夫人亦同往游学，时年十九岁。夫人留法约五年，专习油画”，“二十一岁与吴县谭仲逵先生结婚于法国之波铎城，二十四岁偕仲逵归国”，“今年三月十七日以喉疾及猩红热症，痛故于京寓，时年二十六岁。”“沈士远、李大钊、蔡元培、李煜瀛、王世杰、肖友梅、李四光、丁燮林、

李麟玉、张竞生敬述。民国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6月24日)

6月29日 介绍肖静仁见吴佩孚访白坚武。

《白坚武日记》：“二十九日 胡龙骧、杜锡珪代表黄陂来慰问曹使。李守常介绍肖静仁来保，为荐孙馨远处威伦思克来保见吴，访余握谈。”

6月 介绍于树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于树德回忆“五四”前后在天津的一些情况》：“1922年6月，我由李大钊同志介绍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6月 《非宗教论》文集出版，内中收有李大钊的《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一文。

6月 与邓中夏等一起向即将于七月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大会提出《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的提案。提案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向，主张建立统一战线。提案说：“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也不相信不破坏这制度，加入军阀或官僚阶级中，即可将他改变过来，实现我们的主义。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个人，而是制度的本身。我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以实现民主主义。在这一点，我们基本上不信任北洋军阀可以改造中国。”“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学理，我们要加入前线，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这个提案发表在《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上。

7月1日 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上发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文中指出：“列宁氏虽称道平民政治，却极反

对议会政治。他以为议会制度纯是欺人的方法。此方法的妙处，在以人民代表美名之下，使此机关仅为晓舌的机关，为中产阶级装璜门面，而特权政治，则在内幕中施行。列宁氏以为欲救此弊，要在使代表机关不但为言论机关，并须为实行机关。无代表制度固无平民政治，而无议会制度则依然可行平民政治，而且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这样看来，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共产主义者另立一个名词，叫工人政治。“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时期。”

7月5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三十三次总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三次总务委员会会议记录。七月五日下午四时》：

“出席委员：谭熙鸿、李大钊、沈士远、李辛白、余文灿、胡春林(斋务课事务员)、黄世暉(会计课事务员)、周同焯(文牍课事务员)。

谭君熙鸿主席。

议决：

一、暑假期内，全校各机关公共办公时间，定为每日(除星期日外)上午九时至十二时。

二、下学年第一学期收费时，旧欠未清者，不收新费。

三、学生借有学校图书仪器未还者，凡毕业文凭、毕业证书、学年修业证书及洋文成绩证书，均不得给予。”(《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7月8日)

7月14日 为北京教育会研究编著部成员。白坚武托李

大钊、王晓云、胡适之等起草地方政治制度方案。

《白坚武日记》：“十四日 嘱薛憾岳草地方制度备研讨。余阅陈竟存所表示联省自治大纲内多可采，然不必联省始可得之，不求其实好立名目无当也。余并托王晓云、李守常、胡适之等多草方案。”

《北京教育会对于市之自治议决》：“日昨(十四日)北京教育会，开临时评议会，由会长顾孟余主席，报告本届开会，耑为讨论京都市自治问题。盖自治施行，于教育前途，关系甚大，亟宜由本会，组织研究编著，及执行两部，约集教界同人，共同办理。旋由张士铨、金庚绪、顾兆麟相继发言，对于主席提议，大体赞成，为详细之讨论。结果决定，研究编著部，定为高一涵、李大钊、赵毅、杨阴麟、燕召棠、杜国庠、陶孟和、陈启修、王道元九人。”(《京报》，1922年7月15日)

夏 参加宪法学会。

《〈宪法论丛〉发刊词》：“宪法学会之成立，在民国十一年夏。”

《宪法学会会员录》：“王侃^{辅宜} 王銮^{声中和} 王葆真^{卓山}
王试功^{筱云} 王吉言^{颺廷} 王双歧^{子邨} 王恺^{辅唐} 王锡泉^{卓甫}
王源瀚^{溱斋} 王敬芳^{博沙} 王文琳^{凝璞} 史泽咸^{刚峰} 李泰棻^{革痴}
李文熙^{寂安} 李庆芳^{芬圃} 李青峰^{采岩} 李大钊^{守常}”

8月初 应女权运动同盟会邀请，为该会讲演。

《女权运动同盟会启事》：“本会自本星期起特请王世杰、陈启修、谭仲达(遼)、李守常诸先生及本会会员孙继绪、陶玄、张天珪诸女士陆续讲演，凡热心女权问题者，均可莅会听讲。今谨将本星期演讲者介绍于左：讲演人：王世杰先生。讲题：女

权运动者之任务与方法。时期：八月三日(星期四)上午九钟。
地点：石驸马大街女高师。”(《晨报》，1922年8月1日)

8月1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

《第九次会议。八月一日》：“出席会员：马裕藻、沈士远、马裕藻、朱锡龄、陶孟和、顾孟余、谭熙鸿、陈世璋、李大钊、冯祖荀。

(一) 本校附设音乐传习所案。”

(二) 请陈惺农先生为组织委员会会长案。议决：通过。

(三) 叶志自费出洋请按例支薪案。议决：以已竟离校，碍难照准。

(四) 周二为先生保留教授案。议决：不能通融，仍照原议办理。

(五) 聘请巴台尔案。议决：通过，但每月薪俸不得过五百元。

(六) 国文系讲师单不广、刘毓盘改为教授，史学系讲师杨栋林、马衡改为教授，生物学系聘汤尔和为教授案。议决：通过。

(七) 财政公开案。”(《评议会议事录》)

8月13日 参加女权运动同盟会茶话会并发言。

《昨日女权运动同盟会招待报界学界》：“昨日(十三日)下午二时，女权运动同盟会，在石驸马大街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大礼堂开茶话会，招待北京报界学界。首由主席周敏女士宣告本日开会旨趣。”“最后北大教授李守常谓贵会进行，宜首先注意下列三项：(1)要求撤废治安警察法；(2)要求选举法中列入女子；(3)希望劳工保护法内加入女工保护之规定云云。”(《晨报》，1922年8月14日)

8月14日 在大陆饭店同孙丹林谈话。

《胡适日记》：“八月十四日 我想试作一个政治计划，预备今晚与孙丹林谈话的底子，写了一千多字，仅成（一）财政，（二）政治问题中的统一问题。正要谈到中央政局，有人来谈，就打断了。”

晚七时，到大陆饭店会着孙丹林。同坐者有子民，尔和，梦麟，守常。我们谈的都是很恳切的忠告。孙的态度很不好。他似乎还在那儿做‘武力统一’的迷梦。他说，吴佩孚大事不糊涂，他在几年前就说要和老段比一比，再和张作霖比一比；当时人都不很留意，后来果然都灵了。孙说时，颇得意；他又说‘要是我肯给子玉上条陈，只消两师兵直捣广州，什么事都没有了。’这句话使我们大生气。子民先生说，‘那么吴子玉也不过是一个军阀！’梦麟说，‘吴子玉何不先打过山海关看看！’说到后来，他的态度稍软下来了，也承认吴佩孚对于联省自治应该逐渐改变态度，不可没有一个退步。”

8月18日 请苏俄特使越飞吃饭。

《胡适日记》：“八月十八日 夜七时，守常请俄国新代表约佛（Yoffe）吃饭，同来的有莫斯科大学中国学者 Ivanoff，及参赞二人。陪客的有子民、孟和、石曾、梦麟。子丈有演说，我也演说了几句，约佛作答。”

8月19日 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国学》季刊编辑员。

《八月一日季刊编辑员讨论会议决之条件》：“（一）本校发行季刊四种：（1）自然科学，（2）社会科学，（3）国学，（4）文艺。均自本年八月起，每季出一本。”

“附录业已延订之编辑员名单如左(此后续订者补报)”
“社会科学组”“高一涵、张慰慈、李守常、顾孟余、马寅初”
“国学组”“钱玄同、蔡子民、顾孟余、李守常、刘叔雅、单不广。”(《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8月19日)

8月下旬 去上海、杭州参加中共中央在西湖举行的特别会议。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的联合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的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8月底 在上海与孙中山会晤，并加入国民党。

《狱中自述》：“于是，决心投入中国国民党。事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变避居上海，确期则不复忆矣），钊曾亲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中山先生与我等畅谈此问题巨数小时，当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钊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

9月3日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国际少年日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号召青年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篇演说登载在《学生杂志》第九卷第十一期上。

9月8日 去洛阳，会见白坚武。

《白坚武日记》：“八日 寄津函，叙鄂款事。李守常、李寂

庵、林素园来洛。李寂庵谈杨子惠二军及政府改革前途。守常自申江来，谈申江寓公近情回京。”

9月9日 与白坚武等参观元铁木耳坟。

《白坚武日记》：“九日 崔丽叔来函，介绍王延年医士，王亦旧识。守常及李晓沧约余同看元铁木耳坟，途中共谈南北政情，人事之短长得失大略。”

9月10日 与白坚武话别。

《白坚武日记》：“十日 电温佩珊，托向齐督为崔少将可亭询谋淮北缉私事是否同意，斯事余诚不愿问也。同李守常话别。”

9月11日 离洛阳回北京。

《白坚武日记》：“十一日 晨，李守常回京。杨柱黄昨晚自京来，今日去汉，久别略叙京中政情，非无办法，中枢无人可慨也。”

9月23日 接白坚武电。

《白坚武日记》：“二十三日 晨，早起沐浴。电李守常，托张则民事，嘱向王亮侑、罗文干说项。接张则民号电，马日北来。”

9月24日 与蔡元培等发表启事，为陈独秀募集讼费。

《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启者，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虽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纸版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有(自)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高君曼，北京希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

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胡适、邓仲懈、刘仁静、张国焘、

高尚德、李大钊、林素园、范鸿劼、黄日葵、蔡和森、缪伯英同启”(《晨报》，1922年9月24日)

10月4日 被国民裁兵运动大会各团体联席会议推定为讲演员。

《四十余团体参加裁兵大运动·

昨日开会推林长民为代表

讲演员十五人之题名录

游行路线已经警厅修改》:

“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昨日(四日)下午二时开各团体联席会议，出席者凡四十余团体，公推国民裁兵促进会林长民为代表。议决下列各案。(一)各团体自认归入何队”，“(丁)北队，北京大学，北队并已推定蔡元培为指挥。(三)推定讲演员，计推定蔡元培、李石曾、林长民、丁锦、马君武、张继、郭泰祺、王孝英、刘蘅静、周垣、张维镛、张耀曾、李大钊、胡适、陈炳瀛等十五人，其中丁锦已拟定讲题为欠饷问题。(四)规定办公时间为下午二时至四时。(五)经费问题。”(《京报》，1922年10月5日)

10月7日 与蔡元培、胡适等呼吁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开会讨论参加裁兵运动大会事。

“全校同人公鉴:

国庆日，北京学商各界为促进裁兵起见，举行群众运动，已指定本校为北队出发点，元培等希望全校同人加入北队。特于八日(星期日)午前十时，在第三院大礼堂开会讨论，届期务请

教职员诸君及学生诸君全体到会。

蔡元培、胡适、蒋梦麟、丁燮林、李煜瀛、
谭熙鸿、李四光、李大钊、颜任光、李麟玉、
王世杰、周览、沈士远、白雄远同启”(《北

京大学日刊》，1922年10月7日)

10月9日 与张溥泉、王励斋一起代表孙中山赴洛阳，会见吴佩孚。

《白坚武日记》：“九日 孙中山代表张溥泉及王励斋、李守常来洛。张与吴将军握谈颇欢洽。闽乱徐又铮出头，阴有蔓延之势。丽叔来函，告麟儿入学，并询祝平过洛情况。连晚与守常谈京况。”

10月10日 与白坚武等游洛阳关陵、龙门、香山寺。

《白坚武日记》：“十日 双十节，午后同张溥泉、王励斋、李守常、宋颺臣、项子和、陈东府、张竹桥、李参谋长倬章等游关陵、龙门、香山寺。登临尽日，夕阳归来。”

10月11日 由洛阳回北京。

《白坚武日记》：“十一日 偕吴巡使李参谋长，送张溥泉、王励斋、李守常、项子和至金谷园车站握别。”

10月14日 致函白坚武，述海参崴军械问题。

《白坚武日记》：“十四日 晨兴总不愿起，中年以后之像。李守常函述海参崴军械问题，此间已电外交部主办。施宜镇守使赵锦堂派副官吴毅斋来洛，询对付川局情概。昨过访送衣被等料。”

10月19日 随蔡元培校长辞职离校。

《意外扩张之北大内部风潮》：“北京大学生因要求废止征收讲义费，于前日拥至校长室大肆咆哮，且有种种不可理喻之

举动，而对于该校职员又肆口谩骂，并加恫吓。校长蔡元培鉴于如此蛮横之举动，竟出诸我国最高学府之北京大学学生，深为灰心。故昨日已向教育当局提出辞呈，态度极为坚决。而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部主任李守常，出版部主任李辛白等亦相率辞职。其余各职员则于昨日在第一院接待室召集会议，出席者六十余人，当即议决自十月十九日起，暂时停止办公。一面向校长辞职，一面照去年辞职时之办法，由全体职员轮流到校查看校舍，以备不虞。”（《京报》，1922年10月20日）

《李守常启事》：“鄙人已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此白。”（《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0月19日）

10月25日 随蔡元培回校复职。并在北京大学教职员学生全体大会上发表演说。

《北大风潮完全平息·昨日之全体大会》：“北大蔡校长因政府坚决退回辞呈，并大多数学生恳切之挽留，已于二十四号回校视事。日昨又在该校召集教职员学生全体大会，彼此推诚相见。首由蔡校长演说，大意谓少数人之精力有限，总希全校人员同心协力以进。”“次由李大钊教授演说，首述幼在天津北洋法政学校闹过‘酱油风潮之历史’，结果学生得胜，学校规则遂成具文。今次北大风潮不然，马上闹成，马上解决，不特校风未因此破坏，反可因此振作起来。并未谓北大两字，本旁观者对北京大学之缩称，吾校人员亦省而用之，外人即不免认吾校自称北大，带有骄气。其实此正北大之精神，盖吾校要研究各种学术，自然算大。希望同人以后都从大字上做去，发扬伟大的精神，实为吾校之幸云。此外尚有学生多人演说。”（晴

采)(《京报》，1922年10月26日)

10月31日 为北京大学政治、史学两系授《唯物史观》课。

《注册部布告(一)》：“李大钊先生所授政治、史学两系唯物史观本日上午上课。其社会主义史、社会立法两课，均稍缓再行授课。”(《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0月31日)

11月2日 当选为北京大学评议员。

《校长启事》：“本届本校评议员选举，已于昨日上午(下)午四时一刻在第二院大讲堂当众开票，计收到选举票共五十八张，兹记其结果如左：

谭熙鸿 四十二票、王星拱 四十二票、

胡适 四十一票、顾孟余 三十票、

李四光 二十九票、陶履恭 二十八票、

马裕藻 二十八票、陈启修 二十六票、

丁燮林 二十五票、李煜瀛 二十五票、

李大钊 二十四票、朱希祖 二十三票、

冯祖荀 二十三票，以上十三人当选。”(《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1月3日)

11月7日 担任北京各团体“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主席，并发表演说。晚出席苏俄代表越飞为纪念十月革命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同日，在《晨报》副刊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

《昨天的苏俄纪念会真热闹》：“北京各团体发起之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于昨日(七日)下午三时，假北大第三院开会，到会的共有三千多人，公推李大钊主席。先由主席讲演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于世界的影响，据他的观察，有四种好处：

(一)无产阶级专政。(二)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三)红军。(四)恐怖主义。后由程某唱第三国际的歌，又由北大的音乐队奏革命歌。继由陈启修讲演”，“后由李秦芬讲演十月革命史。其次由唐山工人代表，代表四万多劳苦工人向国人请命，要国人起来帮助他们。并谓他们被洋资本家压迫很厉害，竟至做工也要死，所以他们挺而走险，只求速死。当他演说时，会场的人，无不感动，掌声动天。后由长辛店工人代表(表)演说，略谓今日是苏俄革命底纪念日，苏俄是工人革命的大本营，是工人解放唯一的国家，我希望学生们要拿‘五四’的精神，来干革命的事业，使我们工人的国家早日成功。”“最后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演说，讲演少年共产党在世界做了的事情。后全堂起立，三呼苏俄万岁，三呼中国革命万岁。”(《晨报》，1922年11月8日)

《越飞招待各界代表志盛》：“本月七日为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日，越飞特于是晚八时，设宴招待参众两院议员、教育界、新闻界、劳动界，到会者有王家襄、吴莲伯、胡鄂公、蔡子民、李石曾、李大钊、孙几伊、孙剑秋、秦默晒、邓仲懈、毛一鸣等六十余人。越氏因病未能出席，由德夫金(Davtian)参赞致欢迎词。”“继由蔡子民演说，次由邓仲懈演说。继由李大钊演说，略谓三年前，俄国界致牒中国政府，表示种种让步，开外交上之新纪元。吾人值此革命五周年纪念日，应表示绝大谢忱。所应谢者并非其物质，乃其精神。故应暂致蒙古及中东路于不论，首先承认苏维埃俄国云云。”(《京报》，1922年11月9日)

11月15日 任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

《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会议记事》：“下月十七日为本校第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学校方面经校长酌请各部人员暨各教授，组织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十五日下午四时，在第一院接待室开第一次会议，其情形如下：

出席委员：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罗惠侨、丁燮林、沈兼士、沈士远、肖友梅、马衡、李大钊、谭熙鸿、苏甲荣、李四光。”（《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1月17日）

11月19日 出席北京学生的读书会并发表演说。被该会聘为导师。

《北京学生的读书会》：“前日（十九日）有北大、法专等校一部分学生，发起一学生读书会。午后二时半在中央公园董事会开会，讨论读书方法，到会者有五十余人。先由主席略述组织读书会之理由：（1）共感知识缺乏。（2）补助学校教育不及。述毕，即请李大钊、谭熙鸿等演说，李、谭对于学生此种组织，深表同情，且云，自身亦乐加入读书会之列云。”“李大钊、谭熙鸿、邓萃英等均被该会聘为导师云。”（《晨报》，1922年11月21日）

《前日读书会之成立会》：“李守常先生演说，大意谓在北京成立的团体很多，却向从来没有读书团体的组织。这会实是应着需要而成的，且这会宗旨以根据学理研究实际问题，则以前所谓主义与问题之争，也可由此会解决了。”（《京报》，1922年11月21日）

11月20日 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图书部主任通告》：“兹因本校图书部组织将有所变更，故须将所有图书清查一次。自星期一（十一月二十日）起，第一、二院典书课各阅览

室，暂停出借图书。其已借出者，均望于借书期满日归还，以资清理。一俟新组织确定后，再行照章出借。”

12月1日 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国际的资本主义下的中国》。

12月2日 辞去北京大学图书主任职。

《李守常启事》：“鄙人已辞图书主任职，本校同人如有关于图书部的事件，乞与图书主任皮皓白先生接洽可也。”（《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2日）

12月5日 任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

《校长办公室通告》：“现在校长室秘书职务已请李守常教授担任，定于本月五日起到室办公此布。”（《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5日）

12月7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一次特别会议。为北京大学第二平民学校捐款四元。

《十二月七日第一次特别会议》：“到会者：李大钊、顾孟余、马代、马裕藻、李四光、陈启修、冯祖荀丁代表、丁燮林、蔡元培、胡适、朱希祖、谭熙鸿、李煜瀛。

一，组织案三续。”

“二，预算案。”

“三，财务委员会组织案。”

“四，财务部办事纲目案。”

“五，自财务部成立之日起，原属于总务部之会计课应即改为出纳及统计两课，隶属于财务部案。”

“六，财务委员及财务主任名单。”

“七，整理图书案。”

“八，整理校舍事。”(《评议会议事录》)

《北大第二平民学校启事》：“去年春假左右，本校募捐，蒙北大及校外人士赞助，深为感谢！嗣因教育经费问题未曾解决，致捐款一时未能收齐，故迁延多日而未公布。兹将募款结果，按册分别宣布于后：”

“平字第七号(陈友揆经募)

杨适夷、何炳松各捐四元。朱希祖二元。王世钦、叶向荣各四角(以上已收到)。李大钊四元(约下月付)。张垢民二十枚(未收到)。”(《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7日)

12月8日 任北京大学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临时干事部招待股主任。

《本校第二十五年之成立纪念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时半》：“出席委员：马衡、钱稻孙、肖友梅、罗惠侨、沈兼士、沈士远、蒋梦麟、苏甲荣。

校长因事不能到会，托蒋总务长代理主席。

议决案：一，校长交下此次纪念会临时干事部各股干事名单。”

“招待股主任 李大钊。”(《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9日)

12月13日 代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出席北京大学第二平民学校周年纪念大会。

《北大第二平民学校启事》：“敬启者，日昨敝校周年纪念大会，蒙北大蔡校长代表李守常先生，及北大同学暨学生家长到会，济济跽跽，一时称盛，敝校同人，感荷无既！”(《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14日)

12月17日 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二十五周年，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文章中写道：“我们很欢欣的很高兴的纪念这本校成立的第二十五年。

在这纪念日，本校同人合力预备些游艺展览和讲演，固然是很有趣味的事，但我们自问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这固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筹备的，可是我们却不能不在这一日立下一个宏愿，从学术的发明上预备将来的伟大的纪念品。

远的将来且不论，明年的纪念日，如能有些学术上的纪念作品，使全国学术界都能得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纪念赠品，那就是本校的光荣了。

我以极诚挚的意思，祝本校学术上的发展。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

12月24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二次特别会议。

《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特别会议》：“到会者：马裕藻、朱希祖、顾孟余、陈启修、丁燮林、冯祖荀、王星拱、蔡元培、谭熙鸿、李大钊。

（一）以评议会名义答复陶先生请其仍任评议员。

（二）胡适之请假以次多数补充，用拈阄法选定何基鸿补充。

（三）改定王星拱为财务委员，徐宝璜为财务主任。

（四）改定沈士远为庶务委员会会长，马叙伦为庶务主任。

（五）组织委员会名单。”

“（六）本校辞退教授须经评议会通过，至新聘教授不必

经此手续。

(七) 议决：由组织委员会草拟评议会、行政会议与教务会议细则。

(八) 院务照料事。”

(《评议会议事录》)

12月29日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作题为《社会主义的将来》的讲演，并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社会问题与政治》。文章中提出妇女参政问题和劳工问题是社会上的两大问题，要解决它，“决非简单的平民团体所能办到，非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去解决他不可！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则能握到政权，先得到了政权，则可以徐图解决自身问题。换言之，第一步先运动参政权，参政权得到后，即可在议会上列席，得以建议和监视。一方面组织强有力的政团，解决一切社会上不平等的问题。”

《北大经济学会第六次公开讲演》：

“讲题 社会主义的将来

讲演者 李大钊先生

时间 本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下午四时半

地点 第三院大礼堂”(《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29日)

一 九 二 三 年

一九二三年(中华民国十二年) 三十四岁

1月11日 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讲授《印度问题》。

《政治学系教授会启事》：“本星期四(十一)之现代政治，请李守常先生担任，讲题为《印度问题》，时间由上午九点半起，至十一点半止，地点在第一院第四教室。”(《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月9日)

1月15日 出席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纪念德国共产主义者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殉难四周年召开之大会，并发表演说。

《昨日之李卜克内西特纪念会》：“昨日为德国马克思共产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特与卢森堡女士殉难之第四周年纪念，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在高师大礼堂举行纪念会。昨日下午二时，各界人士先后到会，首由主席报告开会，次由瞿秋白唱国际歌，次由主席报告李卜克内西特与卢森堡历史，次瞿秋白、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相继演说。三时余，始散会。又开会之时，分发若干纪念品云。”(《晨报》，1923年1月16日)

1月16日 在《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发表在北大经济学会的讲演，题为《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讲演介绍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经济组织的情况，并谈到有关夺取政权问题

的看法。讲演指出：“政权的夺取，有两种手段：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采取平和的手段的，大抵由宪法上、议会上着手。但是因为战争的影响，农民渐富，他们都不愿牺牲他们偶得的富裕，其他商人反动派及政府，均能与此运动以莫大的障碍，任你社会主义者如何宣传，终不能使选民及代议士都变成社会主义者，故此种运动常归于失败。有许多社会主义者鉴于平和的手段的失败，乃悟改造的事业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这种革命的运动，有失败的，有成功的。失败的如德奥是，成功的如苏俄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布尔扎维派的新发明，一八七五年马克思论Gotha Programme的信里说过：‘在资本主义者的社会与共产主义者的社会间，有一个由此入彼的革命的过渡时代。适应乎此，亦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当此时期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1月18日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十七日辞职。李大钊等评议员提议召开特别会议。

《特别会议》：“因校长辞职，由评议员王星拱、李大钊、朱希祖、马裕藻、谭熙鸿提议。

到会者：朱希祖、顾孟余、丁燮林、冯祖荀、陈启修、谭熙鸿、马裕藻、王星拱、何基鸿。陶孟和先生来函声明不出席，李石曾先生在西山不能出席。

（一）推举本日临时主席：公推顾孟余先生，通过。

（二）陈提议：推举委员三人，代表本会处理一切临时事务。议决：投票选举王星拱、陈星侓、马幼渔当选。

（三）王提议：请准陶孟和辞评议员，以次多数通过蒋梦

麟补充,应发信。

(四) 关于校长辞职案。”(《评议会议事录》)

1月19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二次特别会议。鄧公复由李大钊介绍到洛阳见白坚武。

《十二年元月十九日午后二时第二次特别会议》：“到会者：李大钊、谭熙鸿、朱希祖、蒋梦麟马代、丁燮林、李四光、冯祖荀、王星拱、陈启修、马裕藻。

(一) 本会推出席校务讨论会代表。”

“(二) 马提议：派代表慰问被伤学生。”

“(三) 丁提议，谭附议：对于本校学生被打事体，本校应如何经由法律手续办理，请何海秋先生先行研究报告本会。”(《评议会议事录》)

《白坚武日记》：“十九日 鄧公复以李守常、李寂庵之介绍，重来洛，余甚爱其材，惜军幕有人满之患，为介绍于农商部李印泉。复李守常函告衷曲。复李寂庵函答谢筹策大局盛意，并谢惠赠图章二方。”

1月24日 与王其新等商洽赴南洋中学任教。

《校长办公室启》：“王其新、王培椿、杨兴栋三君注意：南洋中学聘教员之川资，刻已汇到，请足下等于本日下午二时，亲到本室与秘书李守常先生商洽前往为要。”(《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月24日)

1月26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三次特别会议。

《元月二十六日午后四时半，第三次特别会议》：“到会者：马裕藻、陈启修、冯祖荀、王星拱、蒋梦麟、丁燮林、李煜瀛、谭熙鸿、何基鸿陈代、朱希祖、顾孟余、李大钊。

(一) 学生会要求本校寒假取消案。”(《评议会议事录》)

1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一书。该书共分八个小节，系统论述了平民主义。总结部分写道：“总结几句话，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平民的社会；在这样的平民的社会里，才有自由平等的个人。”

1月 应湖北教职员联合会的邀请，到武汉讲学。

罗章龙《回忆“二七”大罢工》：“在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区委会议上，守常同志提出：‘现在北大放寒假了，我应湖北教职员联合会的邀请，在寒假期间准备到武汉大学去讲学，北方区工作由文虎负责。’”(《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六辑)

2月2—4日 在湖北高等师范演讲进步的历史观。

《演讲日程·寒期讲演会最近规定》：“寒期演讲会，兹又规定二月一日午后一时半至二时半，由王抚五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环境改造之理论(第一讲)；午后三时至五时，由张仲琳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英法最近中、小学校之管理及教授方法；午后七时至八时，由王抚五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环境改造之理论(第二讲)；二月二日午前十时至十一时，由王抚五先生在高师讲演环境改造之理论(第三讲)；午前十一时至十二时，由

李守常先生在高师讲演进步的历史观(第一讲);午后一时至二时半,由朱希祖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文学上之中国人种观察(第一讲);午后三时至五时,由麦克乐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体育(第一讲);二月三日午前十时至十一时,由李守常先生在高师讲演进步的历史观(第二讲);午后一时至二时半,由朱希祖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中国文学之进化(第二讲);午后三时至五时,由麦克乐先生在中华大学讲演体育(第二讲);二月四日午前十时至十一时,由李守常先生在高等师范讲演进步的历史观(第三讲);午后一时至三时,由麦克乐先生在高师讲演体育(第三讲);午后四时至五时半,由朱希祖先生在高师讲演中国文学之进化(第三讲)。”(《江声日刊》421号,1923年2月3日)

2月4日 应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之请,讲演世界四种妇女运动之潮流及性质,并中国妇女运动进行之方法。

《李大钊君讲演女权运动》:“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昨日(星期六)下午七时至九时,特请李大钊先生在寒期演讲现在世界四种妇女运动之潮流及性质,并中国妇女运动进行之方法,由谢崇端女士介绍出席,听讲员一致鼓掌欢迎,李先生致词答谢毕,即演说谓所称四种妇女运动者:(一)宗教的,(二)母权的,(三)女权的,(四)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先将四种运动的性质说明于后。

宗教的妇女运动,类分妇女青年会,妇女救世军,及其他慈善性,或救济性的妇女运动之团体,皆在其列。此种运动,系鉴于现代社会上有种种不安宁或困难及痛苦之现象,特出而救济,为最有价值且为必要的一种运动。然亦有缺点,凡事必先固本,为此种运动者,只知于社会上有不安宁或困难及痛

苦之现象发生后，临时讲求救济之术，究竟所以发生不安宁或困难及痛苦之由来，则毫不过问，舍本逐末，必将有防之不胜其防之隐忧。

母权的妇女运动，在北欧极盛，以社会学者额列克里主张最力。其唯一原因，以为妇女在社会上应有一种特别权利，国家亦当为极充分之保护，盖女子为人类之母，于子女教育之责比较男子既格外加重，是故母权实为一种特别之权利。主张此说者，对于女权，极甚注意，与纯粹良妻贤母的主义，实不相同。

女权的妇女运动，为中流阶级的妇女运动，即资产阶级的女子，其居于社会的地位，虽亦有较男子为高者，但实际考查，仍不免有极不平等之现象。故必毅然突起，为两性平权之运动。

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对于那种阶级的差别，绝不过问，只求同阶级中之人类，俱得享有同等之权利，并不承认社会现象中有压迫与被压迫两种阶级之事实，极力主张无产阶级的妇女，应与男子同等加入人权运动团体中，换言之，其所主张者，确在男女两性都不处于压迫与被压迫之地位。(未完)明丙”(*《江声日刊》*423号,1923年2月5日)

2月5日 应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之请，继续讲演女权运动问题。

《李大钊君讲演女权运动》：“现在中国女权运动的团体(其后缺字——编者)一、女子参政同盟会，二、女权运动同盟会，就形式言，似无区别，如就实际上观察，前者似专注重在宪法上所享之权利，后者实包含母权、女权、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三项而言，其中组织的分子，以中产阶级者居多数，无产阶级比较为少。以中国现在妇女运动之情状看，不是

单独进行，可以完全收效的，须包含母权、女权及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联络一气，通力合作，方有效验。今姑从法律上归纳而言之，应改革者，如左之数种：(一)宪法上之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应平等。(二)民法上之亲权、财产权、行为权、及其他种种不平等之规定，俱应加以修正。(三)婚姻法也应该规定。(四)刑法上一方定有重婚罪，一方解释纳妾不为罪，大伤人道，极不平等，应修改。(五)买卖妇女在刑法上应厉禁。(六)同意年龄提高问题，在美奥各国女权运动史上考察起来，极为注重，今中国刑法，尚付缺如，应要求国家增定之。(七)行政法上为官吏之权，女子应不受限制。(八)女子应有同受教育之机会。(九)职业平等，亦为极属重要之问题，女子苟脱离家庭之拘束，欲求有经济独立之权，其第一步，则在有独立之职业，谋独立之生活。工作报酬之不平等，不尽中国然，美奥两国，前亦均有此等事实，如在学校为教员者，男子多而女子独少，其适例也。(十)此外一切男子之职业，女子可以参加者，均须有同等参加之权。女权运动之性质，既如上述，中国现在切须注重者，首宜结合最有实力之坚固团体，以为将来实际竞争之着手，譬如参政权，纵然宪法上有一纸空文之规定，苟无选举之实力，代议院中，未必就有女子参政之表现。吾甚希望各县都有此种女权运动的同盟，吾更希望此种团体有极坚固之结合，无论是女子参政同盟会，抑属女权运动同盟会，于社会上有公益团体之组织，须毅然加入，力尽其责，夫然后势力才能扩张。美国妇女运动之能全收实效者，第一优点，即能与男子同负社会之责任。欧战发生后，奥国女子，每当男子临战之际，凡国内有何公益团体之发生，必乘机参加，甚至驰赴临战

地境,救护伤军,对于国家所尽之责任既大,功劳既高,以故所得权利亦最高。总而言之,中国现当军阀专横之时代,欲为民权的运动,无论那种团体,都须联络一致。宗教的、母权的、女权的、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可合而不可分,可聚而不可散,可通力合作,而不可独立门户。能如是方能打倒军阀,澄清政治,恢复民权,能如是则今之为女权运动者,始得曰成功。明丙”(《江声日刊》424号,1923年2月6日)

2月7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吴佩孚镇压。李大钊与李汉俊等分析“二七”惨案的经过。

朱务善《回忆守常同志》:“一九二三年二月初,因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事,我以北京学生代表名义到武汉。在这里我通过陈潭秋、夏之栩诸同志的关系,找到了守常同志。此时守常同志在武汉各大学讲演唯物史观。”“随后我们也参加了守常同志和李汉俊同志的谈话。我们详细分析了‘二七’事件的经过,守常同志很愤慨地说:‘我们早就认定了吴佩孚和中国其他军阀完全一样,我们从前接受了白坚武(吴佩孚的政治顾问、守常的老同学)的意见,派我们的同志到各铁路上参加工作,并不相信吴佩孚的什么保护劳工政策’”。(《人民日报》,1957年4月29日)

2月 “二七”惨案后,由武汉抵上海。

张国焘《我的回忆》:“李大钊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险,由北京来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乡孙洪伊家里”。“那时孙洪伊和直系军阀之间,关系仍极密切。”“李大钊先生觉得他住在孙家,易于引起人们对他与直系仍保持接触的误会,因而不两天他就搬离了孙家,以示决绝。”

2月 所写《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一文刊载于《申报之最近五十年》上。

2月 在《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号上发表《“今”与“古”》一文。

3月9日 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临时委员会值日委员。

“本校教职员临时委员诸先生大鉴：

本会于三月一号常会议决：废止每日下午四时开会一次之办法，改为每星期四下午四时开常会一次（地点仍在第一院教务长室），其余时间，由各委员分班到本会办事处值日。谨此通知。并将所拟分值表抄录如下。务请

诸位先生按时蒞临为禱
顺颂
学祺

国立北京大学教职员临时
委员会谨启

临时委员会委员值日表（星期停止值日）”

“三月九日，星期五，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半，杜守素、李守常、周俊甫”（《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3月3日）

3月12日 在《时事新报》上发表《马克思经济学说》。

3月 参加“世界周刊”社。

《吴虞日记》：“三月十四日

谭仲逵交来‘世界周刊’社员名单一纸。文元模、潘大道、李书华、屠正叔、陈心农、李翼廷、吴又陵、陈百年、王宏实、马夷初、谭仲逵、李守常、周鲠生、唐有壬、杨适夷、何海秋、王雪艇、周建侯。凡十八人。”

3月26日 北京大学史学系改选系主任，李大钊得一

票。

《评议会布告》：“本年改选各系主任，已于本月二十六日举行。改选结果，兹公布于下：”“史学系 朱希祖 五票（当选）……李大钊 一票”（《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3月27日）

4月17日 在《新民意报》副刊《星火》上发表在复旦大学的讲演稿《史学与哲学》。

4月18日 在《向导》第21期上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指出“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找寻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树起旗帜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都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

4月 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评议员。

《执行部通告》：“本届评议员选举票，兹已收到半数，开票结果如下：

左舜生 三十三票、苏甲荣 三十一票、
李大钊 二十一票、陈 政 十八票、
邓仲澥 十七票、 杨钟健 十六票、
陈启天 十四票。

以上七人当选为本届评议员。”（《少年中国》第4卷第2期，1923年4月）

5月1日 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工人国际运动略史》。

5月4日 参加北京学生联合会为纪念“五四”举行的群众大会，并发表演说。

《昨日之五四纪念大会》：“昨日（四日）为‘五四纪念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特在石驸马大街女子高等师范开会，各校学生共到一千余人，公推韩觉民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略谓今日为学界爱国运动最大表示之一纪念，从前我们运动之口号，是‘外保国权，内除国贼’。今日之政府，一天糟似一天，我们应有继续之精神，作政治之运动。”“次由李守常演说，谓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也是学生整顿政风的纪念日。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民国到现在十有余年，革命事业，还未成功，这些继续革命事业的人，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做这种事业，必须抱定目的和宗旨。以现在学生应该做的事有二种：（一）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二）对现政局立于弹劾的地位。因为我们先组织民众，是不行的，他们是破坏我们组织民众的事业。望学生对于以上二事努力去做，则将来自有极大之效果云云。次众人发言，谓学生自五四以后，完全为空炮的运动，今日欲贯彻目的，须对于与曹、陆有同等罪恶之彭允彝，下一总攻击，非实行驱逐他不可。全场鼓掌之声如雷，群呼‘到彭允彝家里去赶他！’主席以此动议付表决，全体起立，一致通过。决定以出席学生联合会代表为临时代表，分为二队，一队约一千五百余人，到彭允彝私宅，一队约六百余人，到教育部，双方觅彭，必使其不得漏网。午后四时十分，由女高师出发，成二大纵队，秩序非常整齐。”（《晨报》，1923年5月5日）

5月9日 所授之唯物史观课照常授课。

《注册部布告》：“李大钊先生刻已来校，所授唯物史观，本

星期起照常授课。”(《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5月9日)

5月17日 在日文《北京周报》上发表《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一文，指出：“为了要进行举国上下的根本改造，光靠打倒军阀、埋葬政客这种表面上堂皇的口号，那是很不可靠的事情，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造，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有其中心不可，我们首先要创造出作为中心的东西。”“我看到的就是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除了使它更大更有力以外，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现在的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然而这个团体有容纳我们想法的拥抱力，而且孙文氏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之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从而使该党形成更加有力的团体”。

5月28日 为南昌心远大学捐献十元。

《公告》：“又蒙

李大钊先生认捐十元

一并鸣谢。

附注：此款与前次所收之款（共计三百〇五元）一并请黄幼轩先生直接汇寄南昌心远大学熊纯如先生收。

心远大学募捐经募人

李峇华敬启”

(《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5月28日)

夏 应孙中山之邀赴广州，与孙商议外交政策。

《狱中自述》：“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商议外交政策。”

6月中旬 参加关于召开党的“三大”的预备会。

罗章龙《回忆蔡和森同志》：“一九二三年六月中旬，中共

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前，还开了两天预备会。先后在陈独秀的寓所太平沙看云楼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所春园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人有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蔡和森、毛泽东和我等人。这个会主要是讨论政治路线，分工起草各个决议案，以及拟定中央委员的人选问题。”（《回忆蔡和森》，第59页）

6月12—20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第三届大会选举：独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泽东（34），朱少连（32），平山（30），项英（27），章龙（25）。候补：邓培，张连光，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176页）

7月16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二十次特别会议。

《七月十六日第二十次特别会议》：“到会者：李煜瀛、谭熙鸿、何基鸿、马裕藻、蒋梦麟代签、李大钊、陈启修。

（一）蔡先生承认完全负校长责任，复函并关于请蒋先生代表个人来电事。”

“（二）何基鸿教授请假一年，自费赴德留学。”

“（三）教育基金委员会请评议会代表蔡先生出席事。”（《评议会议事录》）

7月28日 访陈莘农，晤吴虞等。

《吴虞日记》：“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大晴 十一时，同少荆过陈莘农。到者有王宏实、李守常、何海秋。”

8月4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二十一次特别会议。

《八月四日第二十一次特别会议》：“到会者：李大钊、王星

拱、陈启修、蒋梦麟、马裕藻、谭熙鸿、冯汉叔^{谭代}、何基鸿。

(一) 代理校长发表事。议决：即日发表。

(二) 女子高师附设补习学校，请求继续补助费事：议决：不继续。”(《评议会议事录》)

8月 在《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4号上发表《桑西门的历史观》一文。

9月6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二十二次评议会会议。

《九月六日第二十二次会议》：“到者：朱希祖、冯祖荀、李煜瀛、李大钊、顾孟余、马裕藻、蒋梦麟、何基鸿、谭熙鸿。

(一) 预科委员会事。”

“(二) 蔡先生校长薪水事。蔡先生来函，不愿支校长薪。议决：蔡先生仍支校长原薪，蒋先生仍支教授原薪，蒋先生代理校长之校长办公费，经蔡先生之要求，由校长薪中开支，前议决案取消。”(《评议会议事录》)

9月7日 写信给胡适。信中说：“前者路过上海，曾往西友寓所访兄，以已去杭未遇。尊恙已痊愈否？念：蔡和森君所著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世界丛书内可否纳入？和森很穷，专待此以为糊口，务望吾兄玉成之。如何？盼你赐覆。校中已决于九月十日举行开学礼，但上课恐须至下月了。”

9月8日 与蒋梦麟等五十余北京大学教授，定于九日欢迎苏俄代表加拉罕。

《北大教授欢迎加拉罕》：“苏俄代表加拉罕氏，自抵京后，颇受各界欢迎。连日各界均设宴招待。顷闻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等五十余人，亦定于明日(星期日)下午，在校内欢迎加氏。藉与交换意见，以团结中俄交谊。并闻教育界方面意见，

多以为俄国自纷乱后，中俄关系完全断绝，拳乱赔款，连带停付。政府曾以该款之大部分，抵押借款，小部分尚不明用于何途。今后之趋势，中俄将行恢复交谊，而一切关系，多须旧事重提，但该项赔款，当然可望退回，此后退回之用途，国人须加以注意，用诸于教育实业，庶为适当云。并闻此种意见，将于明日宴集时提及云。”（《晨报》，1923年9月8日）

9月16日 在日文《北京周报》第80号上发表《中日俄三国关系日益接近》一文。

9月29日 《北京大学日刊》公布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第四学年史学思想史课程。

《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二年至十三年度)》:

课程 第四学年

“史学思想史 3 李大钊”(《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9月29日)

9月 写信给胡适。信中说：“前谈和森君所编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已由和森将所取材之书列成一表，现在把他同原稿送交先生，如能收入‘世界丛书’，即希示复，以便转达和森。”

9月 赞成少年中国学会总会移往南京。

《会员通讯》:

“演存、守常、仲瑜三兄:

少中学会于本月十四日，集合宁沪两地会员开联席会议于苏州留园，到会者有邓仲澂、杨贤江、涂九衢、恽代英、蒋锡昌、陈启天、李儒勉、恽震、左舜生、曹乌、刘仁静、梁绍文、倪文宙、杨钟健、常道直、沈昌、杨效春十七人，感于会务有竭力发

展之必要，已一致决议将总会地点移至南京，并由弟等以评议部名义与以同意。此项决议之唯一动机，系因北京会员太少，且各以事牵，不能过问会务，不速谋补救，会务或将中辍。此种情形，为兄等所深悉，如荷一致赞成，请即签名此函，并转告执行部，将会中各种文件及其他手续，于一星期内移交南京分会。 此颂

近安 恽代英、邓仲澍、左舜生、陈启天 十月十六日

（按此函已由苏甲荣、李大钊、陈政三人签名赞成，总会不日即移南京。）”（《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

9月 教育、帮助包惠僧服从党中央调动回武汉工作。

包惠僧《回忆李大钊同志》：“一九二三年九、十月之间，党中央调我到武汉工作，并要我先到上海会商一下再回武汉。中央的信是由李大钊同志转给我的。当时北京区的工作在‘二七’工潮以后，经过了一番整顿，刚上轨道，比较好做；武汉的工作在‘二七’工潮以后还没有恢复正常，我们有些同志与京汉铁路工人之间还有些分歧，我有点畏难的思想。”“李大钊同志约我到 he 家里，把中央的信交给我说：‘工作在哪里都是一样，只要党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服从党的调动就是服从党的纪律，也就是党性的体现。这些大道理你都知道，也不必我多说。至于你爱人分娩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可以照顾你，不要担心。除此以外你还有什么困难呢？’

我说：‘我是觉得武汉的工作比较难做。’

李大钊同志说：‘现在就是因为工作上有困难所以调你去，难道说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困难不成吗？’说到这里，他

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我终于答应一、二天内就动身南下。我们在分别时，他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告诉仲甫和秋白，曹锟的贿选势在必行，我们虽然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反对贿选，但是在武力与金钱的势力下，那些议员老爷们的心目中还有什么民主与正义啊！胡鄂公（当时众议院的议员）要求入党是真的，反对贿选是假的；他这次到上海是名利双收的手法，我们不要上了他的当。’他带着微笑，发出叹息的声音，我们分别了。”（《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67页）

10月4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十月四日第二十四次会议》：“到者：李大钊、谭熙鸿、蒋梦麟、马裕藻、王星拱、顾孟余。

（一）预科教授会组织案。”

“（二）本校教授刘半农请津贴论文费。”（《评议会议事录》）

10月6日 《北京大学日刊》公布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学生演习之指导教员。

《政治学系教授会布告（一）》：“本年度政治学系演习细则，昨经本会议定如左：”

“（三）凡选修演习之学生，须按各人所择题目性质，就左列之担任教员中，择定一人，请其指导：

陈源、王世杰（政治史及政治制度）”

“李大钊、陶孟和（社会问题）。”（《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0月9日）

10月10日 应邀参加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举办的宴

会。出席北京大学学生召开的双十节纪念会，并发表演说。

《加拉罕宴请北京学界代表》

希望学界促成中俄亲交：“双十节下午八时，苏联全权代表加拉罕，在该团办公处大厅，设宴招待北京大学教授，由该团参赞德夫金及全体团员陪席。被邀者有蒋梦麟、顾孟余、李大钊、张竞生、谭希（熙）鸿、陶孟和等二十余人。席间宾主致为融洽。时至夜深始尽欢而散云。”（《京报》，1923年10月12日）

《北大之双十节纪念大会》：“十月十日，北大学生在该校第三院大礼堂，开双十节纪念大会，与会者约三千人，教职员到者有代理校长蒋梦麟，教授李石曾、李守常、谭熙鸿等。来宾方面，本约定苏俄代表加拉罕与会，但加氏因事未能莅会，仅致函道谢学生盛意并致希望之词。九时，由主席宣告开会，继由蒋梦麟演说。”“次李守常演说。散会时已十二时矣。是日蒋代校长及各教授演词皆颇长，且多警惕之语，听者皆极感动。”（《晨报》，1923年10月12日）

10月24日 当选为北京大学评议员。

《校长布告》：“本校本届评议员选举，已于昨日下午三时一刻在第二院大讲堂当众开票，计收到选举票共六十七张，兹记其结果如左：

顾孟余 五十六票，王星拱 四十六票，李煜瀛 四十一票，马叙伦 四十票，李大钊 三十九票，陈大齐 三十六票，谭熙鸿 三十六票，马裕藻 三十五票，沈士远 三十四票，朱希祖 三十二票，冯祖荀 三十票，胡适 二十八票，罗惠侨 二十八票，余文灿 二十七票，沈兼

士 二十七票，沈尹默 二十六票。以上十六人当选。”
(《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0月25日)

10月25日 因事请假两周。

《注册部布告(四)》：“李大钊先生因事请假两星期，所授功课，假满时补授。”(《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0月25日)

10月30日 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长。

《校长布告》：“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十二年度评议会第一次会议议决事件如左。”附各委员会委员长及委员名单：(八)学生事业委员会：

李大钊(长)、沈士远、李煜瀛、肖友梅、钱稻孙、罗惠侨。”
(《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1月1日)

11月7日 在上海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会讲话，题为《社会主义释疑》。

11月18日 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演化与进步》一文。

11月24日 在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本定于十月二十日召集，嗣因与劳动大会时间冲突，改在十一月十五日，又以候驻粤委员，延期到二十四日始开会。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开会，二十五日下午四时闭会。到会者中局委员四人，驻京驻鄂委员各一人，S. Y. 代表一人，特别招待同志一人，共八人，驻湘驻粤委员未到，中局委员一人因事赴湘亦未

到^①。议事日程如左：

- (一) 中局报告大会后进行事项；
- (二) 各委员报告地方工作情形；
- (三) 国民运动进行计划；
- (四) 劳动运动进行方针；
- (五) 教育宣传问题；
- (六) 第五次国际大会准备事件；
- (七) 郭平伯、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张绍康、陈天党籍问题；
- (八) 胡鄂公等党籍问题；
- (九) 党证问题；
- (十) 中局会计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①第135页）

11月29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研究历史的任务》，强调“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认识他。”“所以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要改作重作，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故吾人应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

12月1日 在《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时》一文。

^① 中局委员四人，当为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驻京委员当为李大钊。驻鄂委员当为项英。S. Y. 代表一人，当为刘仁静（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或林育南（秘书）。驻湘委员当为朱少连。驻粤委员当为谭平山。中局委员一人因事赴湘未到的，当为毛泽东。

文章批评了对时的观念的错误认识，指出“时的首脑，不在古初，乃在现在，不是向广漠无涯的过去奔驰，乃是向广漠无涯的未来奔驰。吾人是开辟道路的，是乘在这时的列车的机关车上，作他的主动力，向前迈进他的行程，增辟他的径路的，不是笼着手，背着身，立在旁观的地位，自处于时的动转以外的。我们要改变这误谬的时的观念，改变这随着他产生的误谬的历史观人生观，要回过头来顺着向未来发展的大自然大实在的方面昂头迈进，变倒退的为顺进的，变静止的为行动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得到一个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

12月4日 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劳动问题的祸源》一文。

12月8日 在《时事新报》副刊《商学》第33期上发表《王著货币论书后》。

12月11日 为《清代通史》作序。

12月17日 出席北京大学念五周年庆祝会，并发表演说。

《北大念五周年纪念会之第二日 盛况不减于昨日》：“北大念五周年纪念会第一日(十六)之盛况，已志昨报。今日(十七)上午九时开庆祝会。首由该校蒋代校长演说，”“次由教授李守常先生讲演，略谓北大是黑暗中之灯塔，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外界黑暗势力有如过眼烟云等语。”（《京报》，1923年12月18日）

12月20日 在《新民国》第1卷第2号上发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指出：“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

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12月23日 在天津学术讲演会上，发表题为《历史与人生观》的演说，指出：“历史是要前进的，回顾从前、羡慕以前是无用的，不惟无用，一踌躇、一眷恋，反足耽搁吾们前进的时间，黄金时代总是站在吾们的前面，作吾们引路的一盏明灯，一直照着它奔去。”

12月30日 参加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校庆十八周年纪念会，发表题为《十八年来之回顾》的演讲。

12月 在《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孔道西的历史观》一文。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四年(中华民国十三年) 三十五岁

1月4日 被选为国民党北京支部六代表之一，赴粤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在京党员派代表赴粤》：“国民党北京支部之民治社，与某社近因接广州孙文来密电，请派代表六人赴广州接洽党务。特于日昨(四日)在某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开全体党员大会，到会者约千余人，主席为某大学教授李某。除讨论报告外，当选定谭仲逵、李大钊、许宝驹、谭克敏等六人为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党务大会。闻是会定于一月十五日开幕，连开十日，北京六代表因距开会日期甚近，已于昨晨由京乘特别快车南下，所有代表用费，均由党员平均分担。此次各处选派代表，甚为秘密，盖恐为官厅所干涉，于党务有碍云。”(《京报》，1924年1月6日)

1月5日 《北大日刊》公布李大钊请假离京。离京赴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会议。

《注册部布告》(二)：“李大钊先生因事离京，其所授史学系史学思想史及政治经济两系之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暂时请假，俟回校后再行补讲。”(《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月5日)

张国焘《我的回忆》：“一九二四年初，我偕同李大钊先生

经由上海赴广州。停留在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曾邀请我们两人参加中央会议，讨论我们去广州所应采取的态度。当时中共中央正为国共合作在各地的发展表示乐观。李大钊先生在会议上报告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经过；声言北京中共同志间已无歧见存在”。“陈独秀先生十分欣慰，提议由我们两人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结果，这个指导小组的责任，就完全落在李大钊先生手上。”

1月14日 被聘为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册编辑导师。

《校长启事》：“本校同学编辑二十五周年纪念册，其编辑员姓名业已另单宣布，兹敬请

李大钊、杨栋林、周作人、胡适、王星拱、沈尹默、王世杰、徐宝璜诸位先生为二十五周年纪念册编辑导师，指导一切，并请徐宝璜先生为主任导师。一月十四日”（《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月15日）

1月17日 当选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临时代表团代表。

《公告·本校教职员临时代表团启事》：“本团照章改选代表已于本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在第二院接待室当众开票，共计收到选举票一百四十三张，兹特将当选代表名单宣布于左：”“丁绪贤 七十一票 万秀岳 七十票 包尹辅 六十七票 李大钊 六十票”（《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月18日）

1月20日 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主席团成员及宣言审查委员。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一号：“主席（孙中山——编者） 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

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赞成者请举手。(大多数)可决。”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二号：“主席(胡汉民) 现在宣言审查委员九人，已由总理指定胡汉民、戴季陶、茅祖权、李守常、恩克巴图、叶楚伦、王恒、黄季陆、于树德九位(众无异议)。”

1月22日 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五号：“主席(林森——编者) 宣告张君声明毕，现在指定谢君持，何君世桢，谭君平山，丁君惟芬，廖君仲凯，茅君祖权，孙君科，朱君霁，李君守常，萧君佛成，汪君精卫，张君知本，戴君季陶，居君正，于君右任，毛君泽东，石君瑛，邓君泽如，谢君英伯十九位，为章程审查委员有无异议(众谓无异议)。”

1月23日 被孙中山指定为宣传问题审查委员。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七号：“主席(孙中山——编者) 宣传问题审查委员，本总理指定戴季陶、胡汉民、叶楚伦、李守常、冯自由、黄咏台、黄右公、刘成禺、白云梯九位，有无异议(众谓无异议)。”

1月28日 在方瑞麟提议要在党章中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后，李大钊登台发言：“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并望诸前辈同志，指导一切。”会后又油印发了一份意见书，再次指出：“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

的，不是胡里胡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贡献于吾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12号）

1月29日 主持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十五号：“本来午后开会，主席团原推定李君守常主席，因李君未到，故由本席^①主席，现李君已经到会，且本席下午尚有他项要事请假半日，仍请李君主席可也。

主席团李守常主席。”

1月30日 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

胡汉民 汪精卫 张静江 廖仲凯 李烈钧 居正
戴季陶 林森 柏文蔚 丁惟汾 石瑛 邹鲁
谭延闿 覃振 谭平山 石青阳 熊克武 李守常
恩克巴图 王法勤 于右任 杨希闵 叶楚伦 于树德”

2月7日 在广州追悼列宁和纪念二七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这篇演说稿发表在二月十六日《新学生》第14期上。

^① 即汪精卫。

2月16日 与北京大学教授四十余人一起，为恢复中俄国交，致书顾少川、王儒堂。

《北大教授请恢复中俄国交 致书顾少川王儒堂表示意见》：“北大教授致书顾少川、王儒堂，言宜即宣布恢复中俄国交。原文云：少川儒堂先生：顷者俄国革命国体变更，中俄之交，因以暂辍，然此乃事势所趋，国际常例，苟其主体已定，则邦交自当随复。若夫或有日月之延，筹躇之虑，所以觐其统治之力，而察其主体之固定与否，诚以玉帛既将，则信誓无更，谨之于前，庶以寡悔，非谓一旦解携，遂无复合者也。俄自革命以还，既有年所，曩者犹有旧党扰攘，可以却虑，比则苏维埃共和国已大联合，其四境已谧，寇遁就除，人情趣一，主体固定，尚复何所审顾。而俄使三至，迄无酬答，所以海内怀疑，或受牵制。抑苏俄以平民革命，推覆帝政，纵其为治方略，未与我同，此其国内之情，无涉邻与，言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况俄之与我，经界相毗，不徒念鲁卫之政，宜先诸国，复其故交，即援连疆之谊，亦当应其嚶鸣。至于迩来外交之术，每于国交回复之际，辄有要求附之条件，揆之法理，难为一谈，违理之行，岂宜率效。况俄之于我，互助之勤，亦屡宣布，苟相与以诚，何至食言。若先以利合，后图未可必也。所以思惟再三，金谓宜绝瞻顾冀望之怀，立遗尺一，复续两国之交。先民有言，当仁不让。梦麟等欲言之，执事者，有日矣，以为执事折冲樽俎见岂不同，而乃声闻久寂，似畏前驱。今者着吾先鞭者已二国，宁当复使超轶绝尘而甘局促自后于人哉。扬国声而辑与国，惟执事之是图。专此布臆顺从健安。国立北京大学教授：陈大齐、黄节、张煦、王星拱、陈源、

陈君哲、沈尹默、丁燮林、杜国庠、张竞生、李四光、胡适、马衡、戴夏、顾孟余、冯祖荀、李宗侗、汤尔和、陶孟和、林玉堂、蒋梦麟、罗惠侨、单不庵、马叙伦、余文灿、李麟玉、李煜瀛、何育杰、李书华、马裕藻、周作人、刘文典、沈士远、石瑛、江绍原、谭熙鸿、皮宗石、樊际昌、李大钊、王世杰、白鹏飞、朱希祖、周览、郑奠、沈兼士、林损、郁达夫。”(《京报》，1924年2月16日)

2月29日 北京大学注册部布告李大钊已回校授课。

《注册部布告(二)》：“李大钊先生刻已回校，下星期起照常授课。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2月29日)

2月 命张申府去广州，从事国共合作工作。

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我在莫斯科住了两个月，回国正是一九二四年春节。我们坐火车经哈尔滨、沈阳到北京，见了李大钊。我原想回北大数学系，但胡适代理校长，不让我去。大钊叫我去广东，说现在国共合作，广东正需要人。于是到了上海，见到陈独秀，谈了一夜，交谈了国内外的形势和国共合作等问题。

一九二四年二月初到广州，特别受到欢迎，参加筹备黄埔(军校)，担任黄埔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是戴季陶。”(《“一大”前后》(二)，第552页)

3月 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第五届候补评议员。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总会通告：“第五届评议员选举票，去年已由南京总会分发各会员，现在统计前后接到评议员选举票已过半数，改选结果如下：正式当选评议员七人

左舜生：三十六票、杨效春：二十二票、

杨贤江：二十二票、恽代英：二十一票、
邓仲澂：二十票、李儒勉：十八票、倪文宙：十五票
候补当选评议员五人

黄仲苏：十四票、恽震：十三票、李大钊：十二票、
苏甲荣：十一票、田 汉：十一票

评议部推定执行部正副主任

本会第五届执行部正副主任，已由评议部推定陈启天、李儒勉两君担任。”（《少年中国》第4卷第11期，1924年3月）

3月4日 在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中，被选为国内大人物。

《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第六问，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那几位？”

“国内大人物

孙 文：473票、陈独秀：173票、蔡元培：153票、
段祺瑞：45票、胡 适：45票、梁启超：29票、
吴佩孚：27票、李大钊：25票、章太炎：10票”（《北京
大学日刊》，1924年3月5日）

3月8日 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改组。李大钊被选为五人委员之一，分工任委员长。

《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四年五月）

“北京区委，三月八日改组：守、和、昆、孟、鸿为委员^①。区委分工：守委员长，和秘书，昆劳动运动，孟国民运动委员会秘

^① 守：李守常。和：蔡和森。昆：张昆弟。孟：何孟雄。鸿：范鸿劼。

书，鸿任会计。

北京地方情形比前略好之处，为内部精神之一致，同志皆努力工作；委员会能管理并指挥一切行动。至于组织及训练则还未至于完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①第217页）

3月14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一次评议会临时会。

《三月十四日第一次评议会临时会》：“马叙伦、罗惠侨、王星拱、李煜瀛、沈士远、陈大齐、蒋梦麟、冯祖荀、马裕藻、沈兼士、谭熙鸿、沈尹默、李大钊、朱希祖。

蒋：今日开会完全为大学条例问题。”（《评议会议事录》）

3月15日 为教部新颁大学条例事，与关应麟等致校长公函。

《本校教授致校长公函》：“为教部新颁大学条例事”“关应麟、胡潜济、林玉堂、江绍原、沈溯明、李大钊”（《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17日）

3月30日 所写《列宁不死》一文，刊登在中华民国国民追悼列宁大会刊行的《列宁纪念册》上。文章说：“列宁的功业，在人已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他的主义，亦经体现于全人类。革命的组织，日在发扬滋长中，以完成人类在历史上重大的使命，故列宁的躯干虽死，列宁的精神不死。”

4月18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五次评议会。

《四月十八日第五次评议会》：“到会者：罗惠侨、马叙伦、王星拱假、余文灿、沈兼士、李大钊、沈尹默、马裕藻、沈士远、谭熙鸿马夷初代。

议案：

（一）教务会议议覆学生旅行津贴案。”

“（二）仪器部提出仪器保证金案。”

“（三）教育改进社拟请康恩博士来华讲演询本校能否津贴费用案。”

“（四）日本移用赔款作文化事业案。”（《评议会议事录》，1924年4月18日）

4月20日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李大钊任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

《北京执行部报告书》：“第一项 北京执行部成立及改组之经过 北京执行部自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成立后，即在本京织染局二十九号租定房舍一处，分设各部办事处，开始办公。”“第二项 组织及职员姓名 北京执行部最初成立之时，其组织及职员姓名如左，（附北京执行部办事通则）（一）秘书处 常务委员丁惟汾（会务）、王法勤（党务通信）、石瑛（财务）。文书科，主任傅汝霖，助理余惟一、何孟雄，录事管涤我。会计庶务科，主任刘范祥，录事孙鼎元。（二）组织部 部长李大钊，秘书蔡和森，统计登记路友于，组织指导陈兆彬。”

4月23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八次评议会。

《四月二十三日第八次评议会》：“到会者：蒋梦麟、罗惠侨、李大钊、沈尹默、马裕藻、余文灿、马叙伦、谭熙鸿、陈大齐、冯祖荀（罗先生代）、沈兼士、顾孟余、王星拱（病假）。”

（一）主席报告：（1）今日会议纯为日本在华文化事业之讨论，在委员会提出第三次意见外，还有马、胡、谭三评议员提出修正案，望从详讨论。（2）昨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各学术机关所拟之宣言，其大旨与本校之意相同。

（二）讨论第三次意见商榷书。

(三) 议决: 延会明午一时续会。”(《评议会议事录》)

4月24日 出席北京大学第九次评议会。

《四月二十四日第九次评议会(续昨日之会)》: “到会者: 罗惠侨、冯祖荀、余文灿、陈大齐、沈兼士、马裕藻、沈尹默、李大钊、王星拱、沈士远、蒋梦麟、谭熙鸿、马彝初^{谭代}。

(一) 接续讨论意见书。”

“(二) 又办法修正。

(三) 预科主任有否教务长选举权及被选举权问题。”
(《评议会议事录》)

4月28日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大学经济学会、平民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团体, 拟于五一举行纪念大会, 并邀李大钊等发表讲演。

《劳动纪念会预志》: “五月一日为世界劳动纪念节,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北大经济学会、平民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团体, 拟于是日下午一时举行劳动纪念会, 藉以使国人明瞭‘五一’之意义。地点在厂甸师范大学风雨操场, 请有李石曾、李守常、高一涵、蔡和森诸人讲演, 并闻是日尚有人预备唱‘国际歌’助兴云。”(《晨报》, 1924年4月28日)

5月1日 在《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第24期上发表《这一周》。文章介绍了“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等纪念日的内容和意义。其中关于五月五日马克思诞生纪念日, 文章指出: “我们在这一天, 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这种研究的答案, 自然是‘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 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 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 作

民族独立的运动，从列强压迫之下，把中国救济出来。’倘能循此途辙，以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那么马克斯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他的诞生日必更值得我们纪念了。”

5月3日 北京学生联合会定于五月四日举行五四纪念会，邀请李大钊等莅会讲演。

《明日之五四纪念会》：“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前曾在师范大学开会，讨论关于五四纪念事宜。决定于五月四日下午一时，假石驸马大街女高师，举行露天纪念大会，并请有胡适、范源廉、李石曾、蒋梦麟、李守常、杨荫榆诸人讲演。该会业已函达各校同学，及附属平民学校，是日一体与会，想明日当有一番盛况云。”（《晨报》，1924年5月3日）

5月9日 出席北京大学评议会第三次特别会议。

《五月九日第三次特别会议》：“到会者：余文灿、沈士远、陈大齐、马裕藻、罗惠侨、谭熙鸿、蒋梦麟、沈尹默、顾孟余、李大钊、沈兼士。

（一）主席报告杨先生辞职事。

（二）主席报告经费事。”

“（三）音乐传习所请改名案。

（四）主席：本校派赴德国留学生毛、姚二生增加学费案。”

“（五）史学系主任朱先生请假，并以服务已过十年请准全薪假一年。”

“（六）主席提：临时委员会之委派向例不经评议会通过，但事后须报告此节，本校章程未有明文规定，应否照向例办理。议决：照向例办理。”（《评议会议事录》）

5月14日 在北京大学政治系讲《人种问题》。该讲演发表
在六月二十日的《新民国》第1卷第6期上。

《政治学系教授会布告》：“星期三日午后一时至三时，请
李大钊教授讲授‘现代政治’

讲题：人种问题

教室：第三院第一教室”（《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5月
14日）

5月中 因张国焘被捕叛变，军阀政府下令缉捕李大钊。
李大钊与李葆华上吕黎五峰山避难。

李星华《五峰山二次避难》：“乍一来到韩昌黎祠，父亲的心
情十分沉重，因为他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回来以后，带来了许多新的任务，北京有许多革命工作正
需要人去完成。他的朋友突然传来了紧张的风声，警察总监
下通缉令捉拿这个‘鼓动罢工’、‘宣传赤化’的共产党领袖，在
这样紧张的情势下”，“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北京。另外，还有一
件最伤心的事，就是他的最心爱的女儿钟华，由于得了肺炎，
在铜幌子胡同（16号）死去了。他就是这样负着责任在肩而不
能去做，和生离死别的沉重心情，来到韩昌黎祠的。”（《中国青
年报》，1959年5月6日）

《游缉队拘捕五学生》：“昨（二十一）早五时，突有游缉队
多人，至地安门内蜡库逮捕张国焘（江西人）、杨子烈女士（湖
北人）二人，同时复在他处捕获三人，共计五人。查此五人之被
捕原因，系有共产党之嫌疑。”（《晨报》，1924年5月22日）

5月 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大钊著《史学要论》一书。全书
约两万字，共分为六个部分：一，什么是历史；二，什么是历史

学；三，历史学的系统；四，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五，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六，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书的开头部分介绍了马克思的历史观，说它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发现“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书中还指出事实考证与理论研究的关系，认为：“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的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见，始能比较的明确。”但是，历史的研究并不应以单纯考证事实为目的，必须“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书的最后部分强调现代史学给人生以很大影响，它告诉我们历史是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

5月 接到中共中央命令，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那时父亲正在苏联，他是五月里接到党中央的命令，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6月4日 北京大学第十次评议会因通缉李大钊事，向教育部提出质问。

《六月四日第十次评议会》：“马裕藻、朱希祖、顾孟余、沈

兼士、余文灿、冯祖荀、李煜瀛、沈士远、蒋梦麟、罗惠侨、沈尹默、王星拱沈兼士先生代。

提议事项：”

“(C)李守常教授通缉案命令有该犯身为大学教授一语，由评议会代表教授质问教育部，不得任意毁谤。议决由文牍课草函教育部质问。”(《评议会议事录》)

6月11日 写《新闻的侵略》，主张“根本取缔外国利用通讯社在国内各地宣传，应将那些造谣生事的、侮辱中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驱逐出境，一个不留”。这篇文章于六月十八日，在《向导》第71期上发表。

6月中 去哈尔滨，至满洲里，越国境，赴苏联。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父亲带着另一位青年，投奔在哈尔滨经商的一位本族的哥哥去了。在瑞景大伯父的帮助下，一切出国的事项都办理好了。因为是秘密出国，没有起下护照，同时还得绕过张作霖在国境上的检查，瑞景大伯父给他们雇了三辆出国的车辆”，“一切准备妥当以后，父亲和那位青年也搬进小旅馆去住，因为代表们在动身前集中在一起，第二天起程就方便了。”(《中国青年》，第8期，1959年4月16日)

6月27日 内务部通缉李大钊等。

《内务部通缉李大钊等之咨文》：“内务部对于张国焘等一案，日昨曾通咨各处缉拿李大钊等。其文如下：

案准京畿卫戍司令部，咨称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张国焘等一案，並將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

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三等扶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有张坤生等扶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盛德、刘仁静、方沈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廖佩英等。李大钊充北京大学教员，范围所关，宜乎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明转令严速拘拿，务获归案讯办，以保治安而遏乱萌等因，到部，除分行外，相应密咨查照办理云云。”（《晨报》，1924年6月28日）

7月1日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书面讲话，列举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事实，介绍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

《特别通信》：“本报莫斯科特约通信

△中国共产党之活动

△陈独秀当选华干事

△女代表刘志静演说

昨日(十八日)本社接到莫斯科特约通信员来函。其中所述数事。颇可注意。爰披露之如下。本报乃纯以“新闻”之见地而发表者。故不加何等鼓吹与批评也。

第三国际共产党大会。讨论各民族问题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之宣言，及中国共产党员当选大会之情形。(载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一日官报Uybecmner一五五号)

其言曰。我中国人民。一方面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一方面受本国军阀之压迫。各军阀多惯于媚外。中国之民族运

动。应从反对各帝国主义者入手。一年以来。帝国主义者在华之横暴。又复多端。兹举列如下。

(一)美商喀尔干案 喀为美国投机商人。当中国官吏加以检查时。极力反抗。遂致受伤。美人乃要求养伤费五万元。并惩戒当事官吏。如此极无理由之要求，中国政府竟不敢从(按：原文如此)。

(二)汉口织业工人之罢工 在汉口英人设有制棉工厂。其中有三百工人。拟组设织工联合会。事为英人所知。立予开除。于是全厂工人起而作示威运动。英人竟武装干涉。遂发生冲突。工人受伤多人。被捕者三十三人。英领会审判决。监禁五月者五人。余则皆为二月之监禁。其横暴可以想见也。

(三)法国债款 法国佛郎价格日跌。故法政府要求中国以金佛郎付还庚子赔款。于是中国无端须多付赔款五千五百万两。岂非冤上加冤。而中国政府。竟能予以同意。国会虽曾反对。迨贿赂到手。亦将含糊通过也。

(四)旅顺大连 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已满。理应交还中国。然日人竟继续强占。不肯交还。

(五)临城案件 临城胡匪劫车时。华人被劫者百人。外人被劫者只二十人。而外交团竟除要求撤换多数官吏外。复有监管护路军队之要求。并对于被劫者。每人赔偿八千七百元之多。其无理已达极点。然其要求均经照办。

(六)棉花之出口 外交团要求中国撤消华商所请禁止棉花出口之命令。虽华商人极力反对。然中国政府竟不能不屈从外交团之要求。而华商于棉业一道竟绝命矣。

(七)烟捐问题 英美烟草公司。在华营业免纳捐税。致

中国年耗二万万元之巨款。而华商则处处重徵。难与竞争。于是各省纷起反对。请政府徵税。而中国政府竟因英美烟草公司之抗议拒绝此请。华商则只能呼负负而已。

(八)广东之关税 广东国民党政府命广东海关不得再将关余解交北京政府。于是英人派军舰二十至粤海。意在威吓广东政府。然其目的竟未得达。足证南方之有人也。

(九)在华之外国舰队 列强拟在扬子江组设联合舰队。已订定协定。现正要求中国政府之同意。想中国政府必又唯唯而已。

以上所述。不过约举数端。实则此种事实。指不胜屈。所可惜者。北京政府完全受彼帝国主义者之支配。丝毫不敢反抗。于是民族运动。亦遂逐日伸张。我党之影响。亦日渐深入。我人以为应造成一种民族革命运动。由一有势力之党派指挥其间。在国民大会时。曾议决取消一切压迫中国之条约。如租借地领事裁判权监督关税等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否认一切北京政府非法之借款。关于内政则要求普遍之选举。言论集会之自由。制定劳工法。组织保护劳工之机关。改良农业与交通制度等问题。均为极得当之议案。故在会议后劳工阶级及智识阶级之加入者。日见其多。五月一日劳工节。由我党为首在各地曾作示威运动。当北京政府因列强干涉。拒绝与俄签订协定时。国民党在京亦曾作示威运动。然旋被军警解散。于是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党遂严加注意。五月一日在汉口有国民党员五人被捕。旋竟枪毙。在北京亦有党员五人被捕。未加审讯。竟置之军狱。我党与政府之争斗。正方始未艾也。

又曰中国北方之工人。已在我党势力范围之中。在南方则国民党之影响较深。然我人正在力争之时。惟势力尚以嫌薄弱。应按照第四次大会时议决之抵抗帝国主义者之政策。指挥工人。并参加民族运动。以促党务之进步。深望此次第五次大会。对于中国问题。加以注意。示以新路。以便遵行也。

此次中国共产党派来之代表中。有女代表一人。名刘志静(译音)者。在消费组合社国际纪念日纪念大会时。曾致欢迎词。听者颇为感动。兹录其欢迎词如下。

中国女子一方面受社会制度之压迫。一方面受资本制度之压迫。正在奋斗之时。兹值此消费组合社国际纪念日。谨代表中国女界深致欢迎之意。并希望在最近期间。全世界之人民能在世界京都莫斯科共同庆祝此纪念日也。(此节载七月六日官报一五二号)

此外七月八日第三国际共产党大会选举干事时。中国方面被选者为陈独秀。(此节载七月九日官报第一五四号)

七月十八日国际青年共产党大会开第四次大会时。中国代表张太雷君(译音)演说“谓东方青年之共产运动。于世界大局。至有关系。近数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之民族运动。发展极速。凡我青年。既富有新思想。复不信迷信旧说。在是种运动中。当然居重要位置。以坚毅之精神。参加其间。一方面严守我人之宗旨。不少失我人之独立性。必可达我人之目的。即对于美洲及南非洲黑人之解放运动。亦应加以援助。此为义不容辞者。余意东方之青年共产运动。于西方之青年劳工运动。有极大之联带关系。将来我东方青年之得胜。可称

即西方青年得胜之保证也。”〈拍手〉(此载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官报第一六三号)”(《京报》，1924年8月19日)

《第三国际会与中国》：“莫思科特讯，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中国代表，对于民族问题曾发表宣言，大要谓中国内有军阀之躏踏，外遭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军阀受帝国主义各强之支配，与外人狼狈为奸，结果民族运动渐见发展。该会中国代表多系国民党共产派分子，言次颇为该派鼓吹云。”(《晨报》，1924年8月10日)

8月1日 北京大学评议会致函教育部，请取消通缉李大钊令。

《北大评议会请取消通缉李大钊明令》：“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被政府指为提倡共产主义，颁令通缉。李因事先出京，得免于难。然对于大学教授，并未确实证明其有犯法实据，而遽下令通缉，此事关于国家学术人民权利者綦大。顷北大评议会特函教育部，请咨行内务部，取消通缉李明令。原函如下：

敬陈者，近阅报载，内务部以工党一案与本校教授李大钊有关，业明令通缉。并有充北京大学教员，范围所关，宜乎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等语。阅竟之余，殊深诧异，查李教授大钊，从事大学，颇称稳健。就令平时于言论或著作上有所主张，然大学为讲学之地，研究各种学说，实为大学教授应尽之责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缉。事关国家学术前途，为此恳请：大部，咨行内务部，请将通缉李大钊明令，迅予取消，以维学术。如谓李教授大钊有犯法实据，即请从速据实宣布，以释群疑。并请大部提出国务会议，嗣后对于大学教授非依据法律确实

证明其为现行犯者，绝对不能任意通缉。想大部有维持国家学术之责，必能赞同斯意，而急为之设法挽救也。谨上教育部。

国立北京大学评议会

中华民国十三年八月一日”

(《晨报》，1924年8月4日)

7月—9月 住莫斯科近郊马拉霍英卡的东方大学宿舍，进行参观访问活动。

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大会结束后，其他代表先期回国，父亲在苏联又逗留了一个时期。他到各地参观、访问、考察和讲演，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俄文。在苏联期间，父亲给家里来过几封信。他那时化名‘李琴华’。父亲曾写信向家里要一件皮大衣，看来他是打算在苏联至少过了冬天再回国。他非常渴望在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在伟大列宁的故乡多走走，多看看。”(《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9月上旬 到列宁格勒参观，住“国际海员之家”。

李大钊《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九月初，我和一位同志陪同一位海员代表到列宁堡(旧名圣彼得堡)去参观，我们沾海员的光，住在一个‘国际海员之家’里。”“我们在此住了一周。”(《李大钊选集》第513页)

9月24日 在莫斯科写《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这篇文章于十一月十日刊登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

9月28日 在莫斯科写《上海的童工问题》一文，介绍了国外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上海童工的调查材料。次年四月《中国工人》第4期发表了这篇文章。

10月7日 请假离京，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工作暂由章廷谦担任。

《校长办公室通告(一)》：“校长室秘书李守常先生，因事告假出京，秘书室事务暂请本室助教章廷谦先生担任办理，本学年不再另设秘书。此布。”(《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0月7日)

11月 离苏联回国，临行前对袁玉冰说：“我又要回到战场上去了。”

孟冰《悼守常同志》：“‘我又要回到战场上去了。’这是守常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将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对我们说的。谁知现在这句话已成了讣话，我们这么一别竟成永诀！”(《红灯》周刊第12、13合期，1927年5月7日)

12月 召集赵世炎、高君宇、彭桂生及铁总负责人在家中开会，布置工作。高君宇及铁总负责人未到。赵世炎向李大钊汇报了工作，李大钊谈了准备成立北方区委、办党校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

彭健华《一九二四年秋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后对北方区工作的部署》：“李大钊说，很好，我们要开展各方面的工作，需要很多从事各部门工作的干部。农民运动也需要加以重视，现在各地农民抗捐抗税的斗争在相继兴起，需要我们去发动、组织和领导。比如，河南的红枪会是一支很强大的农民武装力量，成分都是贫苦农民，但大部分掌握在土豪劣绅手里，被他们所利用。我们曾派去一些同志进行工作，今后还要加派同志去掌握这支武装力量。还有内蒙三特区(热河、绥远、察哈尔)的少数民族的工作，也应加以重视，将来办起党校时，要吸

收些少数民族的党、团员到党校来学习，培养一些少数民族的工作干部。”“李大钊接着谈到，国民党改组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促使许多旧式军队也发生变化，都希望和我们拉关系。国民二军胡景翼曾邀我们的同志去，成立了学生军。而西北军冯玉祥想让我们帮他仿照黄埔军校办所军校，聘请苏联军事顾问，遣派政工人员。”

一九二五年

一九二五年(中华民国十四年) 三十六岁

1月4日 应邀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准备讲演。

《国民会议促成会今日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日昨开第五次干事会，到干事二十余人，当议决要案多起，其中最关紧要者为遵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代表大会议决案，谨于本日开成立大会一事。当场金谓本会所包含之团体既逾二百之数，而时事日亟，各地促成会皆已成立，本会业经筹备就绪，自应遵照大会决议，即日开成立大会。首都观瞻所系，筹备自不能不庄严整肃，特假北大第三院能容数千人之大礼堂，妥为布置。”“特请孙中山、段芝泉、汪精卫、许世英、李石曾、易培基、吴稚晖、于右任、顾孟余、李守常先生及各大学校长莅会讲演。极欢迎各界人士前往参观。再该会章程及宣言，业已由起草委员会拟就，本日提出大会通过云。”（《京报》，1925年1月4日）

年初 劝张申府不要脱党。

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九二五年一月，参加党的‘四大’，总理是大会五人主席团之一，还有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和瞿秋白。参加代表有七、八十人。我参加了‘四大’，威金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中因一篇党的纲领发

生争论,我认为那篇纲领,是绝对不妥的,有些年青党员乃说我幼稚可笑。我一气之下,表示退党。后来我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一大”前后》(二)第 554 页)

1月16日 应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邀请担任讲演大会宣讲人。

《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积极进行》:

“举行讲演大会 筹备通俗讲演

各地纷纷响应 星期开委员会

新闻编译社消息云,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宣传股,为使一般民众了解国民会议之利益,与促成国民会议之必要起见,特于日昨在虎坊桥办公处,开宣传股会议,议决请各名人举行讲演大会,并邀请加入各团体之团员,分组在各通俗讲演所及街市间,举行大规模之通俗讲演,该股为此事特致函各公私团体,请派讲演人员。”“此外并闻该会已请定宣讲人为汪精卫、李石曾、于右任、李守常、王世杰、周鲠生、高一涵、杨吉(杏)佛、黄昌谷诸先生。自昨日起,至二十日止,每日下午二时,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美术专门等处轮流讲演云。”(《京报》,1925年1月17日)

1月17日 应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邀请,在师范大学讲演,讲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

《国民会议促成会讲演纪事》:

“讲演者为李守常于佑任先生

地点分师大美专两处

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原定举行公开讲演大会五日，第一次已于十六日在北大举行。第二次与第三次有十七十八两日，分别在师大美专举行，在师大讲演者为李守常先生，讲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在美专讲演者为于佑任先生，讲题为真正国民会议之产生难，两先生讲演皆极受听众欢迎，兹略记其梗概于次：

李首详述葡萄牙荷兰等国势力东侵之历史，因英国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最甚，叙之尤为详尽。次则分析太平天国之事实，谓本系一般农民受帝国压迫而发生之国民革命运动，因帝国主义者巧为宣传，将人民之恶感集中于满清政府，帝国主义者自身则回避其锋，使蓬蓬勃勃之国民革命运动，竟变为狭隘的排满运动，帝国主义者初则阴遣教士暗助洪秀全，使战事扩大，以遂其挟制清廷任意要索之野心。迨所求既遂，则素被太平天国称为洋兄弟之外国人，一改其面目而化为戈登之长胜军矣。”（《京报》，1925年1月20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讲演纪事（续）》：“于是此最可注意之革命运动，竟以此而销毁。义和拳亦系受帝国主义者压迫过甚而起之反抗运动，然因其智识浅陋，手段不良，竟为帝国主义者压服，酿成巨祸。至辛亥革命因鉴于义和拳之害，亦仅以倒满为唯一目的，对于外人力任保护，不敢有反抗的言论。现在孙中山先生看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之祸患，高树国民革命的旗帜，以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相号召，全体国民都应在此旗帜之下，努力奋斗。最后李先生复郑重声明，谓现在有一般人，以为现在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是义和拳思想之复兴，大为恐惧，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现在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仅仅反对各

国的帝国主义者，并不是反对他们全体人民。孙中山先生在俄德退出侵略团体以后，即声言联俄联德，有一个时期曾极力帮助菲律宾的革命运动。可见孙先生是抱世界主义的人，他反对的仅为各国的帝国主义者。所以现在的国民革命运动和义和拳的运动，是大不相同的。”（《京报》，1925年1月22日）

1月21日 担任北京各界纪念列宁大会主席。

《记昨日国民纪念列宁大会》加拉罕等之演说：“（本报特讯）中华民国国民纪念列宁大会，昨日下午三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会场布置极为严肃。”“上书列宁遗言，讲台上设一列宁遗像，五色国旗及苏联国旗交叉其上，中置匾额一方，文曰‘列宁虽死而列宁主义仍存’。到会人数约在三千以上，除汪精卫、马叙伦、蒋梦麟等多人外，苏俄大使加拉罕及其随员十余人亦均莅会。由李守常主席致开会词，略谓今日为列宁周年忌日，我们今天开会纪念他的意义，因为他是世界革命指导者，同时又为东方被压迫者的良友。李氏致词毕，全场起立，由乐队奏演第三国际歌。次由赵世炎报告列宁事略，依序请加拉罕演说。”“演说毕，主席请全体起立，三呼‘列宁主义’‘世界革命’‘中国国民革命’万岁。五时半宣告散会。”（《京报》，1925年1月22日）

1月24日 被党的“四大”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分工驻北京。

《中共中央通告第一号——四次大会选出的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及分工》（1925年1月24日）：

“同志们：

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照章选举同志仲甫、守常、和

森、特立、德隆、秋白、述之、平山、罗迈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志邓培、荷波、章龙、太雷、锦堂五人为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月二十二日）决定分配工作如下：仲甫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特立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和森、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五人驻中央局，守常驻北京，平山驻广东，德隆驻汉口，罗迈驻长沙，邓培驻唐山，锦堂驻安源，章龙、荷波任铁路总工会工作，太雷任S. Y. 中央工作。特此通知

中央总书记 T. S. Chen^①”

2月7日 国民会议后援会拟召开成立大会，请李大钊等到会并讲演。

《国民会议后援会出现

应时团体层出不穷》：

“中国青年协进会、苏浙皖三省旅京青年协会、北京妇女同志会等五十余团体，发起组织国民会议后援会，以援助全国公团促成国民会议为宗旨，积极联络京中各公团协力进行。昨日继续加入该会者，有正谊通信社、华北大学学生会、浙江两级师范旅京同学会、青年励志团、华大平民教育委员会等十余团体。至正式成立大会日期，至迟在下星期以内，拟假中央公园水榭为会场，届时并拟请汪兆铭、邵瑞彭、吴敬恒、李大钊、汤漪等莅会讲演。已推定张维城等为筹备员，并推定董秋芳等为代表，于今日前往协和医院省视孙文病状云。”（《晨报》，1925年2月7日）

2月 被孙中山指任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① 即陈独秀。

《狱中自述》：“前岁，先生北来，于临入医院施行手术时，又任钊为政治委员，其时同被指任者有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人诸人。”

2月21日 出席民治主义同志会等三团体欢迎国民党要人的招待会，并作讲演。

《三团体招待民党纪事》互致勉励之辞：“前日下午一时，民治主义同志会，民生周刊社，大中公学数百会员，欢迎民党要人于北京大学第二院宴会厅。计当日到会者有李烈钧、吴稚晖、邹海滨、谢无量、杨庶堪、陈敬修、徐谦、蒋梦麟、马叙伦、凌毅、王德（法）勤、杨杏佛、李大钊、王亚樵、杨德甫等数十人。首先主席袁世斌报告开会大意，继由邹德高致欢迎词，孔庆宗报告民治主义同志会、民生周刊社、大中公学之由来，关系工作及使命。”“李大钊报告前到俄国时，一般俄国人民学生，无不热烈慰问孙中山先生之身体事业，于此可见孙总理于世界革命人材之地位矣。并朗诵孙总理勉励同志词：‘革命当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杨德甫等后报告其实身参与之革命运动。经过白雄远、谌少岑、袁正道、张和竞、王光辉等，均有极长演说。时已八钟，来宾主人精神愈加焕发，惟为时过晚，乃宣告散会。”（《京报》，1925年2月23日）

2月24日 在北京大学继续讲授“史学思想史”课程。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决定二十八日开成立大会，邀请李大钊等出席讲演。

《注册部布告》：“李大钊先生现已回京，原授之史学思想史，定于下星期一起开始讲授，欲选此项科目者，望于本星期内至注册部报名为要。”

一,此项课程于半年内讲完。

二,讲授时间星期一第一时,星期六第一第二时,共三小时。

三,地点第一院十四教室。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2月24日)

《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启事》:“本会于二十四日开筹备会,业已决定二十八日(星期六)下午一时,假前门内中国大学开成立大会。并请汪精卫、李石曾、邵飘萍、李守常诸先生及廖仲凯夫人、伍智梅女士、鲍夫人等演讲,届时望各界女士莅场指导,如女界中有愿临时加入者,无论个人团体一概欢迎。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启。”(《京报》,1925年2月27日)

2月27日 国民会议促成总会开第一次筹备会决定三月一日行开幕典礼,敦请李大钊等到会。

《国民会议促成总会明日开幕》:“国民会议促成总会筹备处,日昨开第一次筹备会,到会各省区代表二十余人,当议决:(一)三月一日上午九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行正式开幕典礼,由总务、文书、庶务各股,分途筹备牌楼、传单、广告等事。(二)敦请段祺瑞、赵尔巽、汤漪、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褚辅成、许世英、于右任、李协和、邹海滨、李守常、马寅初、蒋梦麟、章士钊、林长民诸人及各大学校长、教授、新闻记者到会云。”(《晨报》,1925年2月28日)

2月28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发出通告,敦请李大钊等出席开幕礼并发表演说。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通告》:“本会筹备月

余，响应遍于全国。各地已派代表来京者共计六十三省县。兹定于三月一日(星期日)上午九时，假北河沿北大第三院举行开幕礼，并敦请孙中山、段芝泉、汪精卫、李守常、吴稚晖、褚辅成等数十名人及执政府各机关、各法团代表演说，届时各界人士均可到会旁听。特此通告。”(《晨报》，1925年2月28日)

2月 《“二七”二周年纪念册》刊载李大钊的《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文章指出：“帝国主义者卵翼的军阀与民众的结合根本不相容，因为民众一有结合便有一种力量抗拒他们的阶级的民族的仇敌，那作外国帝国主义者代理人卖国殃民的军阀那有不时时隄(提)防民众压抑民众结合的道理。”吴佩孚就是这样人，当他知道“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猛最有力的先锋队”之后，决心镇压工人运动。现在仍有军阀摧残民众，“我们工人阶级和那些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们更要奋勇万倍的高扬着鲜红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

3月1日 出席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发表演说。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第一次集会》：“昨日(一日)上午九时，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举行开幕典礼，到会各省区代表，计有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朱务善、胡南湖等”，“天津代表邓颖超等”，“共八十余人，来宾及听讲者则有数百人。十时一刻开会，公推顾孟余为主席。主席宣布开会宗旨，大意谓今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全国代表大会，有三种意义：(一)为人民之自由与权利，应由人民力争，不应希求实力阶级之赏赐。(二)为人民不应怀疑自己实力，而应有打倒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之坚定信仰。(三)

为今日吾人要求国民会议，实因国民会议可团结全国人民为战斗与夺取权力之机关。今日之会，为历史上国民自决运动之第一次有组织的表示，故吾人当努力以完成此历史的使命云云。次由朱务善报告筹备经过。”“次由江西会馆各界促成会总会代表报告。愿与本会合并意思。”“报告毕，由来宾汪精卫、林森、徐谦、李守常等相继讲演，历时甚久。最后有蒙古代表白云梯演说”，“其他各省区代表尚有报名演说者，因为时间已晚，暂行停止。主席遂请全体代表来宾起立，唱国民革命歌三首，高唱‘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国民革命万岁’、‘国民会议万岁’等口号。时已下午一时，军乐队奏乐，主席宣告散会，摄影而散。”（《晨报》，1925年3月2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昨日为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日。”“由顾孟余君主席，宣布开会，致开会词。”“李守常之演说略谓，真正国民会议之召集，非由诸位代表回去在工人农民中组织宣传不为功等语。”（《京报》，1925年3月2日）

3月6日 被提名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系主任候选人，得一票。

《校长布告》：“数学、化学、地质学、哲学、德文学、史学、经济学七系主任改选，业于本月五日开票。兹将选举结果宣布于下：”“经济学系：顾孟余 四票（当选）…… 李大钊 一票”（《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3月6日）

3月8日 出席国际妇女节纪念会并发表演说。

《昨日之国际妇女节纪念会》：“昨日（三月八日）为国际劳动妇女纪念日，北京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等二十余团体，发起

在太平湖民国大学开纪念大会。上午十时，即由该会筹备员石道璠等到该校布置会场，“三时许，正式开会，公推刘清扬为临时主席，夏之相等为临时书记，石道睿等为招待员。主席宣告开会后，即全场起立唱歌。次由主席报告开会旨趣。”“最后尚有李大钊等演说，至五时余，演说毕，全体起立，唱国民革命歌，高呼各种口号，六时许，始散会。”（《晨报》，1925年3月9日）

3月9日 国民会议促成会决定三月十日正式开幕，拟邀请李大钊等莅会并发表演讲。

《国民会议促成会二次代表预备会》：“三月十日正式开会地址北京教育会

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总会，自筹备以来，各地来电加入者，异常踊跃，而先后派代表莅京者，已有六十余处，百三十余人，现闻该筹备处定今日召集第二次代表筹备会，明日（十日）假北长街北京教育会正式开会，开始讨论，并拟聘请各专门委员，如汪精卫、戴季陶、李守常、李石曾、吴稚晖及各教授，出席报告国际及国内各种主要问题，已印旁听卷，备各界旁听。”（《京报》，1925年3月9日）

3月10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抵制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办法。

《国民党纠纷益多》：“前日（十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帅府园开会，到会者计有二十余人。首讨论抵制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办法，以于树德、李大钊二人发言最多。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开成立会时，到会人数竟有二千以上，实为不可轻视之举动。而同志俱乐部之总章内，载有跨党者不准入会一

条，明系反对共产之表示。如果任其成立，未免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本上发生影响，非设法抵制不可云云。当议决登报否认该俱乐部为本党同志所组织，与本党毫无关系，以免误会。又以于右任及张继二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是日不应加入同志俱乐部之大会内。应向于、张二人提出严重交涉（闻于右任已允登报否认加入，张继则拟置之不理）。最后提议，自中央执行委员会移京之后，因无武力可借，不能发生强制效力。一般党员，已不受执行委员会之支配。危险情形，不堪设想。现值广东陈（炯明）军完全失败，不如将中央执行委员会移会广州，将来全国执行委员会，仍在广州举行，俾有所凭藉，易于支配云云。此项提议已一致通过云。”（《晨报》，1925年3月12日）

3月11日 出席中国国民党为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

《中国国民党欢迎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昨日下午二时，中国国民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欢迎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主人方面到者有吴稚晖、丁惟汾、戴季陶、李守常、于树德等十余人。代表到者百余人。由丁惟汾主席，致欢迎词。次由吴稚晖、戴季陶、李守常相继演说。大意说明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提倡国民会议的原因，并希望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接受该党的主义，及主张到广大的民众中间，努力于宣传组织的工作。次由代表江著元、王乐平相继致谢词，均希望该党于形式的欢迎外，予以精神上的指导，以实现真正的国民会议。继全体摄影，并由北京执行部秘书处分赠代表每人三民主义及建国大纲各一份，至五时散会。代表等并当场推举二十余人，齐赴铁狮子胡同行辕，慰问中山先生

病况。到后由邹鲁报告中山先生病况，并致谢意，代表等遂兴辞而出。”（《京报》，1925年3月12日）

3月12日 被聘为华北六大学辩论会评判员。

《明日华北六大学辩论会》：“华北六大学中文辩论会定于明日（十三日）午后七时半，在师大、北大、燕大、协和和清华同时举行。评判员每校三人，业由该会会长鲍明铃聘妥，闻有李大钊、江亢虎、王正廷、陈宝泉、林长民、熊希龄、邵飘萍、汤尔和、邓萃英、杨永清、沈步洲、高一涵、谭熙鸿、张祖训、陈登山等，届时当有一番盛况也。”（《京报》，1925年3月12日）

3月14日 参加孙中山治丧秘书股中文主稿工作。

《痛悼孙中山先生·国内外一致》：“治丧处秘书股之组织：孙先生行馆本有秘书处。今因治丧往来文件甚多，特另组秘书股。今日上午十时，该股召集全体会议，议定职务分配如：主任汪精卫、戴季陶、邵元冲。中文主稿邵元冲、谢无量、易寅村、杨沧白、谢慧生、吴稚晖、于右任、戴季陶、王太蕤、徐季龙、邹海滨、李守常、吴玉章、王陆一、路友于。收发摘由于范亭、陈去病、范体仁、戴朝震、李汉樵、李渤海。保管文件杨杏佛”（《京报》，1925年3月14日）

3月16日 被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大会聘请为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长。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大会纪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昨日下午二时在北京教育会开第三次大会，到会人数百零四人，议事日程，（一）签定席次，（二）提选秘书处长，（三）组织各种委员会，（四）讨论议事细则，（五）

临时动议。主席顾孟余报告开会议决事项，(一)签定席次下次再议，(二)选举结果安体诚当选为正秘书长，郭景仁为副秘书长，(三)组织四种委员会，并聘请汪精卫、于右任为国际问题委员会委员长；戴季陶、邵元冲为内政问题委员会委员长；顾孟余、唐有壬为财政问题委员会委员长；吴稚晖、李守常为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委员长。(四)议事细则，讨论二十四条。因时至六时，乃宣告散会。”(《京报》，1925年3月17日)

3月19日 参加将孙文灵柩由协和医院抬送至中央公园社稷坛。

《孙文灵柩今日移中央公园》：“孙文灵柩定今日上午十一时由协和医院移置中央公园社稷坛。”“孙文灵柩决定由国民党党员自行抬送，不用杠夫，以表尊敬之意。闻已派定二十四人，分三组更番替代，其人皆国民党中坚人物也。

人名如下：第一组：张继、汪兆铭、孔祥熙、林森、石青阳、宋子文、喻毓西、石衢青。第二组：于右任、陈友仁、李大钊、白云梯、邹鲁、戴天仇、邵元冲、钮永建。第三组：李烈钧、姚雨平、郭复初、焦易堂、邓家彦、朱卓文、蒋作宾、林祖涵。”(《晨报》，1925年3月19日)

3月 为梁容若题词。

梁容若《万里朝宗中山陵》：“回忆一九二五年三月，我参与了北京中央公园国父的吊祭以后，把一本‘三民主义’请李守常教授题词，他写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辛亥风云》，第223页)

3月20日 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招待会。教育总长王九龄训令京中各大学及京师学务局，飭认真防范

李大钊等共产党。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招待专门委员》：“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自开幕以来，进行非常热烈，现各种专门委员，如国际问题委员会，内政问题委员会，财政问题委员会，国民会议运动委员会等，皆已组织就绪，并于昨日(二十日)正午十二时，假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招待各专门委员。昨已发出通知，被聘之专门委员，除各省代表外，会外有汪精卫、戴季陶、李守常、吴稚晖、邵元冲、唐有壬、雪亭、周硬(鯁)生、马寅初、易寅村、李石曾、于右任、高一涵、蒋梦麟、邹海滨、李协和、于树德、李春涛、邝摩汉等多人。又该会二十日例会代表，大部分系专门委员，须赴中央公园招待会，由主席团议决休会一日，昨日发出通知，照录如下：迺启者，本会业已组织四种委员会，代表大半加入研究，今为迅速预备各种问题方案起见，定于明日开委员谈话会，特由主席团议决将本星期五代表大会休会一日，至下星期一继续开第五次大会。用特函达，务希贵代表携带出席、表决两证依时到会为要，此致台鉴。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秘书处启。十九日。”（《京报》，1925年3月21日）

《政府查禁各大学共产党》：“据三月二十八日新闻报云：教育总长王九龄日昨特训令京中各大学及京师学务局，飭认真防范共产党，惟其所据京师宪兵司令部密报，则颇有失实之处，如内称北京大学首倡共产党李大钊云云。按北大教授中确有李大钊其人，然并非字秀昌，且亦不住该校第三院休息室。至所称昨晚在该校第三院寄宿舍召集党员秘密开会云云。查北京大学并无所谓第三院寄宿舍。宪兵司令部据此密报执

政府军务厅，军务厅即据此行文教育部。宪兵司令部与军务厅对学界情形，不无多少隔阂，其报告或有失实，尚足原谅。而堂堂直辖各大学之教育部，乃竟据疑信参半之词，煌煌训令各校，曰严密查察，曰认真防范，岂非笑话？兹照录原文如次：

案准临时执政府军务厅第一〇一三号函开：‘本月三日据京师宪兵司令部密报，转据宪兵第二营报称：北京大学首唱共产党李大钊，字秀昌，现住该校第三院教员休息室，并有不日开会，议决进行手续之消息等情。据此，当函复该司令部，加意严密侦察，随时报告。兹据报称于本月九日，据第二营续报，探闻北京大学共产党首李大钊，于昨晚在该校第三院寄宿舍，招集党员，密开会议之事，其宗旨系令各党员分派成组，密往京师中学以上各校，运动学生加入该党等情。据此，除仍飭严密查察续报外，相应函请通飭各校，严行防范，以靖地方，而肃学风’等因。准此，除分行外，合亟令仰该校即便遵照，转飭各中小学校严密查察，认真防范，是为至要。此令。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日，教育总长王九龄”（《教育杂志》第17卷第5号，1925年3月）

3月27日 派刘弄潮看望鲁迅，转达党对鲁迅的期望。高度评价了鲁迅的小说《长明灯》。

刘弄潮《李大钊和鲁迅的战斗友谊》：“一九二五年春天，我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先生讲课，同时在李大钊——守常师领导下，从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工作。”“三月二十七日，我为了要去吉林开展青年工作，到沙滩红楼去见守常师。”“我站起来告辞。他送我出来，问：‘鲁迅先生发表的小说《长明灯》，你看过吗？有什么感想？’我天真而直率地回答说：‘看是看过

了,但是没有什么深刻的了解。不过小说里有一句话‘看了赛会又发狂’,我看了后感到,这次孙中山先生北上,各大学的学生都活跃起来了,鲁迅先生本来就是个大满腔热情的文豪,大概感觉特别兴奋吧。’守常师点了点头,凝思地对我说:‘我看这是他要灭神灯、要放火的表示。这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喊了救救孩子之后紧紧接上去的战斗号角。’他停下步来望着我,继续说:‘你可以去看看他,请他当仁不让,把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直接领导起来干呵!’

我当时想,我虽然爱听鲁迅的课,却没有和他谈过话。于是便先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告诉他:我听守常老师说,他很推重老师写的《长明灯》一文,我渴望来看看他,希望他能抽出一点时间,和我面谈一次。没有料到第二天我就得到鲁迅的回信,简单地通知我:‘我晚上总在家,欢迎你来谈。’”(《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第16页)

3月31日 北京大学发表声明,驳斥教育部严防李大钊等共产党训令。蔡元培自欧来函,托李大钊转告苏联,因身体不健,故不经苏境。

《国立北京大学启事》:“近日各报载有教育部严防共产党训令,略称据京师宪兵探报,三月九日晚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寄宿舍,招集党员秘密开会议,并称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第三院教员休息室居住等语。查本校第三院并无寄宿舍,第三院教员休息室亦向无人住宿,九日晚间亦无人在第三院开会。该项训令所载探报,显系讹传。本校对于学术上之研究,向主自由,不加干涉,然从未容许任何派别藉本校为政治活动之地。值兹政局倏扰,谣喙纷乘之际,诚恐外间有人

藉端摧残本校，特此郑重声明。”（《京报》，1925年4月5日）

《蔡校长自欧来函》：“梦麟吾兄大鉴：二月二十六日惠函敬悉。惟弟五月间必不能即行，恐须在八、九月之间，俟酌定后再奉告。弟身体现不甚健，由俄境行，须车行太久，恐不能支持。”“或俟再来欧洲时，设法一往游，请转托守常先生为婉告俄人及留俄之华人也。”（《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4月30日）

3月 在北京《民国日报》上发表《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一文。该文对三月六日苏大使照会北京执政府决定由蒙古境内撤走红军一事表示支持。

4月 《孙中山先生哀思录》第三编上刊载了李大钊的《挽孙中山》。上联：“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子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下联：“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夺，经济侵袭，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4月8日 反对国民党右派在北京召开国民党“二大”的主张，力主回粤开会。

《国民党左右两派大争执

右派主张在京开会 左派主张回粤开会》；

“国民党自孙文逝世后，其内部因反对唐继尧副元帅，及召集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之二问题，大起纷扰。对唐事件，因京中国民党员，多主张国民党各派大结合，故汪精卫、邹鲁等数次提议下令讨伐，均无结果。召集第二届代表大会事件，则因北京及广州之开会地点问题，争辩甚烈，亦未解决。前数日该会在帅府园开会，出席委员十一人，于右任主席。非共产派之邓家彦、谢持、石青阳、茅祖权等主张在北京开会。共产派之李大钊、王法勤、丁维汾、于树德、邹鲁等主张在广州开会。李等痛陈不能在北京开会之理由，谓该党在北京缺乏武力，不能令党员绝对服从命令，而北京又处军阀及帝国主义威力之下，不能自由行动。邓等逐条驳之。结果付表决，赞成反对者各五人。主席于右任遂声言将此案保留。闻汪精卫主张在广州开会之意见极为坚决，拟不理多数党员之反对，迳由胡汉民以大元帅及代总理命令，召集在广州开会。反共产派闻之，亦拟召集海内外全体党员大会，以否认汪胡等之行动，日来正在磋商一切进行方法云。”（《晨报》，1925年4月8日）

5月10日 在冯玉祥军队中筹建政治俱乐部，宣传国民党纲领。

维·马·普里马科夫^①《一个志愿兵的札记》：“1925年5月10日”“定于今天进行装甲列车的试验性射击，因此，我们来到哈宁同志那里。在哈宁处，我们碰上了多连和李大钊教授（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组织者之一），他身材高大，面孔恬静，

^① 维·马·普里马科夫是1925—1926年冯玉祥军队中苏联军事顾问组领导人。

有一双聚精会神的眼睛，戴着一副角制大镜框的眼镜。

李大钊忙于在军队里建立政治俱乐部。他使冯玉祥同意通过政治俱乐部在军队里宣传国民党纲领。为了与冯玉祥进行谈判，李大钊从上海来到北京，而当时，北京警察局局长已对他下了通缉令。他秘密地进入冯玉祥部队的辖区，在营房里躲藏了几天，然后在夜里离开北京，前往张家口。在这里，他与元帅会晤，对于组织俱乐部一事，得到了元帅的同意。”（《冯玉祥与国民军》，第47页）

6月初 派遣宣侠父等赴张家口，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进行政治工作。

金铃^①遗稿《宣侠父烈士传略》：“一九二五年，侠父经浙江党组织的介绍，到北方在李大钊同志处工作。李大钊又派遣侠父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带领一批共产党员赴张家口，到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进行政治工作。”（宣侠父：《西北远征记》第2页。）

《塞外的初梦》：“霹雳一声，五卅惨案爆发，中国民众，从血花里昂起头来，走上革命的道路，全国的视线，都凝注在春申江^②上。在这样喧阗扰攘的政潮中，忽然接到冯氏来电，欢迎我们西去，于是我和另一位同志陶君^③，即日起程，开始这塞外浪迹的生涯。”（宣侠父：《西北远征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夏秋之间 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

① 金铃：宣侠父同志的夫人。

② 春申江：上海境内黄浦江的别称。

③ 陶君：即陶新畲。

任北方区委书记。留肖三在京，任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

夏之栩《片断的回忆——忆赵世炎》：“1925年‘五卅’运动后，革命运动在北方各地都有发展，党中央决定成立以李大钊同志为书记的北方区党委，领导北方几省的革命工作，也兼北京市党的领导。”（《红旗飘飘》选编本，第一集，第233页）

肖三《对赵世炎事迹的回忆》：“以后我由中央调来北方工作，初任张家口地委书记，名义上是干国民党的工作，经常接触铁路工人。有一个工头接受冯玉祥的津贴，他密告了我。”“（这是一九二五年夏秋之间的事）我便回北京向李大钊同志请示下一步怎么办，李大钊同志要我回北京来，因为这时虞正和冯在拉国民革命的关系，还是暂时避免和他冲突的好。那时世炎同志在北京地委工作。不久，中央来北京开会，会后成立党团的北方区委。李大钊同志任党的北方区委书记，世炎是宣传部长并主编《政治生活》，陈乔年是组织部长，范鸿劼也是搞宣传工作的。我作共青团的北方区委书记，因此经常和世炎见面。”（《“一大”前后》（二），第522页）

8月6日 在《雷火》第8期上发表《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这是他去开封时，在各学校及民众团体欢迎大会上作的演说。

秋天 偕同王法勤、丁维汾等至张家口。游赐儿山。参加促进西北军与国民党联合的会议。

《塞外的初梦》：“礼拜日，我和七位同志同去游赐儿山，赐儿山算是张家口唯一的风景，秋曦刚上树梢，晨风微起，挟着新凉，侵入游客衣袖。”“忽然看到大门口一位肥硕而有微须的人，喘吁地进来，为山路的崎岖，额角涔涔流汗，我们一看，却

是李守常先生，就都上去招呼，后面跟着来的是王法勤和丁维汾两先生。”“在日色渐西的光景中，我们跟着李、王、丁三氏下山归来，从王氏谈话中，知道于右任、吴稚晖、张继等也已到了张家口，这许多党内所视为领袖及北方革命运动实际的指挥者，联袂而集中于张家口，很明显地可以预知时局将有新的发展了；但是这次会议的内幕，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一无所知。”（宣侠父：《西北远征记》，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0—33 页）

9月9日 在《政治生活》第 50 期上发表《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

11月18日 在《政治生活》第 58 期上发表《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一文。文章分析国民军、直系、奉系三种势力的现状，指出：“综观时局的现象，在北方，奉系军阀已经神气沮丧于民众威力所指导的反奉联合战线之前。奉军所以不敢逼入京畿的原故，民众反奉的气势，亦颇与有力。反之，国民军因为得到民众的援助，虽然尚未加入战争，而所处的地位，比从前已较为强固。直系军阀，此次乘民众反奉的怒潮而再起，其初虽藉口于奉系军阀之如何压迫民众为其发难的理由，但其自身在沪汉各处的行动，压迫民众，仍与奉系军阀同其行径。全国民众对于照样压迫民众的直系应即提出严重的抗议，切实的指出直系压迫民众的事实，而直系知道他如不改易其类似奉系军阀的行动，民众将以其曾经反抗奉阀者以反抗直系，则直系亦终于继奉系以后为民众所征服而后已。在南方，广州革命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于荡平东江之后，西江以及南部，亦将指日肃清了。这些事实，都是民众势力发展

的验徵，亦是民众势力作最后胜利以结束国民战争的朕兆。”

11月2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北京执行部于右任、李大钊等，严驳非法的西山会议。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两电》：“昨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致函本报，称接得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广州拍来急电二通，并登载如下：

（一）北京东城翠花胡同八号转于右任、李大钊、王法勤、丁维汾、于树德、恩克巴图诸委员鉴：本会据外交代表团文电称，邹鲁在京发表告孚木文，语多诽谤，经于昨日议决，邹鲁著交北京执行部查办特达，政治委员会马印。

（二）北京东城翠花胡同第八号转于右任、李大钊、王法勤、丁维汾、于树德、恩克巴图诸同志鉴，本日接林森、覃振、石瑛、居正、石青阳、邵元冲、邹鲁、戴季陶、叶楚伦、沈定一、张继、谢持、吴敬恒、茅祖权、傅汝霖等铤电，致广州汪精卫、谭组安、熊锦帆、谭平山、林祖涵、邓泽如诸同志，称已于昨日决定梗日在碧云寺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等语。兹严驳如下，（一）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全体会议，只能在广州开会。”“（二）此举显然未得北京执行部之同意。”“（三）熊克武已因通敌被捕，听候审判，何得通电请其来京。”“以上三点，以中央委员而举动若此，可耻孰甚，惟冒签之事，已成习惯，望北京执行部诸同志，切实查明，如系冒签，请复电声明，其主动者应提出惩戒。中央执行委员会叩。”（《京报》，1925年11月27日）

冬 去张家口，领导成立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

《访问奎璧、吉雅泰同志谈话记录》：“一九二五年冬，北方

区委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地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党所领导的热、察、绥地区工会组织的代表，农民组织的代表，还有部队的代表，共约一百多人。会议自始至终是在李大钊和赵世炎同志主持下进行的。会上正式宣布成立‘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组成盟的中央委员会，选李大钊和赵世炎同志为正副书记，吉雅泰（绥远地区代表）、张治平（察哈尔地区代表）、陈印潭（热河地区代表）和李若愚等同志为委员。大钊和世炎同志在会上都作了报告。”

年底 领导开办了第一个区委党校。

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北方区党委开办了第一个区委党校，利用寒假培训骨干力量。党校设在距沙滩不远的北大三院二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学员主要是北京的党团员，也有从北方其他省市来的，学习时间约一个月，一九二六年春节前后，我每天到党校参加学习。党的领导同志赵世炎、陈乔年等亲自给我们讲课。他们除了讲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外，也讲国内国际形势。最后一课是由父亲讲的，讲课的主要内容，以《土地与农民》为题目，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到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的《政治生活》上。”（《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12月30日——1926年2月3日 在《政治生活》第62、63、64、67期上，发表《土地与农民》一文。文章指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文章认为，

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是自耕农与佃农。“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同时，“随着帝国主义所造成军阀土匪扰乱范围之扩大，一般农民感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必要”。“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六年(中华民国十五年) 三十七岁

1月1日 参加国民党市党部举行的升旗仪式，并发表题为《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演说，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的势力给我们的黑暗，只不过是过眼的云烟。民众的革命精神，正如皎洁的青天白日一样。民众要团结起来，站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打破帝国主义及反革命的黑暗势力！黑暗的势力，遮不住青天白日的光辉。”演说还讲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认为三民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青白化”与“赤化”都是革命的象征，挥着青天白日的旗帜反对“赤化”是不对的。这篇演说刊登在1月8日的《国民新报》副刊第31号上。

1月6日 在《政治生活》第63期上发表《新帝国主义战争的酝酿》一文。文章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一日，决不能有真正的平和，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常常有战争的危險潜伏着。尤其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他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时代的今日——战争的危險更是一天一天的逼紧。”“这未来的新帝国主义战争，要以中国及太平洋为战场；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即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中国的民众应该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民众，起来反对这残忍的战争。”

1月13日 应北京国民反日大会邀请，在民国大学发表讲演。

《昨天三处反日讲演》：“北京国民反日大会，定期敦请名人在北大、师大、民大等三校举行反日大讲演，业志本报。昨日下午，该三处之大讲演，同时举行，兹将三处情形，分志如左：”“民大：昨日下午一时，各界齐集民大讲演厅者，达八百余人。主席王涤涛（民大学生）报告开会理由毕，李大钊、雷殷等六人相继演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之历史，发挥详尽云。”（《晨报》，1926年1月14日）

1月16日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国民党代表大会》：“十六日开十一次会议，选举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是日用双记名投票法，选出执行委员三十六人，候补二十四人，监察委员十二人，候补八人。其中著名共党之谭平山、李大钊等皆有名，惟无陈独秀。”（《晨报》，1926年2月4日）

1月21日 出席北京各界为列宁逝世二周年举行之纪念会。

《昨日之列宁追悼会

演说者有加拉罕并蒙、韩人》：

“昨日（二十一）为造成苏联政府首领列宁氏逝世二周年纪念日。北京信仰列宁主义之一部分知识界人士，于午后三时，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开二周年追悼大会，届时到会者除信仰列宁主义者外，更有许多信仰列宁人士，共约五、六百之多。外宾到者有加拉罕及其随员，并一韩人，一蒙人。徐

谦、李大钊、陈启修等均到。开会时由徐谦主席”，“加氏以俄语演说，由其汉文参赞伊风阁翻译，继后尚有一蒙人用汉语，代表蒙古民演说。继由朝鲜人用英语演说，李大钊为之翻译”，“此外陈启修、李大钊等均有演词，至六时半始宣告散会。”（《京报》，1926年1月22日）

1月26日 北京国民反日大会，拟于二十七日举行追悼郭松龄大会，并请李大钊等为讲演员。

《今日追悼郭松龄大会予志》：“京中国民反日大会，筹备于今日（二十七日）下午一时，在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追悼郭松龄大会，曾志昨报。该会于昨日下午开最末次筹备会，讨论今日大会一切重要问题，结果议决如下：”“（五）讲演员：于右任、陈启修、谭熙鸿、程汉昇、肖子昇、李大钊、王励斋及各团体代表。”（《京报》，1926年1月27日）

1月27日 在《政治生活》第66期发表的《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纪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李大钊在这次会上的演说。李大钊在演说中把列宁和孙中山作了对比，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策略。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策略。在理论上，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是可以联合成一贯，策略上也是能联贯一致的。”演说称赞孙中山，说他“把共产党加入组织，就是他自己将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亲手给连接起来了”。演说最后号召列宁主义者与中山主义者，应该紧密联合起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1月28日 出席徐谦就职俄专校长大会，并发表演说。

《昨日俄专大流血

徐谦就任校长败兴而逃

反对派学生挨打又被革》:

“此次交部因被拥徐派学生包围，遂将俄专交与教部管辖，此事昨午始经阁议决定。前日教长易培基即已函聘徐谦为校长，委以全权办理，徐亦即于昨日上午十一时，到校就职，学生教员即全集礼堂。来宾到者有教部代表陈延龄、加拉罕代表毕特泉尔、李大钊、陈启修、徐逊、叶乘等。开会时由学生代表鲁圣炬主席，先致欢迎词。”“来宾加拉罕代表及李大钊演说。”（《晨报》，1926年1月29日）

2月4日 北京各团体讨张反日大会举行公开讲演大会，请李大钊为讲演员。

《反日会定期讲演》：“各团体所组织之对〔讨〕张反日大会，昨日下午举行代表会议，讨论如何可以作进一步之宣传，结果议定如下：（一）宣传方法，举行公开讲演大会。（二）举行日期，本月九日。（三）举行地点，北大三院大礼堂。（四）讲演人员，吴稚晖、李石曾、徐谦、陈启修、于右任、顾孟余、李守常、陈翰笙、高一涵、黄昌谷、蒋梦麟、徐旭生、王世杰。”（《晨报》，1926年2月5日）

2月21日 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

《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到会同志十二人，计中央委员七人，C·Y·代表一人，北方区重要同志二人，粤区重要同志二人，开会二〔四〕天，会议七次，自二月二十一号至二十四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②第47页）

3月1日 应北京学生总会邀请作学术讲演。

《昨日学总会之讲演

在女师大举行 听众有千余人》:

“北京学生总会,昨日下午二时,第一次在女师大大礼堂举行,听众千余人,由女师大代表刘亚雄女士主席,次由总务主任报告学总举行学术讲演之意义,及学总已往之工作。旋即请李守常讲演《日本维新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比较观》,历述中国与日本革命发展之程序,及以后进行的趋势。次即瞿秋白讲演《中国经济状况与国民革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之程序,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原因,和中国反帝国主义潮流高涨,均极受听众之欢迎,至七时始散会。”(《京报》,1926年3月2日)

3月7日 北京妇女界举行纪念国际妇女节大会,李大钊等应邀作讲演。

《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之昨闻》

北京妇女界明日在艺专举行

敦请徐季龙等名流女士讲演:

“定于是日下午一时,在中京畿道艺术专门学校大礼堂,开会纪念,已敦请徐季龙、陈启修、于右任、李守常、吴稚晖、谭平山、顾孟余、瞿秋白、李石曾、于永滋、安体诚诸先生及鲍罗廷夫人、葛文园女士讲演。”(《京报》,1926年3月7日)

3月12日 在《国民新报》上发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赞扬孙中山的历史功绩。文章最后说:“一九二四年又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容纳中国共产党的分子,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使民族主义的秘密结社,过渡而扩成现代的工农团体,一体加入国民革命党,使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革命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群众党;这都是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

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绩。”

是日 上午九时，还参加了国民党左派在太和殿举行的纪念孙中山的大会。

《昨日国民党公祭孙文》：“昨日国民党开会纪念孙文者，计有三派：（一）右派（即南花园之市党部）在中央公园举行。（二）左派（即翠花胡同之市党部）在太和殿举行。（三）为自称国民党同人之一派。”

“昨日国民党左派则在三殿举行。由天安门起，直至太和殿，均为会场。”“上午九时余，在场者有于右任、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丁惟汾、顾孟余、于树德、黄昌谷、柏烈武等。至十时二十分，即宣告开会，公推徐谦主席，并致开会词。于右任宣读遗嘱，读毕大众向孙文遗像行三鞠躬礼，又推杨景山唱哀悼歌，并唱国民革命歌，礼毕奏乐，由孙中山之孙致答词，至下午二时，即行闭门。”（《晨报》，1926年3月13日）

3月13日 在清华大学、中俄大学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说。

《中山先生周年纪念》：“筹备情形 本次中山先生周年纪念原定十二日，后因讲演员是日不能来校，改为十三日。干事部当即分别函知各机关、各级、各团体，征求对联花圈等，并函请成府、平民两校学生莅会，本会铜乐队及成府童子军届时帮忙。十三日由干事部派彭光钦君邀请讲员。”“开会情形 闻在是日下午二时，然以名人尚未到校，故迟至二时四十分始行开会。首由干事部主席致开会辞。”“李大钊先生演说。略谓：今日追悼孙中山先生，吾人即想到他在国民革命上之地位。孙中

山所处的时代，是一中国被外力所侵略，为外人经济很盛的时代。孙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义，以抵抗一切帝国主义者，则是一方面结束以前的历史，一方开一新的道路，其为功实甚伟大云。次由陈毅君演说。”（《清华周刊》第25卷第4号，1926年3月19日）

《全国纪念孙中山先生》：“又国立中俄大学”“定于本月十三日上午九时，先在本校举行单独纪念，并已柬请新由广东来京之革命巨子邵力子，名流吴稚晖、李石曾、李守常、陈启修诸先生到校公开讲演。”（《京报》，1926年3月12日）

同日 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活动第二日，李大钊等发表讲演。

《孙中山先生周年纪念之第二日》：“讲演概况：讲演台如昨，仍分三处，”“三处听众，各约数千人，其中以工农商界居多，妇女亦不少，并闻今日有徐季龙、李守常等讲演云。”（《京报》，1926年3月14日）

3月18日 参与领导天安门国民大会并参加示威游行。惨案后，召开会议安排善后工作。

《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对于“三一八”惨案之经过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①（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十时天安门国民大会，到会团体异常踊跃，群众约万余人。主席团到会者，有徐季龙、顾孟余、陈启修、黄昌谷、丁维汾、李大钊、学总会代表等八人。总指挥为王一飞、陈贤一、陈日新三人。十时余开会，由徐季龙报告开会宗旨，顾孟余演说。次宣读昨日受伤最

^① 国民党北京市执行委员会写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重之杨伯伦同志致大会群众书，中谓我为革命而死，死亦无憾，望大家继续努力。台下闻后一致高呼：坚持到底，誓死不屈。次由黄昌谷将国民驳复列强最后通牒原文，当众宣读。由徐季龙将大会提案宣读，一致通过。次又有提议，立即组织北京国民反对各国侵略中国大同盟，亦通过。次呼口号，遂出发游行。大队至执政府，已一时半，“群众知事不妙，而枪声即于是时大作。卫队开枪，约计半小时之久，此时群众四面逃窜。而埋伏卫队四面丛起，刀枪木棍，分途追杀，群众死伤者甚多。”“殊知是日李大钊、丁维汾两同志，在惨案时所受险状亦与群众无异，且为群众所共见。”（北京《党声》杂志第3期）

夏之栩《片断的回忆——忆赵世炎》：“3月18日，一个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发动起来了。世炎同志是头一天（17日）从天津赶回来的。这天早晨，他去党委开会。我们宿舍的同志都去参加示威运动，许多党员和团员都担任着指挥、联络、发传单、贴标语等工作。大约快到中午时候，群众队伍来到了段祺瑞执政府（铁狮子胡同）门前，遭到了段祺瑞卫队的大屠杀。这就是‘三·一八’惨案。

我和几个同志好不容易冲出了铁狮子胡同，沿着东四大马路向南走，迎面跑来一位同志小声告诉我：

‘李大钊同志和党委的同志们都到铁狮子胡同去了！’”

“我们的紧张心情并未缓和，因为还没有得到李大钊同志平安脱险的消息，同时我们又为死难者悲伤。直到天色将晚，才有同志来报告：

‘李大钊同志已脱险回家！’

我们大家都舒了一口气。”（《红旗飘飘》选编本，第1集）

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惨案发生后，父亲沉着、镇定地指挥群众迅速离开现场，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最后他才从胡同东口撤出来，立即到党机关所在地，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商榷了下一步的工作。一切安排好之后，他才回到家里。”（《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3月19日 执政府下令通缉李大钊。

《通缉令发表经过再志》：“该令仍于昨晨发表大意业志本报，其全文再志如下：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赴各省区，迭有阴谋发见，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卫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省区长官督飭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并著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切切此令。”（《京报》，1926年3月20日）

《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对于“三一八”惨案之经过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惨案后，北京舆论沸然，虽略有反动言论，不过适足证明反动派进攻革命民众之联合战线。段政府于二十日发通缉徐季龙、李大钊、顾孟余、李石曾、易培基之伪令，谓民众为暴徒，为有意推翻政府种种诬妄邪说。然受舆论攻击，国贼等知不能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贾内阁^①复有一度辞职，其后复发表抚恤令。种种矛盾

^① 执政府总理贾德耀。

之点，不啻自画招供。北京地检厅致陆军部公文，尤将国贼行凶铁证，暴露无遗，其罪真不胜诛。”（北京《党声》杂志第3期）

3月下旬 把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的兵营。

《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对于“三一八”惨案之经过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惨案发生后，国民军即表示脱离民众而与安福系勾结，即反动势力重降北京。职部为免却牺牲与保存组织起见，乃通知各同志，从事秘密工作，勿公开活动。职部于是夜将一切重要文件运出。十九日晨，即有警察前来监视。二十日后，有警察搜查一遍。职部见国民军的态度已不如前，知其不能代表民众，以扫除反动势力，乃将翠花胡同党部收束，另觅他处工作，然暗探密布，负责同志行动颇感困难。”（北京《党声》杂志第3期）

5月 在《政治生活》第76期上发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文章中全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并指出：“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文章还认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对于压迫的还答，只有反抗，对于他们镇压我们的‘秩序’的酬应，只有我们反抗他们的骚乱，这便是革命”。

7月 请于右任赴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敦促冯回国策应北伐。冯回国后，于9月18日在绥西五原誓师。

马文彦《李大钊敦促冯玉祥回国策应北伐的经过》：“一九

二五年十月，国民军第一、二军在华北、河南失败，唯第一军退至南口后，坚持察绥两省。而奉军大军压境，攻击日急。此时冯玉祥局促塞外，一筹莫展。为打破这个局面，便暂时把军队交给了张之江统率，自己偕李德全赴苏联考察，并寻求军事援助。据说，冯到恰克图（布利亚特蒙古共和国，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现改为特罗伊），苏联政府派鲍罗廷到边界欢迎。冯表示，他赴苏考察的目的，是为了救中国，并愿考虑加入国民党，执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鲍表示，苏可按冯的方案，提供援助，他本人也可给冯当顾问，不到那边（指广东政府）去了。

冯、鲍恰克图谈话的内容，由苏联政府通知了驻北京大使馆；大使加拉罕告知了李大钊（党的北方局书记），李大钊便请于右任赴苏做冯的工作。”“对李大钊之请，他欣然同意，但要求给他找一个俄语翻译。”“这时，我也因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先到北京，住在陕西朝邑会馆。于托同乡刘天章找翻译，我正好碰见刘天章。”“刘引我去见李大钊，李大钊和我简单说了几句，就请求一位懂中文的苏使馆职员对我进行测验。”“李大钊就把我留下来，并给我写了一封信，叫我到天津英国租界国民饭店去找原春雨。他说：‘原先生昨夜赴津，两人路费，彼已带走。’我遵照李大钊先生的指示，到津找到了原春雨。原来春雨就是于右任。”“我到天津后，就成了于和李大钊之间的联络员。”“李大钊先生在北京为我们办妥了出国手续”。“我们从北京出发时，李大钊已与冯玉祥约定在上乌金斯克和我们会见，所以到了上乌金斯克，我们即发电与冯联系。但冯中途改变计划，要我们去莫斯科同他会见。此时，奉军与国民军的战争更趋激烈，国民军一军渐渐不能支持，形势紧迫危急。张家口驻

有庞大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每日战况及时电告苏使馆，苏使馆即转告李大钊。因此，李先生电告于右任，要于尽快催促冯玉祥回国，以收拾部队，撤往西北。接到李先生来电后，我们必须尽快去莫斯科见冯，但随身路费不足，不得已电告李先生。李先生立即给我们汇来路费，我们就立即去莫斯科。”“于和冯就在冯的住处进行秘密商谈。经过会谈，冯接受了李大钊先生提出的意见，即‘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并很快达成了协议。”“在莫斯科逗留约半个月，回国准备已经就绪，我们决定八月下旬起程。这时，李大钊从北京来电，要于敦促冯早日起程回国，不然察绥战局又会发生问题。”“在库伦，又接李大钊来电说，冯军已投降了阎锡山，要我们催促冯尽快回去收拾局面。”“到达五原后，冯、于即筹备誓师大会和进军西北的军事部署。”“誓师之后，冯遵照李大钊提出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指示，挥军西进。”（《党史资料通讯》第9期第25页，1982年5月15日）

7月22日 在《政治生活》第79期上发表《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文章在说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两项方策之后指出：“综合以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进攻，异常的凶猛。日前张作霖躬往大连，与日本关东儿玉长官会见，亦颇含有重大的意义。全中国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啊！在全国民众号召各地的国民革命军讨伐勾结英日帝国主义的张、吴的战争中，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注意和监视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国民革命阵线及其侵略满蒙的阴谋和行动。”

8月 联络国民军一军，策应许权中部和两个团的起义。

马文彦《李大钊敦促冯玉祥回国策应北伐的经过》：“一次，于^①要我去北京见李大钊，到了北京，李却要我去涿州见许权中。原来许权中派任警斋向李大钊报告，说他有一个加大营要起义，要李同张家口国民军一军联系，在起义时予以策应。许权中想在吴佩孚达到涿州时带队在车站举行盛大欢迎会，趁机把吴打死。他让我到保定打听吴佩孚北上确期，我到保定通过京汉铁路工会史文彬，打听到吴已在保定住下，暂不北上，许的计划落空了。但在这时，许又策动了田维勤（田逸民）部马克斋两个团的起义，把田的部队拉走将近一半。田恼羞成怒，会同奉军截击，由于国民军一军的策应，许部和两个团的起义成功了。我回北京向李先生汇报了这一情况。”（《党史资料通讯》第9期第26页，1982年5月15日）

8月8日 在《政治生活》第80、81期合刊上发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要求革命者深入农村，重视红枪会，改造红枪会，“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的青苗会而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以“达到除暴安良，守望相助，阻御兵匪，抗拒苛税，抵制暴官污吏，打倒劣绅土豪的目的”。文章分析了红枪会的“反洋人”、“要真主”、“迷信”等显著特点，指出这些落后的东西很容易被军阀、地主、豪绅所利用，所以更需要给他们以革命的教育。只有广大农民“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才能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发挥出巨大作用。

^① 于：于右任。

8月 党中央拟调李大钊、罗章龙去武汉工作，李大钊建议罗章龙先去，自己暂留北京工作。

《罗章龙回忆》：“一九二六年八月，我和李守常在北京俄使馆。有一天，中央秘书处一人带来中央文件和书记陈独秀的一封亲笔信。当时中央发通告，一般是由书记签名，重要的事就写亲笔信。信中大意是：北伐军已节节胜利，不久即可攻下武汉，中央决定用全部力量抓武汉工作，并决定把党中央迁往武汉。信中还提到，要我和守常两人均应离北京到武汉工作。接信后，北方区委开会讨论。（1）同意中央意见，执行中央指示；（2）守常建议先去一人，让文虎先去，他暂留北京；（3）将北方工作做个安排，布置成立北方新区委；（4）根据中央意见，调一批干部南下。当时决定了一个干部名单，主要有史文彬、王仲一、邓培等，还有搞军事、搞工运、农运的干部，大约有二三十人，准备分批启程赴汉。我临走时，又接中央来信，其意是：快点动身，武汉方面急需要人，并要我和守常一道去汉。我找守常商量，守常坚持不去。他认为，北伐军很快要打到北京，应先做点安排，北方区委人少，他不放心。我一再劝他早走，他就犹豫不决。那时，长江一带已被封锁，我是南方人，同他一道走，要方便些，中央的信上也说要我们一道走。我又考虑，是不是他家庭不同意他走。于是在临走前，我又去他家看望了他的夫人赵纫兰。我对他讲，守常同我一起走最好，请你放心。但守常还是不走。这样，我只好把北方区委的文件收拾了一下，寄放在北大储藏室，就先离京南下了。”（1978年8月3日）

夏 派陈毅回四川做兵运工作，策应北伐。

陈毅《早年回忆》：“北伐军由广州出发，革命新形势出现了。四川军阀杨森慑于革命潮流的高涨，向革命方面投机，向李大钊表示，要求派代表去改造他的部队，以便参加国民革命。李大钊即派我去做这工作。我当时接受了任务，即离开北京，第二次回到四川。”（《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第16页）

9月15日 《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发表《守常政治报告》。该报告系李大钊于九月八日写的，内容是报告对国民军、奉系军阀的工作情况。报告说，于右任在莫斯科与冯玉祥谈话，觉得冯玉祥很进步，曾劝其归国革命。冯玉祥归国途中曾写信“谓此次归来，系要革命，措辞极其恳切，系亲笔写的，似此则国军退却之损失，虽不在小，而经此一番折磨，一番淘汰，卷土重来时，必又多一层革命色彩矣。”报告中还说到，“日昨石曾、烈武、寅村等与家兄讨论，结果大家仍主张对奉继续接洽，可以与之相约，分东南地盘，军事解决后再商政治。”“预测中国政局，将有南北分裂之势，家兄谓此为于革命进行上最理想的局面——一边是国民革命政府，一边是张作霖政府，任列强择其一，以与之交涉，任人民择其一，以与之合作，是白是赤，是暗是明，皎然并列，何等分明！”报告谈到国民政府迁都问题说：“看锺兄致粤特委函，主政府仍留粤，不必迁武汉，弟以为此在武汉局面未固以前，自然应尔，但武汉局势稍固，把政府迁到武汉来，不但意义重大，而且更有必要，因为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有三个利益：一以塞武汉之地位免野心者别谋树立，一以空北京政府使之丧失中国政府的位置，一以树革命政府北进之声威。此策所关甚巨，幸锺兄详加讨论决定之。”

9月26日 蔡和森自莫斯科函告李大钊于右任与冯玉祥磋商情况。

蔡和森《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马二先生此时谅已抵包，不知兄已晤见否？伊在此进步甚大，颇可乐观。与伊同行的有俄顾问桑古斯基及刘伯坚同志，刘系马二自己请求其回去者。于髯在此与马二接头结果颇佳，于先马二起程一星期，想已先见之矣。于与马二接头之主题为国党与国军之关系。”（《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

9—10月 策动阎锡山支持并参加北伐。

《于树德谈话记录》：“北伐战争革命军到武汉时，大钊同志给阎锡山写过一封长信，劝他参加北伐。阎锡山后来接受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这封信曾起了很大作用。”

11月 在《政治生活》上发表《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自始即是世界的一部，中国革命的成功，将与伟大的影响于欧洲，乃至全世界。”

12月15日 《中央政治通讯》发表李大钊于十二月五日的来信。信中提出：“我以为目下的策略应该是：（一）如能接近鲁张，仍当纵愿他赶快去吃江苏这一块肥肉，驱孙而拒杨。（二）收纳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三）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合作。”“关于第三策，此间早已进行，在一个月以前，我便托人向晋阎的驻京代表说：‘国民党中央驻京负责的人，很想知道晋阎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他的代表听了此话，含糊其词，便急忙跑回太原，在太原住了二十天，回来托人告我说：晋阎决与国民党

合作，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但此时幸为严守秘密云云。”信中还提到，最近张作霖迫令阎锡山，合攻国民军。阎锡山代表人告诉李大钊，冯玉祥在包头大张旗鼓，使阎锡山很为难。李大钊即着人答他说：“现在革命军之势力，已足控制长江，国民军亦且雄视西北，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命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冯在包头，知公为难，刻已旌麾西指赴平凉督战矣，幸勿介意也云云。”信中又说：“伯坚在冯处已渐引起冯左右之妒嫉”。“已致信伯坚请其注意，并告以须令人材集中于最好之一师或一旅，俾冯及其部下将领得以睹其成效，俾知政治工作之确有成绩，吾党之政治工作者，确能作出成绩。”“现在成绩所以不能卓著的原因，全是因为人材不够用的缘故，并不是政治工作不生效，政治工作者不得力。”

是年下 曾磋商给阎锡山部派顾问事。

《王广林与阎锡山磋商结果及山西各种情形之报告》：“一，对于顾问事项，兹因致阎锡山之信，系用秘密方法所写，尚未将字迹显出。余晤阎氏时，即询以闻督亦有拟用顾问之事，阎答此事明白，详谈至次日早，阎派其警察厅长南佩兰（译音）来余处，声言山西派赴武昌代表曾向鲍罗庭请求顾问，但山西仅能位置二人，此二人须熟悉军事及党务之情形，并于表面上不能与以顾问名义，只可与以山西学校教习名义，免人注目。且山西方面亦不能供给薪饷云云。当晚余复晤阎氏，其言与南君所述相同。余答以俟余回京时，必将此事转陈于李大钊等语。依余个人意见，认为若照上述办法，恐不相宜。”（《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拾）

年底 听取楚图南的汇报。

楚图南《怀念先烈李大钊》：“一九二六年底，由于《哈尔滨日报》上刊载了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侵占东北，抗议反动军阀认贼作父的文章，《哈尔滨日报》被迫停刊，滨江大戏院也被封闭。一些同志被捕和被迫转移，工作遇到一定的困难。这时，吴丽实同志曾派我回北京向李大钊同志汇报情况。我到北京见到李大钊同志，由于繁重的工作，他清瘦多了，但两眼仍然炯炯有神如故，他仔细地听取了 my 汇报后，让我赶快回东北，转告吴丽实同志，随着大革命、北伐形势的发展，党的活动还要发展扩大，东北也将成立新的机构。李大钊同志还指示我们，活动要注意隐蔽，不要过于暴露，已封闭的报馆、戏院就不要恢复了。总之，李大钊同志告诉我们，聚集力量，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回忆李大钊》，第69页）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十六年) 三十八岁

1月25日 派吴渊去武汉，带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京分会的报告及给徐谦等人的信。北京分会的报告记录了许多重要情报，以及李大钊会见阎锡山代表孔繁蔚、日本众院议员大内畅三等情况。在写给徐谦等人的信中说：“兹随吴渊同志赴汉之便，特将所有重要材料汇上报告，阅后即刻送交中央政治会议作为参考。此间经费困难，阳历年关即由弟及石曾借贷，勉强过去。迄今月余，屡电中央，而并一字之答复亦不可得，真令人不解。现在旧债已负约未还，而阴历年间又复迫人。为吾党所补助之机关，将交迫而来索款，究不知从何应付。此外，心声晚报将谋重刊，前国民新报已由达尔逊与美国人 fox 商妥，在京编辑，在津刊行，亦因经费茫然不可靠，致生迟滞而不能进行。中央以为北方工作均当停止，即望代请中央明白告知，长此消极对北京分会不合作，不是一个好办法。又中央向来不与我们以任何政治消息，亦是令人起奇异之感。例如，此次移都南昌问题何〔等〕重大，听在武昌和南昌的中执同志争持甚烈，而京分会同人并消息亦不得知，以此可知中央如何看待我们了。夫国民政府定都何所，中外观瞻所系，岂能朝令夕更，视若儿戏。以今日论，广州为革命根据，武汉为

全国中心，不留于广州，必迁于武汉，百思而不可得可以迁移南昌之理由。如为集中起见，如果不为一时军事上的必需，即介石同志及总司令部亦宜坐镇武汉。今忽轻易的提起移都南昌，致令外交团对我内部频生怀疑，以为我之内部中有危机，不然何以遽弃武汉耶。至于敌党报纸，如晨报则讽嘲迭出，画一旅行的箱子，上书党政府，贴上些广东旅馆、汉口旅馆、九江旅馆的条子。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这真是我们自取之侮了。自移都南昌的消息传入北京，吾党同志骇然莫释，尚望公等力持大计，毅然决计设都武汉，以定人心，而安国本，则党国之幸也。敌军内部较受吾党之影响，至如详细情形，此时应守严重秘密，故暂不报告，只好事后再请中央追认罢了。胡政之君不久当赴汉口，他的国闻社和大公报对于吾党表示相当的好意，望兄等与为比较的亲切之接洽。康心之同志为人明快干练，将来高培五旅如须派政治委员时，望兄等荐之于邓演达同志。又吴渊同志亦至老成稳妥，亦望予以相当工作。又北京市党部选举均已商洽就绪，似无偏倚不平之处，故可望无纠纷发生。南中军政消息有须等等知道的，幸兄等时电好音，吾侪企领以盼，所不能得于中央者，只有望于兄等矣。童冠贤同志来京助益我等之处实多，数月以来所还至感后于中央者，惟此而已。匆匆不尽，望于武汉择一最妥当的通信处便中示知。”（《北京政治分会关于军事政治外交之最近报告附致季龙烈武孟余励斋一函》，《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九）4669》）

春 坚持地下斗争，开展革命工作。

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我国北方的革命运动开始转入低潮，段祺瑞执政

府再三通缉父亲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北京的反革命气焰一时嚣张起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父亲和中共北方区委做了暂时的退却，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我的另一个任务是给要求同父亲谈话的人传信。来见父亲的人很多，除了青年人外，还有一些进步教授、军人等。尽管父亲的工作很忙，但对每个要求见他的人，不管是什么身份，都要尽量挤出时间来接待。”（《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年初 发展国民党员和左派力量，巩固统一战线。

《北京地方国民运动工作报告》：“新中学会创建的历史很久，过去并不是革命的组合，里面的领袖分子，我们同志很多，于树德，安体诚等都是新中的会员。现在新中在北京的会员，多在教育机关作事，进步分子都已由守常同志介绍加入民校^①。同时，加入本校者也颇不乏人。”（《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伍））

4月6日 张作霖派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及其附属机关。李大钊等六十余人被捕。

《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昨日东交民巷内发生极重大事件，为辛丑条约设定保卫界以来，空前未有之事。昨晨十时半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停留多数洋车及便服行路者之徘徊观望，过者早知有异。逾十一时有制服警察一大队，约一百五十名，宪兵一队，亦有一百名，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余皆集中包围俄国大使馆旁邻之中东铁路办公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

^① 当时，在党内称国民党是“民校”，共青团是“中学”。

“至被捕者之人数，报告不一，其较可信者，则俄人十四、五名，华人四十五、六名(中有仆役等)，而华人之中，姓名尚无从调查，唯据外人方面消息，则李大钊、路友于二人，似在其内。”(《晨报》，1927年4月7日)

4月7日 李大钊等被捕后正受审讯。

《警察厅——尚在审问追究中》：“据昨日调查所得，被捕之华人共六十余名，俄人十余名。华人之中，其属远东银行雇员者，两日开释十余名。现在羁押中者，华俄人共有六十余名，唯其中有为共产党机关之仆役厨房等，约二十余人。故实际上所捕之共产党员只有三十五名左右(俄人在外)，知名者，只有李大钊、路友于二人。李之历史，可以不用赘述。”“李大钊受讯时态度：闻李大钊受审问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及该党之工作，但否认最近对于北方有何密谋而已。昨日某报所传其供词，纯出臆测。李就捕后，某方要人以其历任各大学教授，颇著声望，不能与一般共产党员相提并论，故有特别从宽处置之议。李被捕时，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闻在厅甚受优待，唯看守特别严重，李之知友甚多，各方为其营救，或不至有意外也。”(《晨报》，1927年4月8日)

4月10日 北京大学等九校代表为营救李大钊访问张学良。

《九校代表昨访张学良 陈述五项意见》：“前日下午七时，国立九校校长，在校务讨论会开会，议决营救办法如下：‘张军团长学良头脑新颖，特推定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于十日向张陈述，并预先致张一函，说明拜访之意。’昨

日上午十时余张二人，曾赴文昌胡同八号访张，次因张公出。遂于下午四时复往，余张等到时，适张外出，由叶秘书代见，余张等提出意见如下：“(三)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李大钊之两女，请即释放。”(《晨报》，1927年4月11日)

4月12日 北京二十五大学校长开会，讨论营救李大钊办法。

《廿五大学校长昨日开会

请速将未释各生移交法庭

对交民巷事件将有所建议》。

“国立私立二十五大学校长，因援救学生问题，本决定昨日四时开会，届时因各大学校长多被警厅约去保释学生，延至六时，始行开议。公推工大代表许绳祖主席，先由冯农顾名(君)报告召集会议之意旨，略谓前捕各生，警厅已允轻者释放，重者移付法庭，迄未实行，是以召集开会。旋某代表提议，东交民巷之事件，内中所捕学生甚多，李大钊系一文人，且系静心研究学术者，教育界不能不有相当之表示。有谓李大钊为一事，共产党为一事，同人之要求当局，将李大钊移付法庭，系因李个人平日为研究学术之专员，当然应受适当之法律裁判。次朱我农回校报告警厅释放学生之经过。次交大释放学生报告在厅羁押之情形，大致谓在厅尚属优待，在侦缉队则稍逊。旋开始讨论上述各项，主席归纳付表决，议决二项：

(一) 推举女大郁大两校代表，明日(今日)下午三时见陈总监，请速将未释各生迅速移送法庭，依法解决。

(二) 推定法大朝大北大法律系教员，对于东交民巷事件，根据学理发表一篇建议书，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移

交法庭办理。该建议书应于本星期六完成。于七时半散会。”
(《晨报》，1927年4月13日)

4月28日 首登绞刑台，英勇就义。

《军法会审昨日开庭

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

一律在看守所绞决

李大钊首登绞刑台》：

“军法会审于昨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正式开庭，审判长何丰林中坐，主席审判官颜文海法官朱同善傅祖舜王振南周启曾(周系卫戍总司令部执法官)检察官杨耀曾分左右坐。以次召预定宣告死刑之二十名党人至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职务毕，一一依据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第七项之规定，宣告死刑。至十二时十分始毕。十二时三十分即由警厅用汽车六辆分载各党人赴看守所，第一次抵看守所者，时为十二时五十分。第一辆汽车(号牌一二〇〇)内为李大钊等三人，两旁均有宪兵警戒。”“下车后，即由兵警拥入所内。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军法会审派定东北宪兵营长高继武为监刑官，在所内排一公案，各党人一一依判决名次点名，宣告执行，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刑台。”“计自二时至五时，二十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而其他则不免望刑而畏，面无人色矣。”“至昨绞决之党人二十名(中有女子一名)名单如左：

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崑、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晨报》，

1927年4月29日)

△ 李大钊等被害详情。

《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

蒋逆介石密电主张杀害

惨无人道之绞刑=十八分钟始绝命

李先生神色不变=张同志面现喜色

北京各报一致哀悼》:

“北京四月三十日快函云：前日方传所谓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二十八日下午李大钊先生及其他十九同志已被万恶军阀惨绞毙命矣。据云前晚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记者按此讯甚确，二十九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二十八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二十八日早十时地方检察厅即下令传执刑吏(在宣外火道口居住)即刻到看守所应差，厅内外即知有行刑之事，惟尚不知究为何种犯人。正午十二时有警察厅司法处科长吴锡武、科员金某乘汽车直至法部后身看守所，嘱所长严重戒备，凡所内外不许出入，并命荷枪之法警四名，把守厅门，不许外人接近，旋有宪兵乘汽车至，在所内等候，形势益为紧张。同时所谓军法会审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正式开庭，召预定宣告死刑之二十人至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职务毕，宣告死刑，至十二时十分始毕。十二时三十分即由警厅用汽车六辆分载各党人赴看守所。第一次抵看守所者，时为十二时五十分，第一辆汽车(号牌一二〇〇)内为李大钊先生等三人，两旁列宪兵警戒，第

二辆汽车(号牌五一二)为路友于同志等四人,第三辆汽车(号牌五三六)为谭祖尧同志等三人,第四辆汽车为张挹兰、邓文辉两同志,第五辆汽车为范鸿劼同志等三人,第六辆为方伯务同志等四人。各人均未带刑具,亦未捆绑。下车后,即由兵警拥入所内。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李先生等被拥入所后,即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十八分始绝命。计自二时至五时始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先生,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义。又张挹兰同志下车时,面现喜色,摇首挺身而出。某同志临刑时,从容微笑云:‘这样就死了吗?’其余皆从容就义,毫无恐惧之色。被害后,警察厅早为预备二十具棺木,有价值六七十元者,有价值四五十元,由狱吏用木板将尸身抬出,在看守所边门前殓殓,至晚九时方毕事。所有棺木均暂停下斜街长椿寺,听由家属领取。李先生及各同志被害后,另有十人被判处徒刑(编者按其姓名已志本报兹从略)。李先生死后,北京各报一致表示哀悼,日帝国主义机关报顺天时报亦称颂李为‘青年思想家、实际运动之先驱’云。”(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2日)